

衆 群

期 四 三 第 卷 十 第



版 出 日 八 月 三 年 四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本 期 目 錄

怎樣走到舊金山(時論)

清算葛尼黑的幽靈

人民的政權

意大利的民主運動與聯合政權
 薩克里米亞會議的歷史意義
 從敵議會看敵情

紀念紅軍廿七週年

紅軍——新型的軍隊

紅軍的集體英雄主義

論陣地戰與游擊戰

孔慶的批判(附冊)

人民文化的時代

書評及其他

從兩本三恩樓月書論士大夫階級的生活態度

解開時局的謎

讀者之頁

知識青年怎樣推進民主運動(第一次筆談會)

阻礙同學們團結的是甚麼?

附錄：邊區文教大會的幾個決議

關於發展軍來衛生醫藥工作的決議

關於培養知識份子與普及軍來教育的決議

關於發展軍來藝術的決議

關於軍來校報辦報與通訊工作的決議

關於開展工廠的文教工作的決議

關於機關學校文教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決議

關於加強軍來軍人教育及娛樂活動的決議

搶權鬥爭(本報)

捕後記

白勞德(八一)

鄧初民(八四)

舒翰(九〇)

喬木(九四)

黎華(九七)

瓦西利耶夫作(九九)

科斯特羅夫(一〇〇)

斯科魯威(一〇一)

郭沫若

周而復(一〇八)

蘆蕪(一二七)

龍恭(一三〇)

浪川(一三五)

李涵(封面)

羣 衆

第十卷 第三四期

三十四年三月八日出版

總發行所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一〇八號

總經理

新華日報社

本刊價目

本報零售 每份

六期 八十八元

十二期 一百六十元

廿四期 三百零四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照加

清算慕尼黑黑的幽靈

白勞德

這是美共領袖白勞德去年四月間寫成的關於德黑蘭會議的一本書中的一章，事隔經年，白勞德的估計在基本上依然是正確的，特別是對於波蘭問題，他好像在那時就已預見了今天的發展。此外他對於戰後歐洲經濟的分析，尤其有獨到之處，現特轉載於此，以供讀者參考。

——編者

戰後歐洲是個什麼樣子決定于現在歐洲是怎樣解放出來的。

這在一九四二年，國務卿赫爾就定下了這個基本原則，那時他就在一篇提綱式的演詞裡，警告歐洲各國不要希望完全依靠外力得到解放，他們的觀言權要看他們參加解放鬥爭的程度來決定。莫斯科會議在英國宣言中提出同樣的警告。

換一句簡單明瞭的話說，建築戰後歐洲的工程師們要從那些在戰爭中表現出最大能力，事實上用最大能力消滅納粹的人們當中選擇出來。可是這是在美國往往被人忽視的一件現實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實，在美國幾乎沒有一位專欄作家不能一個月憑空想出一張歐洲新地圖，任何一個玩弄的專家可以在他空閒的時候想出一張戰後世界的地圖而得到驚人俱樂部、諮詢會、各式各樣的「知識份子」和紐約時報書評欄底廣泛的稱譽。

德黑蘭會議根據這一權利基於成說的原則，成立了一個協定和實現這一協定的臨時草案，使所有參加反納粹戰爭的人們不致互相抵消，而最後互相殘殺起來。德黑蘭會議具有歷史的重要性，因為它是担負反納粹戰爭最大責任的三大主要強國，為了更有效的得到這一共同結果成立的一個協定。

因為我們沒有制定無所不包的計劃的野心，我們對於戰後歐洲的討論可以限制到一些具體的例子，看看在這些具體情況下，問題是怎樣提出的。從波蘭開始。

戰前波蘭政府，當它憤然地拒絕一切和蘇聯合作，投身于希特勒懷中，參加瓜分捷克的時候，它已宣佈了它的死刑。後來，當戰爭快要爆發的時候，它又一次地拒絕蘇聯的援助，其結果是當希特勒轉過頭來對付他的波蘭「朋友」的時候，波蘭在幾個禮拜之內就被征服了。那時蘇聯跑過來，適時地

救出了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領土，這是一九二〇年波蘭從蘇聯領土佔過去的。這樣，直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在倫敦形成的波蘭流亡政府，除掉等待一些事情發生而外，沒有任何希望，任何作用。後來希特勒侵略蘇聯，甫考斯基就代表波蘭流亡政府和蘇聯簽訂一個條約，因此在一九四一年就成立了一個協定，假如流亡政府來實施地執行那協定的話，它的地位將一定會大大加強的。

但是事實證明了流亡政府不能忠實執行它的職務，當它把留在蘇聯的難民和戰俘組成一個軍，並且用蘇聯的錢把必裝備和武裝起來的時候，流亡政府拒絕把那軍隊用在東線，它通過伊爾蘭調到中東，為英國擔任駐防工作。它利用它在蘇聯境內設立的代表機關搜集情報，而這些情報却用神秘地落到希特勒的手裡，它利用這些機關進行失敗主義和顛覆蘇聯政權的犯罪活動，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主義者」愛爾利希和阿爾特被槍決了。最後，它參加了希特勒關於卡丁森林的無恥挑釁，這是希特勒的一宗罪惡，但波蘭的流亡政府份子却把它寫到蘇聯的賬上，直接做柏林的應聲虫。因此，蘇聯和波蘭流亡政府斷絕一切外交關係，於是留在蘇聯境內的波蘭人就組織了波蘭愛國者聯盟，同時着手組織波蘭的軍隊，和紅軍攜手作戰。

當紅軍高舉着解放的旗幟向波蘭邊境進軍的時候，這個出賣祖國的波蘭流亡政府向它的國內黨徒們發出命令，叫他們隨時隨地抵抗紅軍，雖然三年來它不斷有系統地命令他們不抵抗納粹。在波蘭，人們獲得了無數證據，證明了在追迫期間，那些和納粹合作來消滅進行游擊戰爭的波蘭愛國份子的，正是這一批傢伙。

波蘭流亡政府的要求非常簡單，紅軍應該把納粹趕出波蘭領土，把一九三九年解放了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領土交還波蘭，用紅軍的刺刀把流亡政府

的先生們請到波蘭人民的頭上，這恰好讓他們在國際的規模上繼續他們危險的冒險。他們在波蘭的權力向蘇聯的「傑出的」要求，因為，不論他們怎樣說，他們自己已沒有一點力量。

德軍的結束了波蘭反動者的這種危險的、有病的把戲。蘇聯在英法兩國政府明英政府認為蘇聯對於波蘭的政策是完全正常，而且是在波蘭一九一九年英政府就已提出的公平的判斷的。毫無疑問，蘇聯將追隨時會採取這一步驟。波蘭的流亡份子用他們自己造出來的種種謊言在空中，他們好像已下了決心不肯下來。

不過，真正的波蘭底遠景却一天天光明起來了。紅軍在無情地前進着，和紅軍一道前進的有柏爾察格將軍指揮下的波蘭愛國軍。不用絲毫懷疑，當紅軍進入波蘭領土的時候，波蘭人民將立即成立他們自己的自治政府，用他們所有的力量參加他們自己的解放鬥爭。他們將消除那些把他們帶到深淵去的賣國賊，建立他們所求有的強大的民主的波蘭。

假如波蘭流亡份子不夢想以為可以把莫斯科和倫敦華盛頓繼續和生疏開來，他們是不會對蘇聯進行這種盲目和自殺性的冒險的。他們集中力量來反對德黑蘭協定，他們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反希特勒聯盟的分裂上——一言以蔽之，他們夢想希特勒主權在歐洲會勝利。和一切反德黑蘭的人們一樣，他們行走在懸崖上。

和波蘭流亡政府完全相反，流亡中的捷克政府却採取了一套積極的和一貫的政策。這一件事就是足以警告我們不能對所有流亡政府下一概的結論。捷克政府有弱點，而且是嚴重的弱點，但是它沒有陰謀削弱或者分裂英美蘇同盟，也沒有企圖在列強間不和中檢便宜。它不斷的努力團結，而自從慕尼黑以後，它甚至認識了捷克和蘇聯的親密合作是戰後持久和平最好的保障。它主張各民主黨派，包含了共產黨的團結合作。戰後捷克的前途是光明的，光明的，目前唯一可慮的是他們爭取勝利的鬥爭進行得鬆弛，他們的武裝起義發動得太遲。

南斯拉夫是歐洲解放和復興的又一例證。一九四四年春天，當這本書在編稿的時候，所有的美國人知道了在納粹屠殺下的南斯拉夫內部，興起了一個驚人強大的人民的政府和軍隊以及它抗擊侵略者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代理人的新形式的成功。這一個運動的領袖的名字德拉瓦元帥已是舉世皆知了。英首相邱吉爾在英國議會裡發言，坦白而慷慨地承認了德拉瓦元帥和他的政府對

于聯合國家的偉大貢獻，同樣坦白地承認實和俄樂了實國戰米海洛維奇。

僅僅幾個月以前，這批問題是毫無不測的。

為了說明美國對於歐洲問題制定一個正確的政策的原因，我舉例來講一個「內幕」故事。一九四二年十月，紐約市美國勞工黨極的杜勒斯基——新領袖一派，為了波拉他們的眼中釘，勃吉監獄長道查對工人日報。為達到目的，他們以為最好的方法是指煽工人日報破壞蘇聯國家團結，因為工人日報攻擊米海洛維奇將軍——「我們的同盟」。他們把這一計劃提到他們親朋的朋友和夥伴，助理國務卿柏利面前。柏利欣然同意，要求這道書，建議為此召開了一個司法會議。會議經過了一番猶豫作態的討論後決定在原則上同意柏利的提案，但在未正式提出前，決定和國務院商量。國務院弄清楚這件事——工人日報報章停刊，情報部和國務院決定把米海洛維奇與希特勒的關係問題暫時擱置不談，因為這說，這是一動不得的東西。

儘管如此，這一件事發生後的一年多，美國的報紙依然繼續他們對於米海洛維奇的支持和對於德拉瓦元帥和他的政府的抨擊，他們認為他們是「共產黨匪徒」，除掉工人日報，我們美國的所有報紙有系統地對於南斯拉夫執行不正確的報導，雖然從一開始英美政府對於米海洛維奇和希特勒與墨索利尼的勾結就知得清清楚楚。只有到了一九四三年終，亞當斯克出版了「我的祖國」，用無可爭辯的事實才打破了美國報紙對於南斯拉夫真相的封鎖。亞當斯克之後跟着紐約時報駐開羅記者蘇茲打打來的電報，在那一個電報裡他發露他早已知道但不敢報告的事實。

很顯著的，英美蘇三國團結一致支持德拉瓦，並承認米海洛維奇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是和敵人勾結的賣國賊——這是所有聯合國的一大勝利。可是現在美國大報還繼續認為米海洛維奇的倒楣是英美的一個挫折，「斯大林的一個令人不安的勝利」，我們應該怎樣說呢？就在我寫這段文章的時候，紐約時報透過它的軍事專家鮑爾文，認為德拉瓦的興起是「許多擾亂的潮流」中的一段，這些潮流使「莫斯科、開羅、德黑蘭會議後大家對於戰後世界的崇高希望」暗淡了起來。

鮑爾文和紐約時報真是以為德黑蘭的希望是在各大強國應該支持米海洛維奇而不支持德拉瓦嗎？美國的利益真是在於替希特勒底那些腐化的和破產的間諜者作戰，用美國的刺刀把這些人送到南國人民的頭上，這樣來作為我們推測他們的主子——納粹底軍事行動的一部嗎？美國真害怕一個能團結天主

影射到共產主義者所提出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在歐洲興起嗎？民主主義歐洲的每一勝利，都是英美政策的「挫折」，「斯大林勝利」嗎？

假如美國不能清楚的回答這一問題，假使德黑蘭和德黑蘭文及其一流不同，對這一個問題以否定的回答，那麼德黑蘭協定在歷史上不過有浮光一閃的價值而已。因為德黑蘭文及其一流的路線，其結果只有在歐洲引起廣泛的內戰，而這一內戰即在希特勒打垮之後還要繼續而且加緊的。在這一內戰中，德黑蘭文將把英美和所有野蠻反動勢力聯系起來，而把一切民主力量投入蘇聯的懷中。這就是說，英美最後不得不担負起希特勒已經失敗了的工作——軍事上毀滅蘇聯。

德黑蘭協定的具體目的是最後而且永久的清算希特勒的幽靈。它的任務在取消這種在歐洲範圍內用種種政策來對抗英美政策的分裂路線，而代之以親英美蘇的團結路線；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德黑蘭是必要的。

我們對於歐洲復興問題的舉例已經足以顯示這一問題在政治上的基本性質，全歐洲在基本上的都是一樣，這一個國家和那一個國家的差別只限於小節而已。為了說明這本論的論點（即指白氏的「德黑蘭」一書——譯者），我們不必從一個國家到一個國家地討論。

為了把戰後歐洲的中心問題，在德黑蘭協定所要實現的美國利益底觀點上，更尖銳的提出，還有一點必須說到，那就是歐洲的經濟問題。

還在戰爭之前，歐洲的經濟已經緊縮的安排在國際加特爾的制度之下。這一個加特爾制度是一種獨占資本和封建的或半封建的政治力量的混合體。這是戰前納粹向它的鄰邦滲透底主要的河道，而在歐洲被征服之後，這一套制度又被希特勒作為歐洲新秩序的骨幹，固封不動的接受過來，英美資本家的某一些人物參加了這個加特爾制度，而且從沒有斷絕過關係，他們希望當納粹打垮的時候，他們還能把它救了出來。

這是使得英美對於法國的維琪政府，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權，意大利薩伏亞王國，南斯拉夫的米海洛維奇和彼得王國，希臘的喬治王國及其法西斯幫手們總想不捨底最大的力量。它所發生的影響要比馬吉所喜愛的專制原則和合法主義的憤慨，更嚴重到幾百倍。這是實現德黑蘭協定最主要的障礙。

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絕不能像典型的美國自由主義者所提出的那樣：簡單地解散托拉斯和消滅加特爾。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只要它還存在，它的支配時陣不能不在加特爾形式下的獨佔資本的結合。不如此，其他唯一

可行的辦法，只有那在蘇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的蘇聯是根據的。不過歐洲加特爾化經濟底政治動機（即所謂「德黑蘭」）是不穩定而動搖的，它必須全部加以毀滅，而歐洲新生的民主主義經濟在這一「德黑蘭」中，因為歐洲的加特爾制度底政治的社會的外層是完完全全由以下的幾個原因所決定的：

- 一、封建制度底腐朽了的殘餘。
- 二、對於工人和農民的高度壓迫。
- 三、絕對主義和權力主義。
- 四、軍閥制度。
- 五、對於少數民族的壓迫。

六、從外邊來的對於這個民族的壓迫和支配。
帶除這些封建殘餘，這是歐洲人民民主革命的本質，是打垮希特勒主義必然的後果，它不可避免的要提出把歐洲的資本主義經濟（包含了加特爾）重新在一個完全新的政治的和社會的結構上建立起來的問題。

認為美國的利益，即便是獨佔資本的利益也好，和歐洲這一必然的人民革命勢不兩立，那是一種最愚蠢的看法。實際上，這是唯一能把歐洲轉變或美國的有效市場的辦法，美國經濟假如要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繼續生存在下去，這市場是絕對必要的。當的慕尼黑歐洲必然要走進歷史的博物館，一個新民主的歐洲必將起而代之，因為——假如不是為了別的原因，因為只有一個民主的歐洲才能在世界市場上買進和賣出，償付它的清單，在形式和規模上，足以和美國一致，組成一個單一的世界秩序。

爲得把問題簡單化到使交易所的最低和最高不考慮問題的顧客們都能懂，我們可以說歐洲的問題像徵在米海洛維奇所發行的公債票的市價上：在今天，和鐵托的公債票比較起來，美國沒有很光的債票收買者，不會出一分錢去買米海洛維奇的債票的，而另一方面，鐵托的債票只有當交易所對於全歐洲命運的判斷改變了，才會改變行情。很清楚的像如歐洲能避免幾十年的混亂，鐵托的名字在美國金融市場上要比納粹統治下的國家中任何一個人的名字吃香。這是一個很具體的標準來決定，對於歐洲問題，它的解放和復興，美國資本的利益究竟是在那裡。

（據轉自「白勞德·德黑蘭」，三七——四五）

人民的政權

鄧初民

人民的政權，是「人民的世紀」的一個最主要、最基本、最鮮明具體的標記。如果沒有人民的政權，人民的世紀，就只是一句空話。我在前著「人民的世紀」一文裡（見本刊第九卷第十九期），曾說：「人民的世紀的真實意義，是人民一面在創造歷史，一面就在支配歷史。他是歷史本身的真正創造者；同時，他就是歷史本身的真正主宰者，為着人民大眾真正的永久的共同利益，共同幸福，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各方面，人民有最高和最後的發號施令權」。接着又說：「在「人民的世紀」裡，一切是人民在那裡發號施令，再不是暴君獨夫或政府在那裡發號施令，是人民大眾為着他們真正的永久的共同利益，共同幸福，要政府跟着人民走，再不是政府，尤其不是暴君獨夫為着他們的私圖，要人民跟着他們走。總之暴君獨夫的全部命運，都拿在人民手裡」。

「人民的世紀」的真實意義，既是這樣，然則「人民的政權」的真實意義又是怎樣的呢？我以為（一）它是由人民自己創造出來的政權（由人民自己打出來的天下）；（二）它是真正掌握在人民自己手裏的政權（非任何具體獨夫所能竊據）；（三）它是時時刻刻不放鬆的緊密的密切的依靠人民自己的全部力量保障其實現，生長、鞏固、發展（離開了人民，沒有人民真實力量的支持，它就要夭折）；（四）它是為人民大眾真正的永久的共同利益，共同幸福奮鬥的，一句話，它是為人民服務的（它是人民的勤務員）。

這種一種「人民的政權」，它必然要有其理論基礎，它的理論基礎，就是新型的民主主義，它必然要有其實踐形態，它的實踐形態，就是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或聯合政權；而且它必然還要有其一定的歷史背景，它的歷史背景，是由於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衰落，引起了舊型民主的衰落，因而需要有新型民主的改革。而它的產生，可以說在這次全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以前，亦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在歐洲的政治舞臺上，有過若干嘗

試。例如希特勒納粹匪幫奪取政權以前，德國人民大眾為了阻止德國大資本所有者殺戮民主的陰謀而醒醒的人民革命的政權，就是一例；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共和政府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的共和政權，又是一例；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以法蘭西各階層人民聯合組成的人民陣線為支柱的反法西斯反壟斷資本的勒魯姆內閣，是第三個例子。此外，還有第四個例子，例如芬蘭民主共和國的人民政府，在當時還提出了要實行如下的政綱：「一、建立芬蘭人民軍隊；二、設立國家對於大的私人銀行與大的工業企業的監督，并實行幫助中小企業的設施；三、實行完全消滅失業的設施；四、減少工時到每日八小時，保證工人有兩星期的暑期休假，并減少工人與僱員的房租；五、廣收大地主的土地，但不觸犯農民的士地和財產，并把所沒收的土地轉交於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六、農民不償付所欠的賦稅；七、國家實行多方協助提高貧苦農民的經濟，首先是從所沒收的土地主土地中分給他們以補助的土地，牧場，以及可能範圍內的供給家用的森林；八、實行國家組織義務法家庭的民主化；九、增加國家對於文化需要的津貼費，改組學校教育事業，保證工人及其他貧苦人民的子弟有能入學，并且多方促進以民教育、科學、文學、藝術、在進步精神之下的發展」。八（見人民政府宣言）這不僅是實踐，而且相當具體化。不過它們都暫時遭受失敗了。只有經過這次全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砲火，亦即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砲火，才把這種「人民的政權」熔鑄成器，而且一個個一個個的壯大，結實，更趨具體化。試看它一往無前波瀾壯闊的精神，表現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蘇聯大國聯憲章裡面，表現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二十六國共同宣言裡面，更表現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莫斯科會議公報及宣言裡面，表現在它對大、結實、具體化的十二月一日德蘇兩國公報及宣言裡面，表現在它對大、結實、具體化的

羅馬、西班牙、法國、意大利、希臘、比利時、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波蘭、匈牙利等所有德法蘇聯解放出來的各國政權裏面，現在都正積極地籌備新政府（亦即人民的解放政府）的成立，試舉一兩個例子如下：

一、法蘭西——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盟軍開闢了西歐第二戰場。在第二戰場開闢之後，即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根據國內抗戰運動的要求和臨時諮詢會的決議，正式改稱法國臨時政府。但政府雖經改稱，政權構成成分是不能充分包括各抗戰黨派及團體。乃於本年九月十一日來了一次改組。二十二名閣員中，新參加九人，這才把國內外抗戰運動各黨派及團體的領袖都包括進來了。如狄隆、比勞是共產黨領袖，賴各斯脫、巴洛第是職工會領袖，其他人員不是戴高樂派，便是其他中間黨派的人士。這在政權構成上，表示出來是全國民主力量大聯合的聯合政府。

二、意大利——意大利自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向盟軍投降，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盟軍攻入羅馬，意王遜位，太子安托伯為王儲，內閣改組，由巴多格利奧連任內閣總理。至七月，內閣又改組，由波諾米任內閣總理；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波諾米內閣又總辭職，幾經波折，於十二月十日，再由波諾米組成新閣，波諾米任內閣總理。內閣中包括自由黨五人，共產黨四人，基督民主黨三人，勞工民主黨三人。經盟國意大利管制委員會正式批准，新聯合政府正式成立。

三、希臘——希臘於一九四四年三月，原已宣佈成立希臘解放臨時政府，臨時政府的主席兼外交委員為巴吉爾吉斯（按即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回國希臘組織人民解放軍者），其他委員，有自由黨議員里密可斯，著名克爾特游擊隊領袖曼達卡斯上校，共產黨議員錫安托斯，農業黨議員卡伏里尼等。同年九月經過一次改組，內閣中包括共產黨四人，其他兩個重慶抗戰黨派代表各一人。同年十月十八日，希臘流亡政府總理巴本德里歐和英軍司令斯考比將軍一起回希臘，不久雅典發生了內戰，改由希臘天主教主教達馬斯諾斯等組織希臘新政府，時在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二日，希臘新政府正式成立（不過這還不是一個為人民所擁護的政府）。

四、比利時——比利時聯合政府成立於一九四四年九月，比埃洛任總理，部長十九人中，天主教黨佔七人，社會黨五人，自由黨三人，共產黨二

人，無黨派二人。

五、南斯拉夫——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路透社：南斯拉夫聯合政府，鐵托元帥和蘇伯西奇總理，已在今天成立協定（月前有南王彼得而國權歸此協定之說）。雙方同意成立聯合臨時政府，并選舉國會。

六、羅馬尼亞——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塔斯社電：羅馬尼亞各黨派成立民主陣線，商討組織聯合政府。同年十一月四日，路透社：國王已下令，宣佈組織新政府。又柏林五日廣播：羅馬尼亞新政府經過幾天的困難商討之後，已由史泰塔尼哥將軍組織，副總理為葛洛查，史氏并兼國務長兩職，前駐荷公使維維索加兼任外長。

七、保加利亞——保加利亞各黨派，也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聯組聯合新政府。新政府由保加利亞三人及內閣總理喬琪也夫組成，外有不贊同閣員二人，担負副總理的職務，此二人中一為農民共和黨人，一為共產黨人，內政部長伊凡諾夫，亦為共產黨領袖之一。在新政府內，包括共產黨、農民黨、社會黨、過激黨、合作黨、及軍人同盟，共和同盟的代表。

八、波蘭——波蘭臨時政府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改組成立。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今天早晨在盧布林開會，午後就選舉手執決方式，決議成立波蘭臨時政府。又向日路透電：摩拉夫斯基（按即原任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主席）已受任波蘭臨時政府總理兼外長，副總理瓦西人，一為波蘭工人黨（按即波蘭共產黨）秘書長柯摩洛卡，一為波蘭農民黨副總裁亦魯茲。國防事宜由波蘭軍隊總司令齊美爾斯基負責，臨時政府中有五人對社會黨與農民黨，四人對工人黨，二人對民主黨，一人無黨派。

九、匈牙利——匈牙利臨時政府成立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該日路透電：匈牙利已成立臨時政府，由軍界、超黨派、名流學者，前議會職員及民主黨等馳名人物聯合組成，密克洛斯中將任總理，卓尼諾博士任外長，哲登尼博士任內長。

這是一篇流水賬，如果把它總結一下，我們就可以總結出：自去年（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法國臨時政府正式成立起至本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二日希臘新政府正式成立（雖然這還不能作為希臘人民一致擁護的政府）止，不到八個月的時間，而在炮火中湧現出的新政府，就有了八九個之多（這還只是概數，此外如芬蘭，捷克，實亦不勝枚舉）。這決不是偶然的。

再則我們從這種種是處於簡單的說法，這可與德法在各種階級的
 新政體，有如下幾種共同點：(一) 這種新政體的產生及其成立的過程，是
 從各階級人民反抗特種強盜，反抗國內外的法西斯及一切親法西斯份子
 ，半法西斯份子的進火鬥爭中產生出來以至於具體形成起來的。例如波
 蘭，早在一九四一年，國內人民就開始進行武裝抗擊的游擊戰；到一
 九四三年，便在盧布林和拉多姆之間，建立了游擊根據地；一九四三年底，
 波蘭各民主政黨，在極端秘密中，開會決定波蘭國民會議的組織法，成立國
 民會議，通過共同綱領；一九四四年七月，由國民會議決定波蘭民族解
 放委員會（又於一九四四年大除夕（十二月三十一日）改組波蘭民族解放
 委員會，成立波蘭臨時政府。波蘭的例子，也是各國的例子。二、這種新政體
 一成立，立即發表宣言，在宣言中公佈其憲政的民主綱領。例如波蘭臨
 時政府在成立宣言中，宣佈立即舉行一九二一年的民主憲法，恢復波蘭人
 民各種民主權利。匈牙利臨時政府亦於宣言發表後，發表其施政綱領如下：
 (一) 動員匈牙利全部人力物力以反抗德國；(二) 廢除全部反民族平等
 法律，如反猶太人的法律是；(三) 保障民主權利與自由；(四) 解散「德
 十字團」組織及其他類似組織；(五) 懲處叛徒，並重新進行戰時取消的保
 護勞工法律。波蘭、匈牙利的例子，也是各國的例子。三、這種新政體所包
 括的組織成分，都是各階級，各黨派的民主大聯合。這在上述各種新政體中
 ，都有說明，不多贅。

這種新政體，亦即人民的政體，是否僅限於上述歐洲新產生的這種個個
 呢？不，決不侷限於這幾個國家，將來凡屬法西斯侵略下解放出來的國
 家，或在法西斯政權被消滅以後的德國、日本，乃至法西斯的民主大國如
 英、美、如中國、都將產生這種新政體。其最本質的根源由其長遠，就是戰後
 的世界，必然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世界，戰後各國的新政體，必然是各階級
 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體。

這種我們似乎要把這新民主主義政體所以「新」的究竟，交代一下，
 它「新」到什麼程度，它「新」的內涵怎樣。總括的說，就是新民主主義與新
 政體，它一方面不是蘇聯型的社會主義民主及其政體（這是新型的民主與
 政體），它另一方面也不是歐美型的資本主義民主及其政體（這是舊型的民主
 與政體）。這種聯合政府與聯合政體，並不是一般民主的形態，因為蘇聯無
 產階級一階級與其共產黨一黨派執政的政體，仍是民主的政府與政體，且是

最高級的民主政體。戰後過去資產階級一階級與其政黨一黨派（如英國或
 是保守黨，或是自由黨，在英國就是其兩黨或民主黨）執政的政體，也是
 民主的政府與政體，不過是較舊型的政體與政體。這種聯合政府與聯
 合政體，實質是「新」民主，「新」政體的特徵。因為新民主與新政體的基
 本內容，正在於就「新」民主說，它不再僅僅是政治民主，同時是經濟民主
 ，社會民主，再不僅僅是國內民主，同時是國際民主，世界民主。民主是經
 濟的，是「新」的。正在於就「新」政體說，它不再是一階級一黨派來執
 行統治權力，以治領事，而是由各階級，各黨派來聯合執行統治權力，政
 治領導。政體是變化的了，是「新」的。任何黨派都不是一種超歷史的奇跡
 ，這就是說都有它的歷史背景，前鋒已經說過，新型的民主政體，也是舊型
 的歷史背景。舊型的民主與政體，新型的民主與政體，最顯著的民主與政
 體，都是一種歷史的斷續或歷史的實在，亦即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歷史
 的，這就是說它未曾發生於那一歷史階段以前，亦將不銷於足於那一歷史階
 段以後，是歷史的，這就是說它並非一成不變，永遠如此。舊型的民主與政
 體與政體，它是肯定中世紀封建制而興起的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新型的民主
 與政體，它是肯定資產階級的資本制而興起的帝國主義階段的產物，亦即資本主
 義最後階段的產物，它完成了它一定的歷史階段所付與它的使命以後，總仍
 不免為另一種高階級階級所代替，即為最新型的民主與政體所代替。這是不
 此理，硬派定別人把聯合政府叫做「新」民主的特徵之非是，因此我們認為
 ，說什麼聯合政府是舊有的，聯合政府，不是民主的特徵，一黨一派的政體，也
 是民主（見去年十二月三日萊青「國際聯合政府」一文），很難為他記
 蘇聯的一黨政體，也稱為民主政體，而實際上只在辯護法西斯一黨政體，也
 是民主政體。殊不知這是絕對不容混淆的，社會主義的一黨政體是民主政體
 ，法西斯的一黨政體，決不是民主政體。這種事實一定不假，說：因為一
 黨政體，為什麼「為民主」？「非民主」呢？這沒有什麼奧妙，這就是五者六子
 說的，「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棄也」的淺近道理，今之伊尹，
 就是人民大眾，社會主義的一黨政體，是掌握在無產階級，亦即大多數人手
 裡，所以是民主。法西斯、半法西斯的一黨政體，是掌握在少數金權寡頭、
 政治流氓的手裡，所以不是民主。因此人民是標準的標尺，不是掌握在大多
 數人手中無的政體，一黨政體，固然是民主，即各黨聯合政體，也不盡民
 主，掌握在大多數人手中無的政體，各黨聯合政體固然是民主，一黨政體，也

是民主。因此，這裡所謂「新」民主與「新」政權，是以各階級各黨派聯合為其特徵的，加即以聯合政府或聯合政權為其特徵的。因為它還不是已經達到最新型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及其政權，如果是，它將是無階級一黨政權，它也不是已過去了的舊型的資本主義的民主及其政權，如果是，它將是資產階級一黨政權，兩者都不是，所以各階級各黨派的聯合政府或聯合政權，便成為「新」民主與「新」政權的惟一特徵了。不過其統治權力，政治領導，儘管是聯合的，但其聯合的結實紐帶，則是人民自己、人民大眾才是聯合政權的真正重心，人民大眾才是支持聯合政權的堅強柱石。任何黨派、任何階級、聯合執行政權時，都要服從於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任何黨派、任何階級、聯合執行政權時，都要使政權成為表達和執行大多數人民意志的有力量。這就是說要使廣大人民，不僅享有政治民主（政治的平等），而且享有經濟民主（經濟的平等）。政治民主的實現，要以經濟民主作條件，因為「貧窮的人決不是自由的」（見蘇聯國會會文），反之，經濟民主的實現，也要以政治民主作條件，因為「經濟民主之能否實現，是要決定於革命民衆的力量」（見沈志遠著「戰後世界新民主制之面面觀」）。這就是說要使廣大人民，不僅享有國內民主，而且享有國際民主（民族的平等），國際民主的實現，要以國內民主作條件，因為「對外要求民族平等獨立的主權，對內決不容許實行獨裁或專政的。假如要實行，其必歸失敗無疑」（同上引）；反之，國內民主的實現，也要以國際民主作條件，因為「對內實行民主政治，對外決不能實行侵略併吞或法西斯式的民族奴役。假如真是這樣實行了，那就證明這種民主是少數人的民主，是大資產者形式的民主，它非被送進歷史博物館去不可」（亦同上引）。從這些地方我們都可以完全看出這種新民主與新政權，是人民的政權，是由人民自己創造出來的政權，是掌握在人民自己手裡的政權，且是由人民自己的力量保證其實現、生長、鞏固、發展、為人民自己的共同利益，幸福、忠實服務的政權，它是大大不同於舊型民主及其政權的，一言以蔽之，它是新民主與新政權，舊型民主政權沒落的終點，正是新民主與新政權興起的起點，這次全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砲火，就做了它臨盆出生的助產婆。

因此，這種「人民的政權」，就成為「人民的世紀」這一歷史階段的重要標記，也就成為這次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重大目標，這次戰爭的目標不是別的，就是為的要建立各階級各黨派聯合的新民主政權。所以在這次

戰爭以後必然要使人人有豐衣足食的生活，人人有安居樂業的保障，人人有參與國家事業和社會事業的全部權利，也就是說要讓過去一切人對人的壓迫與榨取的罪惡，不再存在於世界，而且最後還要在世界各國各民族的人中間，建立起互助合作的友愛關係，而永遠不再有法西斯的侵略與奴役行爲。

以上是「人民的政權」一說發展的規律，也可以說是它的共製，是它的主流。但它發展的具體過程，就決不如此簡單，我們如果就其各自不同的特點，亦即其發展的不同性，來加以各別的考察，必然還可以從其共製中找出其特殊的類型來，如新民主政權（亦即人民的政權）之法國類型，新民主政權之南斯拉夫類型，新民主政權之中國型等等，這我們不能在此詳加分析，只好另立專章來論述。此外，我們必然還可以從其主流中發見其許多迂迴曲折的逆流，例如：其具體發展過程，在上述各國新政權中，我們便可以一下指出以下一些不同之點，試看有些國家的「新」政權，是在各該國被納粹德軍佔領後，各該國政府隨即倉卒逃離，流亡海外，再由各該國真正熱心愛國的國民團結起來打游擊，從血泊中樹立起來的，如南斯拉夫、希臘、波蘭等國家；有些國家的新政權，則是在各該國政府甘心附逆，與納粹德軍結成一夥，各該國人民受其重壓迫，採取地下行動，一直等到盟軍勝利，壓迫各該國政府投降後，才由人民自前樹立起來的，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家，這是新政權所由樹立的國家背景之不同，即或為納粹的傀儡國家，或為其附屬國，俄國西與意大利是例外，法國開始敗退巴黎，它的大批國土，是淪陷了，是佔領國，但貝當甘心出賣民族利益，投降納粹，又可以說是納粹的附屬國，而它的新政權，則是由海外流亡的領袖所領導的自法國，戰鬥法國，及其後隨結盟內外的抗戰黨派，抗戰人民共同樹立起來的。意大利則是在墨索利尼倒台後，軸心自行瓦解，來了一次內部政變，才由抗戰各黨派樹立起來的新政權。從這一發展具體過程的不同點，就發生以下不同結果。大概凡是從被佔領國中樹立起來的新政權，不管被佔也好，希冀也好，都不可避免地要開一些流亡政府的糾紛，人民流了汗，他們仍有法統，而且在法統問題上，雖實達亦不能免俗，而從附屬國中樹立起來的新政權，反而沒有這些麻煩。

再則有些國家的新政權，是樹立在盟軍奪取解放區域中的，例如波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家。有些國家的新政權，則樹立在盟軍英美軍事解放區域中的，例如比利時、意大利、希臘等國家（

但希臘則完全在英領軍釋放區域中。這是新政府所屬軍釋放區域之不同。根據這一發展具體過程的不同點，也發生如下不同的結果。這就是：不論被佔領國對附屬國，因為新屬地或解放區域之不同，有的則比較安定，要麼，有的則比較動盪，不穩，甚至發生不幸的內戰。這法國也是例外，只有它絕無動盪，主動，不受所謂區域的任何影響。

此外則在各國聯合政府或聯合政權的形式與實質上，還可看出有領導的階級和領導的黨派之不同，有的為少數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所領導（實質上這一階級及其政黨的單獨階級是不可能的），有的為大多數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所領導；有的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所共同領導，但在新民主政權的實質上，却只有無產階級，不是兩個階級共同領導，就是一個代表大多數人民的階級與少數單獨階級。否則不是新民主政權。這是單獨階級與共同階級之不同。根據這一不同點，也可以發生以下不同的結果，即領導的階級與黨派，總能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其政權愈有基礎，愈鞏固，否則將不免發生波折，將不為人民所擁護，而遭受失敗。

由於以上各新民主政權國家發展的具體過程之不同，有的剛流亡政府紛紛，有的沒有紛紛，有的安寧、鞏固、有的動盪、不穩；有的得到人民擁護，日益擴大，鞏固其政權基礎，有的則否，因而趨於為有的新政府國家則消滅新民主主義新政府的火種，較為順利的放開人民沉淪而快捷的腳步，一直往前邁進了，如法蘭西、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國家，尤其是法蘭西，在其內政外交兩成就上，於短時間就恢復了它已往革命的光榮傳統，建立了新民主新政府的第四共和國。有的則遲遲種種坎坷，一折三疊，如比利時，意大利，希臘等國家，尤其希臘，因為親法階級分子已本德黑歐，回國不久，雖與手執干戈為祖國的解放付了血的代價的人民及其解放軍為敵，不惜投引外力，屠殺自己的同胞，以致爆發了相當長時期的內戰，而真正人民的政權的建立，直到現在還未把握。這就使我們明白看到不惟於新政權的共型中，還有其特殊類型，而且明白看到於新政權的主流中絕不脫離一般逆流。這般逆流，一則是由於階級的無恥的流亡政府，排擠新政府的政權，企圖重建被前法西斯的軍事獨裁，拒絕與人民合作，甚至仇視人民，畏懼人民（單純仇視、畏懼、較之對於希特勒匪幫的仇視、畏懼，是只有過之無不及的），二則權在手，就要解除那恢復國土有功，把他們請回來的人民軍的武裝，這

在比利時的比埃洛是如此，希臘的巴本德里歐也是如此。再則由於民主大國的某些階級分子，迷戀舊歐洲秩序的傳統，希圖在便於私圖的打算上，把某些小國變成自己的衛星，因而造成自己的勢力範圍，不能更心的「尊重」民族有權自由決定其所願以生存之政府形式」的大西洋憲章，而且希圖為其新的秩序留一個最後的避難所。在這種自然就不能不發生舊秩序與新秩序之爭，因而就不能不發生主流與逆流之爭。本來是隱伏的逆流，在這種情況之下，也就公然表面化了。

這不是別的，這正是由於一切法西斯流派，對於人民的政權的恐懼，對於人民的仇視。他們——一切統治階級者，獨立主義者，親法西斯分子，非法西斯分子，黨棍惡棍、政治流氓，封疆餘孽，流亡紳士，一言以蔽之，一切法西斯流派，確有惡毒，仇視人民和人民政權的充分理由，因為人民和人民政權，代表戰後世界繁榮的將來，不代表戰前世界腐爛的過去，要決要把自己創造出來的政權——自己打出來天下，掌握在自己手裡，來為自己服務，這樣就斬除了一切民賊獨夫，竊取政權的機會。民賊獨夫也就不能不出各種卑劣手段，下流辦法來作最後掙扎，把昨天的朋友——人民大眾，當做敵人，把昨天的敵人，甚至於今天還是敵人，還是強大的敵人——法西斯匪徒，當做朋友。企圖來阻擋歷史的發展，堵塞人民政權的主流。殊不知歷史的意志，人民的力量，是誰也阻擋不住的。人民的政權，必然要突破千難萬阻，達到最後的成功與走向最後的勝利。因為當前歷史付與它的負擔是太重了。首先它擔負將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担，法西斯的殘酷統治和野蠻侵略，沒有各該國內人民的政權，決不能把各該國從法西斯的統治與壓迫下解放出來。因而也不能把各該國從法西斯的統治與壓迫下解放出來。其次，它擔負着全世界戰後復興的重担，法西斯野獸的毒爪，踏遍了被佔領國及其附屬國，毀村莊，墟城市，絕滅了幾千關於政治經濟建設的全部文化，沒有各該國內人民的政權，則對於廢墟或破爛各該國內的法西斯分子或賣國奸賊，及從事於政治經濟之改造與建設，皆不可能，因而其復興計劃不能實現，甚至於影響全世界的復興事業。其次，它擔負着全世界戰後持久和平的重担。戰後的持久和平，不論是在國際國內，都要建築在新民主主義與新民主政權的堅實基礎上，都要建築在經濟平等，政治平等，民族平等的根本原則上，沒有各該國內的人民的政權，則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國內民主與國際民主，都不可能實現，因而戰後的世界持久和平亦不可能實現。最後，它

這將是當世界因斯聯盟而團結，在好合作的重組，東西法西斯主義，都將把他們的希望，或更被奴役我們的陰謀詭計，寄託在彼侵略的各國內或各聯盟國間的內部聯繫，內都不團結上，因為恰恰是只有彼侵略的各國內或聯盟國間的內部的精誠團結，友誼合作才是反侵略反法西斯戰爭最終勝利之保障。沒有各該國內人民的政權，亦即沒有各該國內廣泛的民主生活與廣泛的聯合陣線，反法西斯聯盟的國內團結與國際團結，都將是不可能的。

因此，人民為勝任歷史所付與的責任，必然要突破千難萬難，走向最後勝利與成功，而人民反侵略的主流，也必然要淹沒任何反動的逆流。全世界的人民，尤其是在多年戰爭的苦難中，用血和淚洗滌了他們親緣的人民，正在努力要恢復新的，更廣大的，更健全的原則，把法西斯侵略使他們喪失掉的國家地位，經濟地位，民族地位，恢復起來，把形式式的法西斯主義，被煽分子，孤立分子，政治流氓，一齊永遠根絕除掉，而且要使他們的新政權，在全世界到處勝利。

這就是說，人民自己的力量，就是足以阻遏住種種反動的逆流，不管它是潛伏的，或者是已經表面化了的。世道豈說人民自己的力量，於是阻遏或淹沒種種反動的逆流的，最可靠的保障。由史文指出，人民大眾才是聯合政權（即人民的政權）的真正重心，人民大眾才是聯合政權的堅強柱石，因此，無凡與統治階級與新進階級之爭，對新進階級與逆流的爭，人民才是最後的判決者。服從人民利益，供養人民力量者勝，否則敗，慘敗！

除了人民自己的力量，是消滅種種反動的逆流的保障以外，另一個可靠的保障，就是美英法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中，蘇聯這一社會主義國家之有閃電爭勝，戰後和平，以及建立民主新世界之左右全屬的決定作用，前文已經指出：不論納粹統治的被佔領國與附屬國，是凡樹立新政權的國家之在蘇聯軍事解放區域者，則較安全、空固、否則動盪、不穩、去更發生不幸的內戰，就充足足以證明蘇聯已成為阻遏種種逆流的有力因素，今後蘇聯是一定要領導世界一切被解放的人民為建立人民的政權而奮鬥到底的。最近報載蘇聯開闢的紅軍於解放匈京布達佩斯，波京華沙而後，已數路直趨柏林，納粹匪幫的最後殘餘了，人民的勝利，人民政權的建立，已獲得更多把握的保障。

此外，蘇美英三個民主強國之始終一貫的合作，也是撲滅種種逆流之可靠的保障。前文雖然已經指出逆流的來源之一，就是由於某些民主強國的被

煽分子，還不肯放棄其歐洲已經破產的制度，還迷戀着舊統治秩序的傳統，但這是不能通過三個民主強國之共同需要的，尤其不能破壞在三國中起決定作用的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而且客觀的情勢，使他們在戰後新民主主義的建設中，非密切合作不可，美國是特別懂得這一點的，其餘一國雖然還裝作不懂，但於希聯問題已經碰過釘子，其他問題的釘子，將來一定碰得更大，現實的教訓是不容那個不接受的。蘇聯的捷報頻傳，美國太平洋的政勢，也一日千里的進展得特別快，你餘一國能不上來嗎？史羅邱三亞聯會議的日期已見告了，任何不愉快的心情及任何潛伏的逆流，都將在這一大會中，得到澈底的清除與最後的阻遏。

逆流總是法逆流，「人民的政權」，必然要在「人民的世紀」中最後勝利，徹底勝利，永久勝利！

一九四五、一、廿一、於陪都

(上接一〇七頁)

希特勒軍政人員在對運動戰與陣地戰，「閃擊戰」與持久戰所作的種種演說，是有意思的。希特勒之徒在指望着運動戰的勝利時，卻又低價了紅軍的抵抗力，尤其是於戰後的蘇聯捷報頻傳，蘇聯軍隊的防禦戰，最消滅了敵人和消滅了他的有生人力及技術而他們還實現了勝利之際。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冬天，希特勒份子在那德戰場上遭受了幾次重大的失敗之後，他們才初次回想起這句話，戰爭可採取長期鬥爭的形式，他們自覺地為了戰時的奮鬥而縮短陣地（！），他們是用陣地戰來控制（！）蘇軍，好像在這個階段對希特勒德國是有益處的。這些武斷之辭多麼虛偽，可由希特勒與戈林自己於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月之中所承認的德軍於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冬季被擊退來看。據外報所傳，德軍的某些名將如勃魯西爾，波克以及其他人，早在莫斯科外圍大敗以前，就主張停止進攻而轉為防禦。

但德軍也沒有建立不可撼動的防禦的能力。法西兩軍首建這種防禦不能成功，正如「閃擊」戰不能成功是一樣的。盟軍在具備了堅不可動的勝利信心和藝術的領導之際，必克服敵人的任何一種防禦的抵抗。這個已由紅軍無數次突破敵軍防線的事實以及他在蘇德戰場上許多陣地的強有力的攻勢而證明。

此外，蘇美英三個民主強國之始終一貫的合作，也是撲滅種種逆流之可靠的保障。前文雖然已經指出逆流的來源之一，就是由於某些民主強國的被

意大利的民主運動和聯合政權

舒翰

意大利北部是意國抗戰民主運動的重要支柱，意北米蘭、都靈、熱那亞等大工業城市，廣大的工人羣衆有着堅強的地下工會組織，他們經常以罷工和破壞運動，向法西斯政權作鬥爭。一九四三年三月以來，米蘭、都靈以及其他城市繼續不斷的大罷工，加速了法西斯的崩潰，促使巴多格利奧停戰。墨索利尼垮台之後，意北的鬥爭發展成爲同德寇的武裝衝突，開始了游擊戰爭，成千成萬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湧進游擊隊；同時，大批意軍拒絕德寇解除武裝，也紛紛參加進去，這支人民的武裝，聲勢日益浩大，在山谷中建立根據地，設置最高領導組織，統一指揮。現在已經發展到四十萬人。他們控制着德國對意大利的唯一交通線——布倫納山隘，破壞鐵道，襲擊敵人，他們率軍擊退十個師團的兵力。他們在都市中，則普遍組織武裝破壞小組，炸毀敵人的物資。德寇的軍火生產，在罷工和破壞運動之下，幾乎全部陷於停頓。意北人民在敵後最猛烈的這種戰鬥，並不比正面戰場不重要，而對敵人的威脅却更大些。各民主政黨所形成的民族陣線，也首先在米蘭出現。所以說，意北是意大利抗戰民主運動的重要支柱，而這個支柱的基礎，就是廣大的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之所以在民主運動中起着主導的作用，首先是共產黨的領導；其次，意大利和法國、波蘭、捷克等國家一樣，是共產黨和社會黨的團結。同時，兩黨的團結，在這些國家中又成爲民族民主陣線的重要因素，在意大利則更顯的團結奠定了民族陣線的基礎。

自一九三二年法西斯統治意國後，民主勢力遭受極度的摧殘，過去的一些團體，有的解散了，有的流亡國外，或者隱蔽起來默然無聞，獨有年青的團體仍舊存在人民中間，一直保持着戰鬥的組織，領導地下運動，發行

秘密報紙，號召進行反對獨裁的鬥爭。當法西斯最初奪取政權時，在人民中相當地起了一些欺騙作用，所以鬥爭也就萬分艱苦困難，但人民決不會永久被騙的，法西斯的面貌逐漸暴露出來了，危害人民的罪惡一天比一天深重，到了一九三五年，意大利人民的鬥爭就比較廣泛地展開。那年十月，共產黨和社會黨團結起來，簽訂一個協定，爲了意大利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採取共同的反法西斯行動，他們決議共同到法西斯職工組合裡去活動，以建立人民的力量。由於揭發法西斯對奪取人民的權利，工人沒有組織工會的自由，沒有選舉權，法西斯黨派來的職工組合的負責人，貪污腐化，無惡不作等等，工人們鬥爭的情緒被提高了，參加的人越來越多，由日常的經濟鬥爭，而走上政治鬥爭的道路。

納粹侵略戰爭的爆發，歐洲被佔領國的自由解放鬥爭，進入了新的階段，意大利也一樣，十月中，共產黨和社會黨的代表，組織了行動委員會，來領導民主運動，這個行動委員會，打下了不久以後各民主政黨團結合作的民族陣線的基礎。

早在墨索利尼垮台之前，意大利地下的民主政黨，已在人民中生了根，斯大林格勒一役，扭轉了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局面，確定希特勒必敗的命運，至此，歐洲人民的團結，又進了一步，各國人民先後結成民族的民主陣線，各黨派放棄舊來的政治成見，在一個共同的綱領之下，統一領導對德寇的英勇鬥爭。意大利由於共產黨和社會黨的發起，團結了自由黨，基督教民主黨，行動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這五個民主政黨在米蘭舉行第一次黨派會議，組成了民族解放委員會——意大利首先出現的民族陣線機構，後來這個委員會又擴大爲意大利北部的最高領導機關。但是全國性的民族陣線中央，到一九四四年一月才形成的。這之前，各民主政黨雖然已活動起來，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但彼此的聯繫很貧弱，活動也只以個別城市和地區爲限，有些團結起來的地區，都成立了民族解放委員會，作爲地方性的統一組

一九四三年七月下旬，臺北各大城市紛紛舉行游行示威，要求意大利退出戰爭，立即和盟國談判和平，都山當地的各黨派或民族委員會領導的。七月二十八日，五政黨代表又在都靈舉行會議，聯名向巴多格利奧提出要求，恢復正常的民主政治活動。在南部，各地民主政黨也活躍起來，以波諾米為首的羅馬民族解放委員會，也在地下組織了。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起，在解放區巴利城舉行各省區民族解放委員會代表大會，全意大利都有代表出席，代表中除上述五政黨以外，又新添了勞工民主黨，大會決議要求國王退位，成立臨時政府，支持對德戰爭，並籌備戰後憲法大會。同時選出一個常務委員會，作為全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中央執行機關，其中包括六個民主政黨的領袖，後來的聯合政權就由這機構產生。

二

意大利六個民主政黨，代表着各階層的人民，他們雖然有着不同的政見，但是更有着共同的目的——反對法西斯，要求民主自由。他們為了民族國家，捐棄成見，團結抗德，並且還要團結建國，因此，他們能够在一個共同綱領之下，結成以民主為基礎的民族陣線。他們曾經宣佈：「意大利政治團結的保持，有賴於各黨對各項社會和政治問題爭論的解決，維持不輟，直到意大利全部獲得解放。」「各黨同意嚴防反動力量的再生，並保護國內一切人民的自由。大家也同意配合行動，達成這目的。各黨的共同目的，就是謀意大利的解放和建立一個民主國家。」陶格利亞特（即愛爾柯里，係意共創始人之一）在從國途中對記者的談話，說明意大利共產黨的政策，是「國家自由與再建的戰鬥中民族團結的政策」，他指出：意國人民當前的基本任務，是儘可能迅速地從意大利從德國侵略者及其走狗墨索里尼手中，完全解放出來。「意大利是能够把在戰鬥中團結起來的全民族的力量，驅逐德寇，摧毀法西斯主義的殘餘，並恢復國家的統一和自由的。共產黨人願意竭盡力量來團結意大利全國」，「國外自由黨大力運動領袖史佛卓回國後，就在巴利向全國廣播說：『我早已準備，從反專制的自由主義者起一直到共產黨，都要向他們團結起來，共同對德作戰』。他特別聲稱那些以及共來分裂各黨

派團結的陰謀，他說那是法西斯份子的老手法。意國民主政黨和各階層人民，就在這種抗戰與民主的共同目標下，團結起來。

各黨派在民主的基礎上合作，大家都有着自己的光明前途，而彼此之間的團結，也加強起來。首先是共產黨和社會黨進一步結為同盟，訂立最低限度的共同政綱，成立同盟委員會，並且發表聲明：「深信由制憲大會形成民主共和國，是意大利人民的真正願望」。確實也希望和基督教民主黨進一步合作。在工人中，這種團結早已形成，羅馬解放以後，天主教徒（基督教民主黨）和非教徒工會（社會黨和共產黨同結的），破天荒地團結在統一的工會中，總工會的三個秘書，就是三個政黨的代衣。去年五月底，基督教民主黨在那不勒斯召開大會，特別邀請意共總書記陶格利亞特參加，這是兩黨第一次的親善。陶格利亞特在大會演說中，指出兩黨的團結，不只是因為有着一致的目的，而且因為有着羣衆的擁護，所以希望保持彼此的協議，「誠懇地在一起前進，以建設民主和進步的意大利」。

這三個政黨，是意大利的大政黨，法西斯統治以後，都成為地下黨。社會黨在失敗中糾正了過去右傾的錯誤政策，領袖曼西尼和納塔等，都經過了很長時期在羣衆中的堅苦工作，前者是律師，一九一四年即加入社會黨，是意國南部最有權威的領袖，羣衆中很有信仰，後者是職工運動的領導人，共產黨在解放的區域，目前已有黨員二十萬人，其中羅馬有三萬五千人，意北的人數更多，游擊隊中共產黨所組織的「加里波利」縱隊，已有六十支隊，總數達二十五萬人。陶格利亞特以外的領袖如現任製藥部長古羅，是老國會議員，國防次長巴勃羅，是那不勒斯律師，在法西斯統治的年代，經營着許多政治犯組織，第一次大赦時他會做過船長，得過勇敢獎章，後來是軍人協會的主席，財政部長貝蒂諾是政治經濟學教授，曾經坐過五年牢，是團員中年紀最輕的（三十四歲）一個，外交次長李萊博士是有名的外科醫生，意共那不勒斯區的書記，盟軍解放時才從獄中釋放出來，也過了五年的監獄生活，後來就出任那不勒斯醫院院長，在任外次以前，他是那不勒斯的市長。基督教民主黨是代表天主教社會觀點的政黨，黨員都是教徒，因為教徒所在的關係，力量相當大，一般主張則比較保守，領袖為羅薩諾男爵。但一部分青年知識份子，不久以前分化出來，另組左翼基督教黨。共三黨則是新創立的地下黨，自由黨（又名復興自由黨）黨員多為知識份子自由主義者，領袖克羅斯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有幾二十年反法西斯鬥爭的經驗。行動黨內也多

知份子，領袖即海外自由黨大和運動領袖佛卓。勞工民主黨較小，只在南部有組織，是社會黨右翼的改良主義者。

三

民衆陣線所要求的，也就是意大利人民所希望的，是一個民主的聯合政府。代表薩伏亞王室的巴多格利奧政府，決不能把反法西斯的民主份子都團結在自己的周圍的，儘管因爲王位過去二十年來和法西斯全力合作，鎮壓民主運動，最後成爲國際強盜的同謀者，而且巴多格利奧本身便是逼迫人民對同盟國作戰的統帥，因此，當時曾造成意大利政治上嚴重的僵局，特別表現在王室問題上，各民主政黨堅持王位退位，以另一政府來代替巴多格利奧政府。由於各黨以民族利益爲重團結各政黨，在加緊對德作戰，以求意國全部解放這大前提下，結束了這僵局，答應王室問題到戰後由人民自己去決定，巴多格利奧則聲明辭職後立即辭職，這樣雙方得到了協議。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巴多格利奧政府改組，各民主政黨參加，意大利第一個聯合政府便形成了。內閣中除原有閣員八人留任外，其餘都是各政黨代表和無黨派人士，於是政府陣容爲之一新。不管閣員五人，由共產黨社會黨，基督教民主黨，自由黨，社會黨領袖分任，其餘閣員中還有：

- 共產黨——部長，國防次長，財政
- 社會黨——部長，內次
- 自由黨——司法
- 行動黨——社會
- 基督教民主黨——內長
- 勞工民主黨——交通
- 無黨派——財長

這一改組，因爲民主政黨的參加，改變了巴多格利奧的政策，第一次部長會議上，就作了明確的決議，強調意國和同盟國並肩作戰，直到德寇完全打敗爲止，並且更忠於大西洋憲章的原則，建立一切人民的自由與繁榮的新的國際機構。「自由黨大和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標，是幫助建立國際秩序與合作，基於民主原則和原則，去避免新的戰爭的危險」。因此，「新政府必須

採取同法國、希臘、南斯拉夫、蘇聯、阿爾巴尼亞等國的合作政策，……所有法西斯的破壞和暴行，必須懲罰」。

羅馬解放以後，人民的力量更加強大了，政府自應多吸收解放區代表參加，以擴大民主的基礎；同時，巴多格利奧不能解決執行新的政策，也不得不履行去職的義務；於是政府又經改組，這一次，更進了一步，完全由六個民主政黨的代組，地下黨領袖之一的羅馬民族解放委員會主席波諾米出任總理，閣員中包括共產黨四人，社會黨三人，行動黨三人，基督教民主黨二人，自由黨二人，勞工民主黨一人，無黨派人士一人，其中不曾有閣員三人是共產黨、行動黨、和自由黨的代表，波諾米本人是無黨派。

這之後，在五月十一日，意大利又發生過一次改組，原因也是對意政策的不調和而起的。意大利人民支持下的各民主政黨的聯合政府，能採取各種進步的措施，使政治走上民主的轨道，而爭取意國的獨立自主的地位，但當時英美的政策，却以於阻礙而轉爲干預的態度，因此，王室方面乘機活動，陰謀破壞民族團結的團結，幸而這個政府不久就平息，波諾米再度組閣，行動黨和社會黨爲了種種原因，沒有入閣，這固然是件憾事，但六個政黨依舊團結在民族陣線中，共同爲意國的解放和民主建設而努力。意國這次改組，取消不管部閣員，設副總理兩人，由共產黨領袖格利亞特和基督教民主黨領袖維諾拉分別担任。共產黨在這新閣中，負了更多的責任，原閣員有農業部長古羅、國防次長巴勒摩繼任而外，原任財政員薩達出任財長，史料錫瑪羅出任海陸軍行政部長，李萊出任外次，凡諾出任某部（電訊電碼不明）次長。

四

民主的聯合政府形成以後，意大利政治在飛躍地前進，這是很明顯的事實。同盟國家在去年十月二十五日，同時承認了意大利政府，正式恢復外交關係，互派使節，意國的國際地位因而提高了。盟國的援助，逐步減少，把政權完全交給意國政府。

內政方面，最急迫的是戰爭的動員，法西斯份子的肅清，以及糧食問題的解決，這些都有了顯著的成績，特別是糧食問題，是意國人民當前的嚴重問題，農業部長古羅確定了麥子和麵包的價格，建立民主的檢查制度，使

民減少痛苦。對法西斯份子的消除，是一件巨大的工作，現在解放區有一百六十五個下級清除委員會，在執行職務，兩個半月內收集到了一萬六千多人從事法西斯活動的證據。司法機關組織了特種委員會，廢止法西斯的法律，研究民主法制的製訂。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承認游擊隊和意北民族解放委員會，因而，意大利的民主力量得到更廣泛的基礎與堅強的團結。民族解放委員會中央在羅馬舉行會議時，就強調「自由意大利的解放軍」在對德作戰中的作用，要求政府承認游擊隊是意軍的組成部分。這種要求，完全為了加強對德作戰，早日解放意國全部國土而提出的，一切打擊敵人的武裝部隊，應該獲得合法的地位，和同等的待遇。民主的聯合政府自然能執行此種合理的政策，波諾內閣採取了以下兩點措施：第一是承認阿爾卑斯和亞西斯作戰的意國志士的武裝部隊，是國家軍隊的一部分；第二是要求盟方成立協議，承認游擊隊的合法地位，並給以物質和精神的支援。據三月二十日羅馬電訊，意北游擊隊即將編為正規軍。我們相信，在未來意北的解放戰爭中，意北游擊隊一定像法國內地第一撥創造輝煌的戰績。

(上接第一〇〇頁)

親友也喪失了。
警衛軍中士科楚維斯道：「德寇把我的父親、母親和兩個姊妹都殺死了；我的八歲的兒子瓦羅雅，以及我的嫂嫂和地的兩個小孩一齊被殺死了。」

讀者可以想像得到這個部隊中的人員覺得德寇怎麼樣。在我們看來，那是很明顯的；蘇維埃人對祖國的愛，和他對敵人的憎恨同樣的強烈，那敵人迫害蘇維埃人民，要屠殺蘇維埃戰士已遲長久了。對祖國的熱愛以及對敵人的憎恨，便是紅軍人員集體英雄主義的泉源。

人民號召自己的軍隊以完成剛勇的助功；它要求為了自己所受的一切苦難，實行殘酷的報復。成

意北民族解放委員會是抗戰運動的領導機關，漢諾威政府因此也承認了它的合法地位，並且授權該委員會，「在德寇佔領的全體區域，發布一切組織和指揮抗戰的命令，救濟當地居民，照料糧食分配，建立聯系以及在盟軍進展時加強愛國人士行動的力量」。波諾內閣發表公告，要求意大利北部全體人民，和民族解放委員會合作。明確地說，這就是意政府承認意北民族解放委員會，是北部的地方政權機關。意政府為了奧地利與波蘭的關係，特別設立淪陷區行政部，由共產黨代表史科錫瑪擔任部長。同時，盟國的陸軍統帥部在去年十一月間，和意北抗戰運動領袖文成立協定，由盟國保證意北解放後，民族解放委員會不只是意北人民的代表機關；抗戰運動領袖保證履行義務，就是在解放以前，地下組織承認波諾內閣政府的管理權。這種協議，完全是在民主基礎上求統一的正當的解決。

千成萬的信從後方寄到前方去，要求軍人做一個對黨對前線的英難們的偉大的愛

人民英雄色的英雄。
被德寇釘在十字架上的蘇聯英雄維里·斯密諾夫的母親，馬里雅·斯密諾娃，老遠地跑到東普魯士境內他的兒子的部隊裡來，祝他的兒子的同志們一路福星，向他們表示母親的愛，要他們完成正義復仇的使命。

蘇聯軍人從自己和人民之間存在的血肉相連的關係中，從蘇維埃人民對祖國保衛者的熱愛中，汲取到精神上的力量。報紙上給我們帶來了關於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不斷地貢獻他們的積蓄，以增強紅軍威力的範例。名字叫伊凡·巴爾諾夫的一個農民，請政府用他捐的錢，造一列大砲，贈給前方他的兒子所屬的一個砲隊去。那維爾明斯基區的工人們，用自己所捐的錢建造兩架飛機獻給蘇聯英雄庫爾察科夫弟兄去。
這類事實，證明了什麼呢？這類事實表明了人民的偉大願望，急於要從速取得最後勝利，這類事

列寧——蘇維埃國家的奠基人和紅軍的組織者，在一九一九年就說過：人民之中的大多數，工人和農民，如果知道他們正保衛他們自己的政權，保衛蘇維埃政權，保衛勞動人民的政權，如果知道他們在保衛着的事業的勝利，就是意味着他們和他們的後子——都能享受一切文化福利以及人類勞動的一切果實的機會，那麼，這一種人民，就決不會被人征服的。而這些名言，在今天，在紅軍士兵們的集體英雄主義中又加以證實了。

戰爭正在進行着，而且必將繼續進行，直到德國的最後一砲聲於沉寂而後已。這是人民的意志，紅軍必將繼續前進。莊嚴的集體英雄主義不僅引起了蘇聯人民的，而且更引起了所有進步人類的一致讚美。這便是關於對敵人的取得最後勝利的希冀與信心的根源。

論克里米亞會議的歷史意義

喬木

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快要結束的時候，曾經有過一位不知名的詩人戰鬥者寫過如下的詩篇：

……我們死了。幾天以前
我們還活著，每天看西下的夕陽，
愛過人，被人愛過，而現在我們
却埋葬在梵蘭台的原野。

把我們對敵人的鬥爭繼續下去；

我們死了把正義的火把傳給你們；

把這火把高高舉起是你們的責任。

假如你們欺騙了我們，我們雖然死了，

我們也不會安眠，儘管鬱鬱花年復一年的閉關梵蘭台的野原。

這幾句詩的確是說盡了第一次大戰時一代的憂傷，因為那時人們贏得了

戰爭，但却輸去了和平，不到二十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又爆發了。

這一次世界大戰在性質上是和第一次的基本不同了。時至今日沒有一個
人再懷疑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了，但是我們的勝利不成問題了，我們能
有持久的和平嗎？持久的和平必須奠基於全世界範圍內的民主基礎上，我們
有了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今天，我們能有民主和平的明天嗎？

這是今天緊迫在千百萬人心坎上的大問題。克里米亞會議肯定的回答了
這一問題。從歷史的發展上看，假如德黑蘭會議決定了勝利的今天的話，那
麼，克里米亞會議則是保證了徹底的勝利和奠定了持久的和平——簡單的說
，德黑蘭會議決定了今天的勝利，克里米亞會議奠定了明天的民主，今天是
勝利的民主，明天是民主的勝利。

爲着了解這一次克里米亞會議的歷史意義，我們得先回憶一下從德黑蘭
到克里米亞的道路。

德黑蘭會議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底召開的，到目前整整經歷了十四個月，
以十四個月是些勝利的日子，但也是些考驗的日子。只有了解這些考驗的
嚴重性，我們才能了解克里米亞會議的重大性。

在德黑蘭會議到第二戰場的閉關這一段時間，國際間雖然有些不合拍的
調子，但那不過是一種暴風雨前的絮語而已，不能發生任何決定作用的。

去年六月英美盟軍在西歐登陸，接着蘇軍在東歐的夏季攻勢展開了，六
月七月的勝利在東線，東歐各國大都解放了，八月九月的勝利在西線，西歐
各國也大都解放了，這些輝煌勝利的日子，同時也是英美蘇在軍事上合作
最好的日子。

九月十月蘇軍的東線攻勢向兩翼展開，四線盟軍的攻勢在荷比遭受了挫
折。於是問題來了，最顯著還不在軍事上，而是在政治上。東歐和四歐的大
部份國家解放了，英美蘇三國不能對於這些被解放國家的內政取得一致的
見解和行動呢？你們說英美蘇三大強國不僅在戰時團結，而且在平時也能團
結，那麼現在這問題就是考驗了。不幸的是不僅英美對於東歐的被解放國家不
能和蘇聯取得一致的態度，即在四歐和南歐的被解放國家裡英美的態度也差
別迥然了，軍大和問題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更壞的是，比利時的內政問題
在十一月應蘇聯提議成內戰，希臘的問題在十二月初真的爆發成內戰。而法
國因爲拒絕參加維希性的四歐同盟而和蘇聯簽訂了同盟協定，更把戰後歐洲

問題提高到現實的水準。這些是危險的日子，這是些考驗的日子。英美蘇能
在和平中團結嗎？

希特勒的西線大反攻是在這陰險的背脊之下發動的，他發動這一攻勢
的目的，嚴格說不是在美國第一軍和第三軍之間進一併楔子，而是將英
美蘇的國際民主團結，機關每一個解放國家內部的民主團結，這是他在今天
唯一可以想像的出路；他不是早在一九四四年就說過：消滅了他就等於引起
歐洲歷史的社會大混亂，消滅了他就立即引起英美對蘇聯或英英對蘇
美國的第三次大戰嗎？

希特勒的政治攻勢落了空，但是他的軍事反攻提醒了同盟國家內部的若
干人：希特勒還沒有垮，現在還不是飛機起飛的時候。從那後看，的確去年
年底爆發的歐洲危機，有不少一部份的原因是由於有些人把對希特勒的勝利
看得太容易了。

今年正月蘇軍在東線發動的冬季大攻勢及其輝煌的大勝利用鋼鐵的語言
證明了：沒有英美蘇的合作固然解決不了被解放國家的問題，更不可能有澈
底的勝利。

這就是從德蘇到克里米亞的歷史的道路，這是一條充滿了考驗的道路
，正因為是受過了考驗，克里米亞的決定才是歷史性的決定。

二

那麼，克里米亞會議決定了些什麼呢？

第一、它決定了使納粹德國「徹底敗北的軍事計劃」，「從東進，西進
，北進和南進向德國心臟發動新的更加強有力的打擊的時間、規模和協調部
已商得完全同意並已詳細制定計劃」然而單是在軍事擊敗納粹還是不夠的。

第二、它決定了納粹德國必須接受的無條件投降的條款，其中包括了關
於德國的佔領，控制和賠償的三大項，其「不屈不撓的宗旨就是要消滅納粹
德國的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確保德國決不能再擾亂世界的和平」。戰爭結
束了。並不等於和平，和平是需要組織的。

第三、它決定召開聯合國會議，成立一般性的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組織；
去年九月間賴巴拿拿會議中未能解決的關於投票決定的程序問題也解決了
，第一次聯合國會議決定於二月二十五日在舊金山與中法共同召開。一般性的

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的建立是重要的，但未來的世界和平與安全能否
維持在基本上決定於英美蘇三大同盟國能否繼續團結，而這又取決於英美
蘇三國能否對於當前具體的現實問題在一體共同的基礎上執行的一致政策，
採取共同的行動，這是問題的核心中之核心。

第四、它決定了對於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這是英美蘇在戰後問題上執
行一致政策和採取共同行動的政治綱領，三國性的外長會議是執行這一政策
的機構，而波蘭和南斯拉夫問題則將英美蘇採取共同行動的實例。
原則性的政治綱領，根據這綱領的一致政策，執行這政策的永久性的機構，
有了這三者我們可以說英美蘇在戰後繼續團結的基礎，是奠定了。自然，目
前，這綱領，這機構，這政策運用的範圍還限於歐洲被解放國家，但在本質
上它是具有世界性的，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實際上就是被解放的人類的宣言
，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要是把它比成美國獨立宣言，法國的人權宣言，英
國的大憲章是不為過的。假如這一個世紀是人民的世紀的話，那麼被解放
的歐洲的宣言就是這個人民世紀的憲章。

三

克里米亞會議的基本精神是在所有的問題上強調英美蘇三國不僅要為戰
爭而團結，而且因為和平而團結正如我前所說：「唯有我們三國之間以及
及一切愛好自由的各國之間繼續增進的合作與了解，才能實現人類最後高
的志願，——一種安全而且持久的和平；用大西洋憲章的話來說，那就是
：「確保在所有一切土地上的所有一切的人，都可以在不受恐懼和不安感之
的自由中度過一生」，這種精神是德蘇國會議所已有而未曾強調的，但重要
的不是強調一般的原則，而是實現這一原則的具體的組織機構，德蘇國
會議沒有它，克里米亞會議有了它，這就是克里米亞會議比德蘇國會議進了一
步的地方。這是它的特質，這時具體的表現就在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當中。

這宣言的要點：

它「規定使三個同盟國政策一致，採取共同行動，以便發展民主原則並
被解放的歐洲的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

「當獲得解放的歐洲暫時不穩定的時期，他們互相同意當使他們的政策一致，以協助從納粹德國統治下獲得解放的各國人民以及歐洲的軸心國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解決他們迫切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歐洲秩序的建立以及國民經濟生活的再建，必須憑藉那足以使被解放各國的人民一方面能夠消滅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最後形跡，而另一方面又能建立自由選擇的可能的民主制度來達成。」

「爲了使被解放的各國人民可以使用這些權利的條件，三國政府對於歐洲任何被解放國家的人民或前軸心附庸國人民予以協助，他們認爲應於：

- 一、確立內部和平狀態。
- 二、實行緊急措施賑濟難民。
- 三、成立臨時政府使民衆中一切民主份子的代表廣泛參加，確保從速經由自由選舉以建立對於人民意志負責的政府。
- 四、必要時當加速進行這類選舉的地方，三國政府當與其他聯合國以及歐洲的臨時政府當局或其他政府，在考慮到對他們有直接利益關係的時候，互相洽商。」

「當三國政府認爲歐洲任何被解放國或前軸心附庸國中的情況有採取這類行動的必要時，他們當立即共同磋商，履行這個宣言中所舉爲共同責任必須的措施。」

總括這些要點就是說，英美蘇三國用他們之間民主團結的力量來保證所有歐洲被解放國家內部的民主團結。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有這樣一個巨大的外方來「干涉」一國家的內政，但是這「干涉」不是爲了帝國主義的私利，幫助倒退的反動力量壓迫進步的民主力量，而是爲了世界的持久和平與安全，幫助進步的民主力量，壓迫倒退的反動力量。過去，快過去了的是英美蘇團結起來消滅法西斯，而現在則是英美蘇團結起來建立和保護民主。這一來，歐洲不可能再有一些國家是親英美的，有一些國家是親蘇的，而是大家都是親英美的，把親英美和親蘇外交對立起來的日子過去了。這一來歐洲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國家內部是法西斯，而對外還向民主國家相交遊，把內政

和外交機械地對立起來的日子過去了。這一來，英美蘇的團結不僅是在軍事上的國際關係上有了保證，而且在其體的一國家的內政問題上有了保證。英美蘇國際民主的團結保證了解放各國的國內民主團結，而解放各國的國內民主團結則又保證英美蘇的國際民主團結。自然這不是說有了克里米亞會議，歐洲解放各國的民主就不需要各國人民來自動爭取了；不，恰好相反，只有解放各國人民自下而上的民主鬥爭的昂揚，配合着英美蘇的自上而下的民主前途的保證，這一個世界才能走上今後幾十年的和平、進步、繁榮的大道。

總理副會議決定了今天的勝利，克里米亞會議決定了明天的民主，今天

是勝利的民主，明天是民主的勝利。

有人說，這是歐洲的事情，和我們無關。

這不是歐洲一地的事情，這是全世界的事情，今天的歐洲就是將來的中國。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路是法蘭西的道路，立即自動實現國內的民主團結；一條路是南斯拉夫的道路，硬不自動解決問題，而最後不得不爲人所解決。時候近了，轉瞬當是費金山會議，我們還能遲疑嗎？

(二月二十二日夜)

啓事

本期「書評及其他」欄中，原有舒危震所寫的「一切的問題在民主」一文（內容是介紹昆明出版的「民主週刊」一至六期）因奉令免登，未能刊出，謹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從敵議會看敵情

黎華

蘇聯第八十六屆議會於一月廿一日復會後，到二月十二日敵國廣播中傳出：「這屆議會於考慮所訂的重要議案後，將於十三日自動休會」。在這種議會中反映了一些什麼？它所收到的是些什麼結果？這些都是值得我們重視的。為了說明這些問題，我們不得不先說明小磯內閣本身及其遭遇的內外情勢。

小磯內閣的出現，正如蘇聯的日本問題專家茹爾指出：「它是於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由於軍事上的失利帶來了尖銳的內部政治危機而組成的。它企圖擴大內閣的基礎，延緩以前議會各政黨領袖入閣。大家相信，這會在新的比較民主的基礎上，加強『團結一致』，以解決國內困難而進行戰爭。可小磯登台以來，它所獲得的不是戰爭勝利的途徑，相反的却遭受了台灣與菲律賓兩上兩次大海空軍的慘敗；在戰略據點上失去了關島、狄寧、馬尼拉、菲律賓；甚至菲律賓羣島，也全部陷於絕望，而日本本土也連綿不斷地受到敵艦的轟炸，最近美軍在菲律賓島的登陸，更是對日本本土的一個大威脅。這種種軍事不斷吃敗仗的情況下，無疑的是會增加小磯內閣的處境困難，而這屆議會又在這種困難舉行，它一方面是想利用它用來解決戰爭的困難問題，但同時它也反映出敵國戰時的各種弱點。所以倭皇在議會開幕時就這樣喊出：『太平洋戰爭現已進入既將勝利，國人應加強團結與集中力量，以打擊敵人』；小磯則以『此次議會之運籌，以敵國簡單為宗旨，以期解決戰爭之萬全』；而『東京朝日新聞』就

更加說出這屆議會所遭遇的困難，因此提出：「此次議會真可謂為戰爭議會，蓋在開會期間，隨時可逢警報。無論如何，休會二十餘日未免過長，議會應以決戰速率進行」。從這三方面的發言，我們可以知道這次議會舉行的用意了。到目前自動休會為止，小磯雖然渡過了風險，然而在這次議會中實在暴露了不少的破綻：

第一是暴露了統治階級內部的不和，小磯內閣的組成，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它是得到敵國統治階級的各方面支持，但它要能安穩不動搖，那就一定得靠着戰爭的勝利。不幸的是小磯閣運不好，組閣以來，一向都是打敗仗。所以在每次重大軍事失利時都會發生內閣鬥爭的暗潮。我們就拿這次議會舉行前一些時間（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小磯內閣的局部改組——原閣大臣藤原次郎及藤原以吉田茂代替，同時又選了實業政治會小林勝進入閣為國務大臣，這就表示著內閣與財閥間因戰爭失利（十二月十五盟軍在明多羅登陸）所引起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是代表財閥的藤原失敗下台而告一段落。然而到了議會初次休會期間，美軍在呂宋的登陸，又給與日寇國內以嚴重的波動，這可從下面的事情看出：（一）小磯十一月召集政府領袖討論「各種事宜」。日方領袖均促國家採取結束戰爭之新方針。其主要報紙均求國內團結。（二）日政府十三日宣佈採取緊急措施，其中主要為加強防空，增加軍火生產、糧食食糧、動用全國原料及糧食征兵等五項。（三）日內閣閣員，於十三日午後一時在

小磯官邸舉行會議，就當前諸問題交換意見，並決定每星期從本週（十五日）起，每星期四午前十時，各閣員會談商討，並向首相進言事項，每星期六午後二時至三時各閣員個別或會同與首相會談，聽取政府實施之運籌問題。（四）小磯定十三日與所有高級軍事人員（包括）前作戰者在內）會面。（五）一月九日，小磯辭意向小磯進言：「如有必要，雖解散議會，亦所不惜」。同時從新聞報導中也透露出一些消息，如一月十五日美軍戰時情報局宣稱：「日本國內正有一種運動，迫使日本政府辭職，並謂日本通訊社說若干新近成立之派系，正與勇敢參與空前未有之政治革新」。同日東京亦有類似的消息：「與戰局之深刻化相呼應，敵黨必須急遽確立貫徹戰爭之國內態勢。此種希望，已被提出至我國政府問題的最前線」。由於盟軍呂宋登陸的結果，小磯內閣漸呈不穩，當時有人引出過去東條演說下台是起因於空軍空陸而協助小磯登台可謂並非無故的。小磯內閣雖幸夫登台，但是最後結果，實業政治會於去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會議中決定解散，而組織「新黨」以替代。在人事更動上，實是本月十日內閣的局部改組，改任國務大臣兒玉壽雄為文部大臣，讓厚生大臣藤澤正忠為國防大臣，內閣當局官長，而以厚生次官和川勝六升任厚生大臣。到十四日小磯召開閣員會議後，又拉攏前任內閣顧問官。於是這些事實也足以說明敵國統治階級內部發生許多不穩。這並不是如日寇自己所解釋的，說此次小磯內閣之局部改組，會使內閣更趨加強，相反地，小磯內閣這次因為得到財閥與軍臣間的擁護，才暫時將倒台危機穩定下來了。

可是軍閥與財閥的矛盾，隨軍與財閥間的矛盾不

軍，他們是會在新的軍事失利下再次爆發的。

第二，我們可以看到敵國的軍需生產的困難。在這次議會中，日寇相與海相的報告，都是痛罵敵方的報告，他們的結論是歸於軍需生產不足。海相米內認為「在目前戰爭情形之下，對於飛機之大量需要仍在增加」，而陸相杉山則強調「陸軍航空及海軍航空隊神風特別攻擊隊之戰績」。簡單的說，日寇是以武士道的冒死攻擊精神，來代替前線軍需數量供給不足。其次，就是在這次議會的質問中，也反映出一些事實，像議員船田垣毫不掩飾指責：「現內閣成立，已有六個月，對於軍需增產，並未請求適切之手續，缺乏實行力，觀乎最近之輿論，可知國民對於軍需生產之不安，已顯露於外」。而小磯與吉田的答覆不能不承認：「必須設法渡過目前下之時局，現在軍需生產對於必要之生產量，仍有不充足之處，乃屬事實」，與「飛機之生產，與資源關係，實為困難問題」。還有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月十七日東京廣播：「飛機不足是國民普遍的呼聲。這是誰的責任？飛機工廠的職工說：我們費死作工，為何還是不足？國民又說：你們儘管苦作，我們仍然看不見飛機。問飛機生產局長遠藤吧！遠藤說：你們不用管。可是飛機到那兒去了」。要緊一段話里，那就充分表現出日寇飛機缺乏之苦。由於飛機生產不足，不但如米內所宣稱由於制空權逐漸敵手，以致致在菲島戰事失利，並且暴露出日本本土空防的脆弱。在今後盟軍海上與空中的打擊下，日寇的軍需生產，必定要受到工廠疏散，資材缺乏，工人勞動情緒低落的影响，這些困難日寇是無法解決的。

第三是糧食供給不足。糧食不足本來是日寇最一個嚴重問題，當它打下南洋各地的時候，日寇

會盡其宣傳「南洋是帝國的谷倉」，可是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南洋上戰事連續失利與空襲頻繁之下，更加使日寇糧食供給的困難，所以在東京廣播中就這樣透露着：「敵局之發展，已不容許對岸之澳洲、紐西蘭糧食全幅依存政策，自不待言。隨處方空襲之頻繁，已痛感力謀急速穩定糧食之國內自給及盡量之地方自給之必要」。同時在議會質問中，農商相島田關於糧食的答覆也承認：「糧食問題，余既不能觀，但亦無不安」。並保證：「關於主要糧食，當堅持相當之基準，絕對不再減低」。農相石波一月二十一日在衆議院演說，則指出「下一財政年度之預算，將集中於作戰力量及保證糧食生產之充足」，從此就可以見到日寇糧食問題的嚴重化。在太平洋戰爭開始，日寇節節勝利下，日寇還不能解決糧食問題，至於今後整個戰爭局勢發展，自然會使日寇更感頭痛。

第四是敵國民氣日趨消沉。日本國民，誰也知道他們是深受軍國主義與武士道的訓練，一般上說他們是有強烈的狹隘愛國主義思想，可是這些思想在今天已經經不起日寇連戰連勝的失利而受到打擊。在菲島前線上雖然出現所謂「神風攻擊隊」，但也有發現整批的日本士兵投降；在後方呢，這種對戰爭感到無希望，悲觀消沉的暗潮已是相當普遍。所以根據於議會質問中，就喊出「集中力量團結一致」，而小磯更感骨節的吐出：「關於敵後態勢，其進行精神之振振，今計仍不充分，實引為遺憾」。在議會質問中，石波也承認敵國人民已有輕視通貨之風。特別在今後盟軍空軍大舉空襲與軍事失利及食糧缺乏的條件之下，誠如美國國務院司長指出：「他們對天神和日本種族不可征服的迷信，就造成『道義和感性的混亂』」。

從這次議會所反映出的這些弱點，我們是否就可以像某些人一樣誇大敵人的弱點而認為日寇要求和平已普遍全國，並且這個和平運動已迫使小磯登台，以便執行投降政策的人登台呢？或者看到敵國政局稍為變動，就以爲這是日寇改變國策投降求和的朕兆呢？甚至還有人專想靠盟軍的出力，使日本先於德國屈膝求降的這種沒有出息的想法。但是在這次議會中所獲得的結果，已證明他們的想法是落空的。爲了回答上次所列舉的論點，我們對於這次議會所收到的結果，就應有一個認識，以爲這次議會所得的結果是什麼？我們認爲有三點：

一、通過目前未有的預算案，我們知道這次預算案，在一般會計歲出入爲二百二十四億餘萬日元，追加預算爲四十一億日元，共計二百六十五億九千二百萬日元；在今年前臨時軍事費八百五十億，二者合計起來，共達一千零十八億，像這一筆巨大的無此的預算，在這次議會中竟敢毫無聲地通過了，這不能不是說明日寇政府如何操縱着議會，爲所欲爲的執行自己的野望。同時另一方面又說明了敵國在財政上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仍然通過這個龐大預算案，正是日寇表示作戰到底的決心。正在準備着上與陸上的決戰來臨。

二、這次議會所收到第二個結果，是全國支持小磯爲遂行決戰所提出的如何增進防禦與戰力，增加軍需的生產及確保糧食的方針。其明顯的，就是上述的總預算的通過，其次在二月七日敵議員山本英輔等所提十條具體案作爲前行緊急國策。其具體內容與一月十二日敵國閣議所通過的實行決戰措施：一、加強防空措施；二、嚴格施行軍火增產計劃；三、徹底增加糧食生產；嚴行自給自足；四、加強國民勞務；以及全國人力之總動員；五、使一戰

（下接一三五頁）

紅軍——新型的軍隊

為慶祝紅軍節第二十七週年而作

瓦西利耶夫上校作

紅軍的冬季攻勢，已使那從喀巴爾南麓綿延到波羅的海的全線德軍瓦解，這種冬季攻勢已引起舉世讚美。那是很可以了得的，因為戰史上從來沒有看見過在戰鬥行動的規模和速度方面，以及在向敵軍以強固的，準備有素的防禦為後盾的龐大而頑抗的敵軍，實行進攻的速度方面，和紅軍的這次冬季攻勢可以相提並論的大會戰。如果想一想紅軍的這次冬季攻勢，是在三年中的大戰之後進行的，直向去年夏天，紅軍始終對全世界最強大的軍隊之一——德軍進行那種大戰，如果這還嫌想，紅軍這次冬季攻勢成就的莊嚴宏大，就更加使人驚愕了。這一戰足以證明：和希特勒的作戰極不相同，紅軍在戰爭的進程中，並不會消耗了它的實力，反而使它的實力和戰鬥力更趨着增進，直到它已變成全世界中最強大的最精銳的軍隊了。

紅軍在進行一種繁力的戰爭時，竟能夠同時增進自己的實力，不僅保持住，甚至更增進了自己的戰鬥力和精神上的強勁性，紅軍是從什麼地方得到這些素質的呢？

要說明這一方面的根源，那就在於紅軍所固有的若干特徵，紅軍是一種新型的軍隊，是在本質上和全世界所有其他一切軍隊不同的一種軍隊。

紅軍是新型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唯一武力。在這個國家中，所有一切政權都屬於人民，國家的所有一切財富和生產工具都是公共的財產。蘇聯的對內和對外政策，與人民的利益完全和對一致。對於外國的霸佔，以及對於別的國家人民的征服，是跟蘇維埃國家背道而馳的觀念。因此，這種一種國家的武力之所以要維持着，決不是

為了擴張領土的目的，而是為了要保護祖國的安全與獨立。由此可見，紅軍是專為保護人民的利益，而創立，而存在的，如果說紅軍畢竟作戰了，那也只是進行一種正義的進步的戰爭。戰史教導我們說：到底總是那追求着具有歷史進步性的目的的軍隊，即使是對比較強大得多的敵人作戰，也常常是打勝仗的。這一點已一般地由戰爭史，而且特別是由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的國內戰爭史所證實了。

進行一種正義的進步的戰爭的軍隊，對那被征服動機所支配的軍隊，總佔着一種道義上的優勢。紅軍官兵們都知道這為什麼而戰，知道是為他們祖國和人民的利益，因而也是為他們自身而戰。對於他們正為之而戰的正義感和高尚的目的，在他們的心中培養成一種不可征服的精神，作自犧牲的準備，防禦中的剛毅和堅強，攻勢中的決心和氣勢。要儘可能迅速把敵人打敗的熱望，創造性、機智，以及關於增進軍事訓練的不斷的要求。在這一方面，紅軍始終勝過它的敵手。

使紅軍和所有別的軍隊有所區別的另一件事，便是：紅軍的官兵們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起積極的作用。紅軍有極其繁茂的政治訓練的系統，以增長士兵們的政治智識與一般文化水準，以便他們能更清楚地了解戰爭的目的，和作為一個軍人應盡的天職，並且能更有才智地行使作為一個公民的權利。這種訓練擁有很適當的訓練有素的人員，擁有對官兵們進行政治教育和一般教育以及官兵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紅軍的政治工作人員，就

是由官兵構成的，他們積極協助指揮官進行軍隊的政治教育，促進紀律，並激勵士兵們去利用他們的體力以貫徹他們的軍事任務。戰智力和軍事品質方面，他們是軍隊中的精華，他們憑藉他們的威風，以身作則，剛毅果敢與英雄主義，把他們所屬的部隊團結起來，在完成軍事使命中起領導作用。

紅軍是一種純正的人民的軍隊，是為保護祖國和人民的利益而建設起來的，紅軍是決不會和人民衝突起來的。紅軍不知道什麼階級的敵對，軍官們都是從那和士兵一樣的社會階級中來的。由於沒有一切社會的階級，這就使每一個士兵都能夠在經過一種適當的訓練以後，擢升為一個軍官或一個將官。軍隊中的社會同一性，一方面決定了官兵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決定了關於教誨並維持紀律的方法，那大概是基於每一個別的士兵對於履行義務所抱的自覺態度。

種族的和民族的偏見，對於蘇維埃社會是毫不相干的。因此，雖然是由許多種不同的民族人員組成的軍隊，而在它的隊伍中却不知道什麼叫民族的仇恨與敵對。紅軍反映出把蘇聯許多民族團結在一起的友誼。所有官兵們，不管他們屬於什麼種族或民族，無論就軍役的年限和性質說，無論就擢升說，都處於同等的地位。

我們只是才列舉了紅軍的一些基本特徵，這些特徵就決定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所獨有的素質。這些特徵，正像蘇維埃社會的特徵一樣，使它賦有別的任何軍隊都不知道的——一種力量的泉源。正是這一點，使紅軍具有了作為一種新型軍隊的特徵，使他們能完成決不是別的軍隊的力量所能完成的任務。

紅軍的集體英雄主義

尼古拉·科斯特羅夫作

當戰鬥向德國中部各州進發的時候，莫斯科

不斷地發出祝捷的禮砲聲。過去幾個月來，勃
巴便來世驚愕：紅軍向前推進了好幾百公里，粉碎
費希廷的強固防線。紅軍差不多已把波蘭全境的敵
人肅清，闖進了波美拉尼亞、勃蘭登堡、和上西里
西亞；紅軍已把東普魯士和德國中部各區之間的聯
繫切斷。紅軍的力量在這次攻勢中又顯示出：紅軍
軍事組織的優越性，總的將領們的才幹，以及蘇聯
英雄軍人優越的精神素質。

英雄並不是超人，他是一個尋常的蘇聯軍士
身，準備完成剛勇的勳業，準備為高尚的理想而犧
牲自己。一個人不必特別費事就可以在前方隨時隨
地找到這樣的英雄，在每一連，或每一砲列，或每
一騎兵中隊里，我們都置身在英雄們的行列中。

從前方來的大量文書，在在說着蘇聯軍人的英
雄氣概。士兵克爾諾夫，中了幾個德軍的囚套，陷
在戰場中，拒絕活活投降。他急急取掛在身邊的手
榴彈二顆，在隨即發生的爆炸中，克爾諾夫壯烈犧
牲了，但是他的敵人也同歸於盡。士兵馬特羅索
夫，用自己的身體阻擋住一連防舍的槍眼。他死在
機關鎗的洪流下，但是，他的犧牲使整個部隊都能
繼續前進了。一九四二年在塞巴斯托波爾，有一批
水兵用身體圍住自己的身體四周，投身到連環的
德軍坦克底下去。英雄們殉國了，但是，敵人的担
竟也阻止住啦。

我們怎麼能瞭解這種壯舉呢？蘇聯中部的
這種集體英雄主義的根源是什麼呢？

俄羅斯人民久已因為他們的勇敢而著名。在
戰鬥中的大無畏精神，是我們光榮的傳統精神之一
，它的根源應該追溯到我國古代的過去。但是，俄
羅斯軍人的光榮的過去，已由於我們今天在戰場上
所看到的場面，和形之下而減色了。

紅軍是一種新型的軍隊。它是從那許多世紀以
來處於奴隸之中一旦獲得解放了的人民中間湧現出
來的。經濟上與精神上復興的時代，在蘇聯人民的
身上灌注了巨大的力量。蘇聯軍人，是一種進
步的人，不久以前這是在集體農場上和工廠中，以
及學術機關中，把自己的精力運用在社會事業上面
的一種人。他是勞動技術和藝術方面的革新家。創
造力形成他的生存的中心了。

英雄主義在戰前，在和平建設期間，就早已成
為蘇聯生活的一部分。它具體表現為巨大的新的
建築和運河，具體表現為對北極和空中的征服，蘇
聯人民盡心盡力勞苦操作，以創造新的繁榮的生活
。勞動變成了榮譽的，英雄主義的，有價值的事業
了；每一年，勞動就由新的成功和成就作為報酬；
國家榮譽昌盛起來了。

他們這道樣子生活着，他們就這道樣子生活着，
直到戰爭爆發。但是，那時，這種和平建設的生活
由於德國侵略的入侵而中斷了。千百萬人民離開了

他們的工廠和農場，在紅軍的隊伍中找到了他們的
位置。他們對勝利的信念是無可動搖的，但是，要
作實際行動以爭取這種勝利，並且要犧牲——這一
點蘇聯人民知道得很清楚。和平生活的英雄，俄
國士兵英雄了。

在戰爭的進程中，紅軍士兵們顯示自身的力量
，使他們的敵手喪魂落魄。蘇聯軍人懷着最深刻的
憎恨注視德寇，當他看出德寇是個什麼東西——眼
裏的暴徒，殺戮孩子的劍子手——的時候，他的心
中就充滿了如焚的輕蔑。蘇聯士兵們看到了被德寇
焚為焦土，化為廢墟的各城市和各鄉村，他們看到
了被蘇聯孩子們的屍體塞滿了的井，看到了被翻地
開朝天用繩子吊着的女人們，看到了被追害、被殺
害的老弱子們。在蘇聯士兵看來，德寇不僅是來奪
他的國家喪失自由，來把它變成奴隸的一種外來敵
人，這還不是他最要緊的。蘇聯軍人創造了、所
建設的一切。蘇聯軍人向敵人的遺棄人，並且
使發生最大的人身的悲劇。紅軍中的每一個官兵
都感到有些私仇要報。希特勒的劍子手。
「在這次戰爭進程中，德寇曾使你中間的每
一個人感到什麼悲哀？」有一個部隊藉前線報紙發
出這個問題，徵求答案。

從答案中間可以看出：三百個官兵有二百二
二十八個親戚被德寇殺死了，有二百二十九人被擄
到德國當奴隸去了，他們的故鄉各鄉村和各城市之
中，有八十八處被焚為焦土了。三百份答案看了便
人不能不深深地震動。

士兵希洛維奇，是白俄羅斯人，他在答案中寫
道：有一百十三個人，在他那曾經繁榮的塔爾基村
村的大火中被燒死了。在希洛維奇住過的那地區
，五十個鄉村已完全毀滅。希洛維奇自己的父母
（下接第九三頁）

論陣地戰與運動戰

蘇·斯特魯威作
焦敏之譯

(本文譯自馬克思主義雜誌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期合訂本) 蘇聯文庫社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期合訂本在馬克思主義雜誌下「雜誌中譯出來也。作者先介紹了陣地戰與運動戰兩種作戰方式產生的原因及演進，更進而批評了歐美許多軍事家的戰術思想，和指出了蘇聯的戰術方法，這就綜合了兩種作戰方式，而在這大英美的愛國戰爭中獲得了接二連三地的勝利。文中的材料，雖只引用到一九四三年，但它依然能幫助我們瞭解蘇聯紅軍這次偉大勝利的成因。

(一) 上次大戰中陣地思想產生的原因

一九一四年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才三四個月，交戰國雙方的軍政首領便已經因為軍事動作所表現的那種奇特的，而主要的是那種在前所未有的性質，太感困惑不安了。在那時，一切的新聞報章和評論報導，益發表現出了這種「打硬仗」，「膠着戰」以及「無出路」的傾向。許多人認為可以把一個舊的術語「圍攻戰」應用到新的軍事現象方面，這在軍事術與科學為區區而鬥爭的時期，表現的尤為顯然。然而轉瞬之間，對於新的現象的觀察，人們又廣泛地傳播着另外一個新的術語「陣地戰」。這個術語，固然在軍事術中總不是一個新的東西，可是恰與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在西戰場上(法國)所達成的那種局勢以及一九一五年在東戰場上(俄國)所達成的那種局勢非常契合。

自然，「陣地戰」一概念，是與「運動戰」——即是說，在戰場上可以自由機動的運用龐大兵團的戰爭——的概念對立着的。運動戰的條件，其特點是軍隊在寬廣距離中的移動，實現廣泛的包圍迂迴運動，在側後予敵人以打擊等等。

一九一四年抄與一九一五年初的新形勢，是在於基本的陣地穩定後，形成了連續不斷的戰線以及敵對兩方所構築起來的其它防線。在西戰場，接連不斷的防線，在一九一四年抄，由北海伸到瑞士邊境；而在東戰場，於一九一五年中夏，則由里加灣起至羅馬尼亞邊境，其綿亘不絕的陣線，也都趨於穩定。綿亘不絕的陣線及防禦地帶均向縱深發展着：在第一道防線之後，跟着築有第二道防線，第三道防線，甚至後方防線等等。在部署軍隊進而改善舊有的防線的時候，不僅可用它來發展向縱深的防線，並且也可用來去改善

防禦工事本身以及網線系統。在歷經不絕的防線中構築防禦築城之際，不難開始廣泛應用了泥土及樹木，而且也採用了鋼骨及水泥。因此，火力體系，機關槍以及大砲火力的防禦體系，其構築必須是堅固不留一切射擊不實的地段存在於接近防線的地方。鉄絲網加強了起來，上面通着電流，此外又建築了各種的障礙物及陷阱等等。自然，要攻克這種防禦的陣地，是要求最大的努力以及前此所未用的人員及彈藥的消耗的。

結果就發生了一種論調，認為由這種陣地的「無出路」的「死巷」中，想打通這一條出路步上廣闊機動的領域，總是不可能的，縱然可能，也須付出空前的代價。平日習於野戰——這種戰爭以戰場上龐大兵團相對的自由的移動，以及各種側翼，迂迴和其它機動的實現為特徵——的將領們，在他們硬「啃」堅強防禦的，佈滿了射擊武器以及那些向縱深發展的敵人的梯隊之際，不覺迷途失手足無措了。

當時許多政治家，的確也不厭他們，他們的心理已表現在法蘭西雜誌中：「現在，前方到這都有穩定的趨向。在克勞及多第斯區我軍祇推進了二百公尺，在恩尼及香賓——幾公尺，而在阿爾登及深庫——則祇幾公分。照這種速度發展下去，我們勢非再經過幾百年，才能解放法國」(拉伊曼德·普恩卡萊：「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回憶」第二六五頁，一九三六年莫斯科國家社會經濟出版社)。

過了幾天之後，十二月十七日那天普恩卡萊又悲憤地寫道：「我們必須承認，在很久的期間中，運動戰是不可能的」(前揭書第二七四頁)。

是年十二月底，協約國的另外一位政治家勞合·喬治，當時仍任英國的財政大臣，曾分發給英國的軍事委員會委員們一份「關於前線狀況及政府的任務」的備忘錄，在這份備忘錄中，勞合·喬治於稱名為「在西線所達成的

的無路可逃的「第一節」中，引出了這樣的結論：在當時聯盟國所掌握的「切門爭手段」之下，「……任何一種在西歐戰場上顯當地突破德軍堅強防線的企圖，結果都必定失敗而遭受可怕的犧牲」（連維特、勞合、喬治：「戰爭回憶」第一——二卷第二六一頁。一九三四年莫斯科國家社會經濟出版局版）。

這決不祇是協約國的軍隊，而且敵軍也是處在這種狀態之下。儘管德軍方面在那個作戰時期在東部及山前方面仍佔優勢，在攻擊時有非常便利的防禦，德軍亦無突破防線之能力。不但如此，陣地防線的產生，其對於德軍的不利，尤較協約國而上之，因為這就是意味着他們速戰速決與閃擊勝利的破滅，意味着持久戰對德軍的不利。

法爾登因寫道：德軍「最高指揮部，很清楚地領會到它轉到陣地戰的這一切害處。它是人們所選擇的（？）可能害處最小的一種」。當然，他最後所說的一句話，我們是不可以老老實實的相信它的，因為德軍統帥部決非「選擇了」陣地戰的作戰形式；它也是因為有許多原因和環境的逼迫而不得不如此啊，這一點，待我們在下文敘述。

(二) 現代陣地戰的形成

早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以及過後幾年，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當無數的人們對這次戰爭的經驗企圖做一綜合而理解其意義時，屢屢地發生了這樣的問題，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中所進行的陣地戰有什麼意義？在過去的歷史上有過同樣的先例嗎？

如果我們不能稱十九世紀後半和二十世紀初年的戰爭為陣地戰（如現今所理解的這種術語），那麼，不論怎樣，在大多數這些戰爭中已發現陣地戰爭的因素了，這些戰爭作過仔細考察的人們便不能不指出這種因素增多的某些傾向。

由漢斯·德爾布魯克起頭而後承他撰寫了一本宏文鉅著「在政治史範圍中的軍事史」的麥爾斯·達尼爾斯（順便說一句，他是沒有多少成功的），他特別列出了一章研究一八五四——一八五五年的塞巴斯托波爾保衛戰，他妄稱它為「世界史上的第一次的陣地戰」。無疑地，塞巴斯托波爾保衛戰的經驗（塞港並沒有由陸上加以築城式的掩護）證明，由砲兵與步兵

的火力所加強了的野戰築城以及由精神鎮定的軍隊所衛護的野戰築城，是在保衛戰中起多大作用了。然而要稱一八五四——一八五五年的塞港保衛戰為「陣地戰」却是不正確的，因為問題祇是說到一個面積不大的巨城中的圍攻及防禦，而在其他戰場上（多瑙河及高加索）則顯出了機動性質的動作。

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的俄土之戰，尤其是波列夫尼茨圍，再次證實了工兵步兵自己所構築的防禦的野戰築城的重大意義了。但關於這一點，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的經驗，才更充分地證明了它。

可是祇有鳳毛麟角的觀察家及研究家們才於這種經驗中看出了軍事藝術發展上的某些新的現象。許多人都認為日俄戰爭時，祇因射擊的威力，軍隊才爬到地上，挖掘壕溝，構築伸長綿延的野戰防線，似乎這祇是因為東三省戰場的特性。甚至連那聲譽威震的軍事作家如斐丁南·福煦，他也說東三省戰爭所以發展的「緩慢」，祇是因為戰場的特性，同時這次戰爭的教訓，由歐洲戰場上大概將要發生的作戰性質來看，好像也沒有什麼直接的利益（見福煦元帥著：「關於作戰」第十四頁，一九三七年莫斯科軍事出版局第二版）。

福煦及當年許多國家中大部分的軍事作家，都往往不加批判地把握着時代特殊的作戰形式及方法，搬到完全不同的新時代，即軍事技術各方面猛烈發展，軍隊數目驚人增加以及鬥爭的戰略戰術形式空前複雜的時代。但福煦舉究與其他許多的軍事作家及實際的指揮將領不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勇敢地打破了自己過去應有的成見，而加入了那些在戰爭進行中慎重研究戰略戰術上諸新現象的將領之列，特別是他們都企圖尋求打進軍事史的所謂「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陣地戰」的那種現象的意義。

福煦在他底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的回憶錄中所寫的轉向陣地戰的原因的分析，以及他對這次戰爭問題的設法，有不少的趣味。

早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福煦就在致法軍總司令霞飛的信中，述到當時應有的陣地戰的問題。福煦在特魯門爭的這一時期時，在他底回憶錄中寫着：「伊泊爾一帶的戰鬥屢次表明因為射擊武器的發展，尤其是因為機關槍的應用，防禦有多麼大的力量了。攻擊的力量沒有照同一比例增長起來。這就引到了軍隊彼此相持不下的停滯局面及拖延。在這種現象中，顯露出了戰爭的新形式——與所謂運動戰對立的陣地戰。在事實上這只是表露無力的承

戰術與戰術學有相當的保證，其發展不能粉飾防禦一方的那些抵抗武器，實是軍事動作的危機（編者著「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的回憶」第一七六—一七九頁，一九三九年莫斯科軍事出版局版）。

進攻與保衛手段的連續不休的競賽，是軍事技術發展的特性。羅格斯尼羅夫地提出了軍事技術進化的這一方面。譬如在「反杜林論」中分析海軍技術發展時，恩氏就指出了砲兵大砲的競賽，而到以後，一方面是魚雷艇，另一方面是保護兵艦的裝甲。在這種競爭中，恩氏正確地看出了海戰方面內部的階級運動法則的呈現（參見「反杜林論」第一四二頁，一九三八年國家政治出版局版）。在陸戰方面，也進行着攻擊武器與防禦武器不間歇的鬥爭。在軍事發展上，每每在一個時候和整個時期某些武器開始對戰鬥及作戰的性質發生絕對優勢的作用。此外，進行戰爭所採用的武器的質與量，以及戰鬥任務的解決最妥當地改變這些武器的能力，即指揮官及士兵的軍事訓練，也有最重大的意義。

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所發生的空前未聞的軍事動作的陣地形式的規模，實軍事發展最顯著階段的一個新階段，是由它以前的一切進化以及技術經濟，政治軍事領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所形成的那些具體而客觀的條件下所必然地產生的。

羅爾正確地指出了機關槍火力對強化防禦的特別作用。正是因為機關槍和野戰砲的接合，才給予防禦者以特別的堅定屹立性。至羅爾的另外一個論斷——攻擊武器的力量沒有防禦力量的增長而增長，却還值得——加討論。砲兵的發展已經在那個時期（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之前）給進攻一方以非常強烈的武器。大家都知道，甚至持久形式的築城也在抵禦火自砲砲擊致命打擊的砲火時無能為力了，但是大多數的軍隊，重砲是少的；在參戰軍隊整個的砲兵中而射的大砲，其比重不十分大的；通常地雷不足，野戰砲只是在戰鬥激烈的進程中才必需應用，坦克在下次大戰的最初兩年遠完全沒有。所有這一切便於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的頭兩年造成了防禦武器對攻擊武器的顯著的優勢。這是形成固定的防禦陣地的先決條件之一。

羅爾在提出自己的主張說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陣地戰，這不是戰爭的特殊形式，而只是「戰鬥動作的危機」時，他是與當時最流行的意見一致的，即是說：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的陣地戰是因將帥們的不學無術而

產生的。許多人認爲相持的陣地戰，這個不是整個軍事危機的結果，而是指揮藝術危機的結果。勞合·喬治也與這種觀點相近，他在他底軍事備忘錄中就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以及到大戰進行時仍然長期「停滯」的防禦陣地的將領們猛烈加以攻擊，勞合·喬治說到軍事機關的政策時非常刻薄，這種政策，「不是引到對未來戰爭的準備，而是對早已過去了的戰爭加以準備」（勞合·喬治「戰爭回憶」第一——二卷第一一〇頁）。

的確，一切國家之中戰前戰時的動員計劃，都是按照短期的運動戰計劃而定的，而德軍於開戰後的一個月，即在馬恩河會戰之前夕，自領地聲稱，再經過六星期，整個戰爭就告結束。交戰國雙方的將領們沒有在軍事上預見到新的現象——戰爭的持久性以及鬥爭所採取的那些陣地的形式。

但由此便得出一個結論說，只是這「客觀的因素事先規定了陣地鬥爭形式的產生而作爲極長時期中的優勢的形式，那也是不對的。問題不只在於多數將領的落伍及無能，甚至也不在於自動射擊武器火力對防禦有特別的力量，實則起了最大的作用的，在一定的時期，交戰國雙方的兵力在決定的戰線上是要勢均力敵的。當然，這不是說人只與武器數量的數量的相等，而是說不論在那一方都沒有具備足夠的力量在正面的攻擊戰中獲得重大的成果。此外，基本戰線的界線——譬如法國戰線——由北海到瑞士邊境——不論它與過去戰爭比較起來如何廣闊，總還是對於大規模的運動戰，在新的條件之下，是一個制約的。佛龍茲說：

「在敵對的交戰國雙方無力的基礎上所造成的陣地性，追求着直接用力打擊的解決。在另一方面，以有限的領土及最豐富的技術爲首的客觀條件，允許每一方，在固定的陣地轉到防禦拒絕迅速的解決。這兩種變換的結果，就是陣地戰術以及特徵了它的戰線的固定性及停滯性」（選集第六三——六四頁，一九三四年莫斯科出版局版）。

（三）紅軍綜合了戰爭的陣地形式與運動形式

式與運動形式

蘇聯紅軍在最初成立的期間，就認爲必需把戰爭的運動形式及陣地形式結合了起來。列寧與斯大林要求紅軍聯隊時時採用伸屈自如的運動戰，

在國內戰爭時代以及到在革命的長年中，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戰術上的要求

及不遺餘的戰術訓練的經驗，而敵視和阻礙這種運動戰及戰術結合了下來。

在一九二三年的一書「俄國共產黨的戰術問題」中，斯大林指出「戰術的組織形式之各兵種的組織形式，應當適應於作戰的形式及方法」，因此戰術的組織形式中，各兵種的作用是不同的。

斯大林同志寫著「在軍隊中的一切的作戰形式，應當根據環境條件的合理運用，而戰術地把它結合起來」，及時地根據環境的不同而採用這種形式或那種形式」（一九二三年三月十日「真理報」）。

戰術的組織形式的運動形式及陣地戰形式所說的話，以及關於軍隊在各種條件下作戰的總的訓練，是非常有趣的。

關於運動戰及陣地戰的問題，關於在「門」等戰術及其結合的優勢問題，佛德烈不能為說明及尋求已往戰爭之經驗而提出，且為規定未來戰爭的戰術的性質而提出。

佛氏在許多論文及演說中屢次指出，蘇聯被迫加入的未來戰爭，必完全帶着運動性。蘇聯軍事計劃中，蘇聯必須加入的領土，以及主權的條件（軍事計劃）來決定，紅軍必須會進行高速度運動的戰爭，必須具有極大的敏捷性及攻擊精神。

佛氏認為在當前戰爭中，紅軍必須以其高度的運動性，以備其技術的相對的優勢。佛氏在談到防禦時，也未談及防禦力量的技術的效力，在防禦也是不可假用地增長的。他本人為提高這種實力而努力。

佛氏能對運動及陣地問題的短論法，是對複雜的軍事現象進行分析的光輝的例子。佛氏是由他的經驗，由它一切的多辯論而產出這些觀點。

要決書方面的結論。

「……對我們說來，是既無絕對不變的東西的……指揮官的靈敏表現在他利用他管轄的各式各種的手段的能力方面，而選擇那些在一定的空間及時間所能發揮最大效果的手段」（選集第六四頁）。

佛氏正是從這觀點提出了結合運動戰與陣地戰門等形式的問題。

「在我們黨中有些人們認為是肯定了運動的原理，就可以完全把與所謂陣地有關係的一切東西放棄……當然這種結論是很大的錯誤而對紅軍非常危險的。這種荒謬地劃然地把它劃割劃割立了起來，一般地是不正確的。從來沒有那一種最敏捷的戰爭是沒有包含陣地的成分的……我們未來戰爭基本的佔優勢的性質就是運動戰的性質。但同時這種運動性，本身要求對作戰的陣地形式作廣泛而充分的認識」（同書第六三及六四頁）。

在紅軍操典之中，這種指示已成為戰鬥行動的主導原理，它永遠是重指出軍隊必須掌握作戰的及戰術的靈活性，有實現巨大的勇往直前的進攻及巧擊的本領，同時又善於進行最高限度的沉着穩健的防禦。

佛氏上的這種命題，已由蘇聯於此次偉大愛國戰爭之前與蘇聯敵人的若干衝突中實現了。大家都知道，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冬季的蘇芬戰爭，在主要的戰線上——卡累利亞地峽——採取了堅強的陣地戰的性質。然而

佛氏的防禦是一種堅固的防禦，是利用最新的軍事工程技術建造的，有堅固的防禦，以水為憑，而充分的利用了地形的地形（有湖、森林及山岩）其性質又格外加強了白芬的防禦陣地。但不管這些條件下門等陣地戰困難

——零下四十度的冷天，且白雲很短，遂將陣地戰——，限制了空軍的活動，然紅軍突破了曼納林防線而攻克了它。

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冬季卡累利亞地峽的戰役，一方在證明在現代戰爭中可能發生一個陣地，而在陣地上必然產生某些陣地門等的形式，另一方面在證明新的攻擊武器——坦克、飛機、大炮、紅外線、自動步槍、兵工器械等——的英勇剛毅而巧妙作戰的軍隊，是可突破任何一種最新的防禦工事及最堅強的防禦的。紅軍在現行戰爭中應用它的行軍大獲勝了這一點。

以下我們就來檢討一下現代戰爭的經驗，同時先看一着在第二次大戰爆發以前各國家軍隊中對陣地戰及運動戰的間斷性的關係如何。

(四) 德軍閃擊思想及英法陣地思想的對立

關於未來戰爭及作戰動作的性質，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外國所發表的意見，是極其不一的。一派作者的意見，認為決不能由特務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陣地鬥爭形式的安眠狀態中解放出來，同時斷定形勢將來臨的新的世界大戰，必然是陣地性的非常持久性的戰爭。反之，另一派的作者認為軍事技術的猛烈發展，首先是空軍及坦克，却早已注定了為一種截然不同的新性質的戰爭——運動戰，速決戰。外國軍事學家之中從它的一切複雜性及多樣性方面正確處理問題的實在是鳳毛麟角，正確地判斷在世界最大列強之間未來大規模的戰爭中，以什麼樣的形式進行戰鬥及動作的，也是很罕見的。

很典型的，法西斯國家的軍事作家企圖以一種片面性來解決這些問題。誰都知道，意大利杜黑將軍的作戰的觀點，是由陣地戰鬥解決不了而出發的。照他底意見，陸上的陣地必然穩定，必然表現凍結的形式，不論哪一方都不能對陣地實現決定的突破，所以祇有奪取制空權，基本上由轟炸機所構成的驚人的無敵空軍而壓倒敵方的抵抗，才能獲得解決。

另外一些軍事作家則不是把一大賭注投在空軍方面，而是投到坦克方面。比如奧國的愛曼斯伯爾格將軍就是屬於這一派作家，所著「坦克戰」於一九三四年出版於希特勒德國（慕尼黑），無疑地是替希特勒德國寫的。愛曼斯伯爾格不否認空軍的意義，但認為有決定作用的是龐大的機械部隊。據他說，自坦克發明以來，「戰略上已回歸到古代的因素」，優勢的進攻。所以，現在，迅速行進的師團，其數量的優勢——主要是它現在與空軍結合起來——在時間及空間上可表現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形式，它可引到空前未有的規模的失敗」（愛曼斯伯爾格：「坦克戰」第三〇〇頁，一九三七年莫斯科軍事出版局版）。

普西斯名將古德里安，屢次被蘇軍打敗的將領，是主張採用成羣裝甲機械及建立龐大的坦克突擊隊的思想者。他曾經寫過：「集中兵力的出敵不意的運用，實勝利的最可靠的保證」（「國外軍事」一九三九年第七期第六頁）。

這是空軍的一個片面的意見，已由德國維特美爾將軍於一九三五年在德所主編的一種軍事雜誌上所發表的他的底一篇論文證實了，他底意見竟落到這種境地：「由於坦克的發展，攻擊的砲兵的最大的工作降落了」。維特美爾這個觀點決非偶然的，僅見的。德國法西斯新軍的統帥部正是把自己的「閃擊」理論，建基在損害其他兵種而過分估計了空軍坦克作用的估計上，尤其對砲兵的損害很大；甚至從歐戰開始兩年後，在侵蘇戰爭的第一個時期，希特勒統帥部也未將砲兵視為攻擊和防禦的手段而輕視了它，尤以在反坦克防禦中為然。

希特勒對閃擊戰爭中決定勝利的「閃擊」的成說，把用數萬輛大的摩托機械化兵車及空軍武裝力量迅速擊潰敵人以消滅敵軍的統帥部，做為軍事學說的奠基石，自信他則保證了持久戰的危險，陣地戰一級地是會被排除了的，因為最堅固的築城設防及障礙物，一定被德國裝甲的機械兵車在龐大轟炸機隊由上空的援助下突破。然而希特勒的是，在宣傳這種觀點並竭力用一切方法開導他向假想敵，特別是在說，不論什麼樣的「馬奇諾防線」都不能把他由德國機械化部隊的進攻之下拯救出來的時候，法西斯自己已經設了這道防線——德國西邊邊界的「齊格非防線」。

應該指出，就是在德國的軍事出版品中，有時對於未來戰爭的性質也提出了非常正確的判斷。格爾登·佛里奇在他一九三九年出版底「今日與明日」的軍事藝術一書中寫道：「摩托機械化部隊又更使會戰迅速了結的意見是錯誤的，因為在這種却忘記流動性也對敵有利……雖然陣地戰是暫時的性質，却也不可以從未來大戰中排除掉」（「國外軍事雜誌」，一九三九年第十二期第四〇頁）。

但希特勒上層領導者沒把這種意見看到眼裡。一九三九年九月以三體舞的工夫戰勝波蘭之後，一九四〇年五月——六月法國全軍覆沒之後，希特勒的政府要人們和希特勒德國的大部分將領們，都把真實的危險丟到了一邊二淨。希特勒德國的軍政大員們相信德軍的武器在反對一切敵人的戰爭中是「無敵的」，非常誇大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付諸了他個人的力量，自大的以為他們在軍事藝術上進行過一次革命，開創了一個取得決定勝利的新的方法。「德國武裝力量最高統帥部」——「德意志國防軍」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發表的「這種三體舞消滅敵軍的遠征」的軍事學說上所說見。而「德意志國防軍」的主編有名的若爾丹則寫了：「波蘭之後，實運新的技術工具種種的作戰新

方法的象徵，他可以使機戰復活再生」(「國外軍事雜誌」一九四〇年第七期第四九頁)。甚至美國，某些軍事作家如萊伊爾旅長，許多「閃擊戰」論文的著者也肯定說德軍底武裝、編制、戰術及戰略均允許他實現這種戰爭的原理。

但就在這個時候，速決戰與持久戰的問題，運動戰與地戰的問題，却每每有站在完全另一個觀點上討論的。美、英、法及其它國家的許多著者則肯定未來的戰爭開頭是地戰的性質，因為早在和平時期，一直頂到國境所構築起來的堅強的防線，已造成一個組織堅固的綿延不斷的陣線的先決條件。

拉薩上校於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美國報紙上所登載的文章中，將具備了速戰速決的防線的戰爭與在戰爭性質上佔優勢的地戰之間的均衡，立了一個標幟。拉薩認為戰爭的持久性是不可避免的，他一般地是傾向於否認實現突破陣地及廣泛機動作的可能性。

「由於現代的武裝——拉薩斷言——陣線是非常強有力的，甚至具備了很大優勢的兵力亦不能將它迅速克服……就是到今天也有許多人幻想在廣闊的戰鬥中，不會取得決定的迅速的戰果的。最近戰爭的實際，使這種可能性成爲一個疑問。必須領悟現代防禦的退阻力量，以及迅速趕到後備兵和供應物品的可能」(「國外軍事雜誌」，一九三九年第二期第四〇頁)。「在敵軍尚有後備軍和物資，在敵軍尚有將其由一地調赴另一地的可能之際，陣線的突破是不可能的」(引揭書第四三頁)。

上述那位作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寫着：
「……不可肯定說運動戰是可能的，即使說國防的界已被突破」(上引書一九三九年第九期第八二頁)。

美國的另外一位作家菲利浦少校在一九三八年於一篇「戰爭的新面目」中寫着：「現在接連不斷的防線已在戰爭開始前組成了……明日的戰爭，必於上次世界大戰所結束的那些不斷內防線開始」(「國外軍事」一九三九年第五期第二六頁)。

在菲利浦的話中，還可引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連接不絕的陣線，並非它穩定的一個同義語。

的確，如斷定連接不斷的陣線就一定把它提到陣地戰中，那是不正確的。在擊退了敵軍的軍隊和龐大的物資的各個大團他們之間發生軍事衝突之際

，接續不斷的陣線是必然要產生的，即或不是在全部綿長的戰線如綿長不絕的築城地帶，然無論如何在這種防線上，是不會留有一個不能射擊的不可觀察的中間地帶的。連接不斷的陣線，在沉寂時期以及在具有優勢機動作戰性質的戰爭是有的，而在積極的運動戰的期間，陣線的形勢，照例必發生特別大的飛速的變化。

將各種概念——關於陣線的連續不斷性及其的穩定性及不可克服性，關於運動性的作戰及其「閃擊」性，關於陣地戰與持久戰等等——的混淆及等同看待，是上述許多外國軍事作家們的特徵。在他們這一切形形色色的意見和種類複雜的觀點之中，我找不出一個人能真正達到戰術經驗的科學的綜合，真正科學的預言到現代的軍事動作究竟是什麼性質才有益。在這一方面，蘇聯的軍事學說和蘇聯的軍事思想，因為掌握了馬列主義不可戰勝的科學武器——唯物辯證法，所以甚至比先進國軍事理論家的觀點時時能，而且現在也能有很大的優點，至於所謂法西國家的「理論家」更不必說了。

許多外國軍事作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預言說戰爭整個地表現爲地戰性質，在廣闊的幅員上陣地必然穩定，陣地形勢的變化一定是演變的極慢的，尤其是因爲有這種先決條件，特許了二十世紀的兵器的空前增多，必然要引到了它流動性的減落。如所週知，曾經有一個時候，在英國，在德國以及在其它國家之中，祇是在理論上展開了宣傳，但在實際上擴張軍力的建設——必需用摩托機械化部隊所組成的精兵作戰觀點；這一派意見的擁護者，通常把這種小兵羣高度的流動性及機動性和基本上由步兵所組成的龐大兵羣的緩慢性及呆板性對立了起來。

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證明了這些意見是成立不住的；反之，恰恰完全證實了恩格斯早在「一八五二年神聖同盟反對法國戰爭的可能性及其先決條件」一文中的天才的預言，他說，軍隊的羣衆性，並不與它戰術的運動性相抵觸，廣大軍隊的動員入伍(到人口的百分之一五——二〇)，「同時又比現代軍隊所具有的那種機動性，具有更大機動性」(「軍事論文選集」第一卷第三十頁，一九三七年莫斯科軍事出版局版)。

蘇聯各族人民抵抗希特勒德國侵略者及其夥伴的偉大愛國戰爭，其最豐富的經驗已予我們一個可能性從各方面明確地解答這個問題了：現代大戰作戰的性質，什麼是佔取優勢的？現行戰爭的陣地戰，抑或運動戰？

蘇聯人民及其武裝力量的勇敢抵抗，在戰爭的最初幾月中徹底埋葬了法西斯「閃擊戰」的神話。儘管希特勒份子計劃迅速消滅紅軍，預製蘇維埃國家了蘇聯也堵擊了世界上最強有力的軍事機構的打擊，在戰爭中阻止了在軍事技術方面在戰爭初期比紅軍最佔優勢的兇猛狡詐的敵人。戰爭採取着拖延的性質，但這決不是說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所表現的戰線凍結長久的時期。現行戰爭雖然表明將拖延的（持久戰）戰爭與陣地戰兩個概念劃一等號是怎樣不正確了。戰爭可能是持久戰，但它主要的總是運動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陣地戰的時期由一九一四年尾拖延到一九一八年年中，甚至一九一八年下半年的戰爭，在主要的（西歐的）戰場上，使威廉德國全軍覆沒的戰爭，本質上還不完全都是運動戰的性質，同時比較地還是緩慢地將德軍的陣地戰的防線由西向東逐漸消滅。

現行戰爭的性質完全兩樣。現在，在偉大的愛國戰爭中，紅軍早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的冬季在莫斯科外圍以及其它主要各路會戰中展開了廣大的運動戰：譬如在羅斯托夫、耶列茨、梯赫文及托洛柏茨方面。在這個時期，紅軍將敵軍向西驅逐四百公里。早在這個時期，已把德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打破，同時證明了現代戰爭中作戰的性質，佔優勢的是運動戰。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冬季戰役，在戰史上從無先例的斯大林格勒大戰中，首先實現了完全的殲滅戰而將德軍法西斯三十三萬大軍消滅，而以同一動作在其他許多最主要的戰場（在北滿加索、頓河、佛羅內茲——庫爾斯克方面；在中路及西北路，在列甯格勒）實現了殲滅戰，以堅強攻擊行動於一九四三年夏季完成了殲滅戰（解放了奧勒爾，比爾哥羅德及哈爾科夫等地）。紅軍作戰勇敢地證實了他大規模的運動戰的日益增長的能力。

在積極運動戰的長久期間以內（譬如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冬，這種時期約長了半年以上），有過比較短期的沉寂時期，因當時兩方都在鞏固各自所佔領的防線，重整自己的兵力，建立新生的後備軍，加緊準備新的積極的戰役。然不是這些沉寂時期規定了現行戰爭的基本性質。也不是那種在廣大的蘇聯戰場上若干地段已進行的和現在進行的陣地戰規定了這種性質。

具有盛大的人源和物資後備，且在戰爭中抱定了堅決的目標的各大國的殘酷的衝突，其所表現的現代的大戰，在現今軍事技術和軍事藝術的發展水準下，主要地是表現為運動戰的性質。然而這決不是意味着陣地戰門形式的

完全取消，恰恰相反，在某個地段和在一定的時期還是要有它。

必需先分清「陣地戰」和「陣地門爭」這兩個術語的不同。「陣地戰」的術語，祇可拿來特徵一次，在整個戰爭期間或幾乎全部戰爭期間，陣地門爭的形式整個地佔了優勢的戰爭。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典型的陣地戰就是這種意思。至於「陣地門爭」的成分，在任何戰爭中的個別階段和個別地段都是有的，紅軍抵抗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那種戰爭中也是有的。在奧得薩，塞巴斯托波爾以及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尤其是在二年前多的英勇的列寧格勒保衛戰和塞夫斯爭戰，節米揚斯克爭戰，諾爾西斯克區，塔曼半島以及其它若干地段的爭奪戰，在現行戰爭的各個時期，門爭都帶着純粹陣地戰的性質。這種門爭，伴隨着改進陣線形勢的地方意義的戰門，掌握個別據點據持點，俯瞰高地以及鎮鎗的戰門，內線縱深梯形防禦地帶及整個築城區域的戰門。但這一切並沒有造成一次世界大戰研究家們所說的「無出路，陣地死路」或「無望的停滯」。不論防禦手段如何增長，尤其是廣泛採用了機械化武器的和特別的機械以及迅速構築法（水門汀的迅速堅結法等）的一切形式的火器和築城技術的防禦手段，可是現代的攻擊武器——砲兵（連壘堡砲在內）的、步兵的、裝甲坦克隊的、空軍的以及工兵的——都不亞於防禦武器。不獨如此，如果這些武器是在那些勇敢胆大，不怕犧牲和藝術的官兵手中如像紅軍戰士，那麼現代的攻擊武器，可能是比防禦武器真正更堅強的。

規定現行戰爭的運動性的基本的東西，就是對於賦有很大的攻擊力量，突擊力量，那些高度靈活的鬥爭武器，如坦克，空軍以及自動推進砲的廣泛而普遍的運用。由於這些鬥爭武器的猛烈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大戰以後所派到過的那種大規模編制的坦克，摩托機械化部隊，以及空軍兩兵聯隊，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對於運動戰的發展，戰場的廣闊與擴大有大的意義。然而最重要的還是反希特勒同盟國家所抱定的殲滅敵人的決心以及百折不撓的激昂着的爭取勝利的意志。當然，為達成運動戰，還必須有一種能力完成迂迴包圍的運動，深深地突入敵人的陣地，包圍與消滅敵軍。

凡不欲落伍的進步的軍隊，必須培養成他的機動的戰術的精神，廣泛的勇敢的運動戰的精神。攻擊中最偉大的堅毅精神和機動能力，必須與防禦中最偉大的沉着堅定精神結合起來，並同時與防禦中的積極性結合了起

（下接八九頁）

人民文化的時代

——陝甘寧邊區文教運動的成果

周而復

- 一、一個創舉
- 二、和迷信不衛生作鬥爭
- 三、新的教學方法
- 四、羣衆的文藝
- 五、大家看報大家辦報
- 六、一幅輪廓畫

一 一個創舉

陝甘寧邊區文化教育工作大會從十月十一日開始，直到十一月十八日才勝利結束。大會共進行三十七天，參與大會的代表一共有四百五十多人，這其中，不僅有從人民當中生長起來的工農兵文教代表，也有著名的作家，詩人，醫生，學者；不僅有蒙回等少數民族的代表，也有基督、天主等宗教團體的代表。大家檢討邊區的文教工作，吸收其經驗教訓，研究各個工作部門中的特殊典型，決定今後開展文教工作的方向。動員「全邊區一百五十萬人民自己起來和自己封建迷信文盲不衛生等惡習的鬥爭」。還在邊區文化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一種前所未有的創舉。

從這一次大會上可以看出文化教育在少數人專有的時代，早已成爲過去，重新把文化教育歸還給人民大眾，在邊區已經實現了。

陝甘寧邊區原來是一個很落後的地區，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封建，迷信，貧窮，文盲，不衛生……這些東西給予人民毒害之深，從幾個簡單的數目之中，可以看出來：在邊區一百五十萬人口當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盲；革命前，這一百五十萬人民大部分是在飢寒線上生活，食不飽腹，衣不蔽體，有了疾病，就求救於巫神。巫神是邊區最大的毒害，舊社會統治者製造了六十一種鬼神，遺留下二〇二九個巫神，僅延安縣一年的統計，全縣一年消耗於巫神的招待費，是三千三百六十一萬元，而五十九個巫神當中就一共治死了二百七十八人。若以每個巫神每年治死五個人計算，則二〇二九個巫神，每年要治死一萬人左右，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此外死於不衛生和疾病，更是可驚！成人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三十，而兒童的死亡率竟達百分之六十！牲畜的死亡也是驚人的。造成人和牲畜的嚴重死亡率的原因，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人民不衛生的習慣，迷信的毒害，和醫藥的不發達。

等到邊區土地革命以後，在革命政權下的人民才可能把文化教育的權利

運動自己手中。過去那種文化生活上的悲慘狀況，也開始有了初步的改變。但在土地革命時期，由於處在緊張的戰爭的環境裏，文化教育工作還不可能有充分的發展。抗戰以後，邊區轉入相對和平的環境，邊區文化運動，才比較大規模地展開。但由於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作祟，走向和實際脫節，和羣衆相違背的道路，使得這一運動不能及時蓬蓬勃勃地展開，相反地，却失去了活潑的生氣。但經過了兩年來的整風運動，文教工作者在思想上得到了改造，掌握了毛澤東同志的從實際出發的羣衆觀點。另一方面，邊區人民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的經濟生活，日益繁榮發展，生產運動在一九四三年收到更大的成效，使邊區文教運動「取得了各種規模的工廠和作坊，各種式樣的合作社和變工隊，豐衣足食的人民戰士和機關學校人員作為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則已經取得了總結新文化運動歷史經驗的「新民主主義論」和「文藝座談會講話」作為精神基礎（「解放日報社論」）。所以說，邊區的文教運動真正成爲大規模的羣衆運動，是自四三年開始到文教大會開幕，這一運動已在邊區各個角落普遍地展開了。

十月三十日，毛澤東同志親自出席大會，宣佈了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中的統一戰線的方針，指出「新形式與舊形式的統一戰線是完全必要的。統一戰線的兩原則在此完全適用：第一是團結，第二是批評，或教育改造；投降舊形式是錯誤的，排斥舊形式也是錯誤的」。另一方面又指出，「一切工作對於羣衆要緊，和羣衆自願的原則出發。這方針解決了文化運動中久久未解決的新舊形式問題，成爲大會中和今後羣衆文化運動的旗幟。」

大會是按照下列程序進行的：衛生，教育，藝術和報紙，而開會的方式是：大會報告，小組討論，典型報告，總結報告。在大會上湧現出大批模範的文教工作者，模範家庭，模範村子，光輝的範例，……開闢了邊區文教工作的新天地。（被略）

二 和迷信不衛生作鬥爭

首先談「不衛生」工作。

在邊區運動以前，邊區羣衆衛生情形是怎樣呢？邊區經濟落後，衛生設備，在亂世里，是沒法談到衛生的；革命以後，生活雖然改善，但衛生力量中，在政治經濟建設上，對衛生工作未能用力推進。而舊

社會遺留給邊區羣衆的迷信，愚昧，和不衛生習慣，牢固地存在着，所以造成了嚴重的死亡率。死亡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是不衛生。飲食不衛生，帶來了傷寒、痢疾、吐瀉水；由於身體衣服被子不衛生而生虱子，造成出水痘、和回歸熱；由於舊法接生，使大部份嬰兒得「四六風」死去。邊區還有不少地方是人和畜牲同居，造成環境衛生與公共衛生的嚴重障礙，大大地影響了人的健康。

其次是迷信。邊區二千多個巫神散佈在農村，他們欺騙人民，儲財奪命；而人民也迷信他們那一套胡言亂語，老百姓生病，總以爲是鬼神作祟，常說：「沒有神，人怎麼會生病呢？」有一個男子瞎了，他母親硬說是有鬼，相傳鬼是怕鹽東西的，她就以月經布塞到兒子嘴里，這樣怎麼會好呢？另一種辦法，生了任何病，就請巫神，巫神來了，手持三山刀，吊磚安瓦，牽繩繩，說是有鬼，要病家化多少錢送，如病者不信，他就說有鬼附在病者身上，用鞭子抽之，直抽到病者忍受不下，只好也承認有鬼了。他更可以騙人，偷病者被打死，他也可以不負責任，說是命中註定，他也無法挽回。

從上面事實看來，可以知道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迷信毒害之深，成爲開展邊區衛生運動中的一大障礙。

人民不衛生和迷信的程度是如此，邊區醫療條件是怎樣呢？全邊區只有一〇七四個好的壞的中醫，五十四個獸醫，機關部隊的西醫只有二百多人。以邊區人口來算，一千一百多人當中只有一個醫生，而且絕大多數是中醫；若以西醫來說，七千多人當中，才有一個。中西醫的總數遠遠不上巫神。藥品是少到可憐的程度（被略）試想想，在這樣惡劣的衛生條件之下，來開展羣衆衛生運動，那困難，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但邊區政府和人民是不怕任何困難的。羣衆衛生運動，首先是從鄉村開展起來，這個運動在鄉村開展，主要的是依靠勞動英雄，變工隊長，小學教員和村長等推動起來，成立衛生委員會，或者是衛生檢查委員會。一般的，開始先進行宣傳，比如在發動全村大掃除以前，先舉行「爲什麼要掃除」的座談會，引起羣衆對衛生工作的重視。然後發動羣衆打井修廁所，人畜分居，改造圈棚，滅蠅，除蟲，婦孺衛生……學校放假，讓學生回家幫助打掃各家衛生，教員，勞動英雄，帶着學生幫助人手少的和最窮的人家，羣衆都很感動說：「教員幫我們打掃了」。這樣，在村里造成了衛生運動的熱潮。

這里面，有時就生了禍，例如人畜分居，原來也知道好，但總辦不
够怎麼辦了村里就設法調整整洞，動員整洞多的讓出來，搬移圈欄，人手少
的也感困難，全村就實行變工互助，這樣，便解決了。

爲了堅持下去，村里訂了一個衛生公約，事先在學校里（村里的人全都
要上夜校，半日班，識字組的）。徵求大家意見，在羣衆團體里討論，然後
公佈。這樣發揚了民主作風，大家都能遵守，實行。白樹村的衛生公約是
這樣的：

- 一、碗筷鍋盆案，飯後要洗淨。
- 二、若要不得病，不吃生和冷。
- 三、人人手和臉，每天洗兩遍。
- 四、要將衣和褲，每兩洗三回。
- 五、喜肉和糞外，天天都要掃。
- 六、廁所經常刷，牛圈兩次墊。

邊區人民不衛生的習慣是很深的，不是一次運動就完全可以改變過來的
，也有些頑固保持着舊習慣的，這就，必須要教育解釋和批評。白樹村小
學教員知道村里舊習慣的深處是很難的，她家拿很醜的抹布去擦砂眼，飯後
碗等也不洗，她馬上進行解釋。現在她家每人有了一條手巾，碗等吃了飯
就洗。有的勸說也不行，就給他家村裡的黑板报，批評他。大都怕黑板报的
批評，全收拾得乾乾淨淨的。連白樹村最醜的超開科家，也乾淨了。

僅僅有了衛生運動，並不能說就可以完全不再會生病了。為了病須要醫
生看，需要藥治療。普及醫藥培養醫生是這運動中的重要的一環。中西醫醫
和藥師的親密合作便提到重要的地位了。中藥科學化，西藥中國化——中
西醫合作，這關係了很久的口號，在任何地方被認爲是不容易實現的口號，
在邊區已經開始初步實現了。

邊區的巫神數字遠超過醫生，羣衆有病，怕無醫生，一定會去找巫神。
中西醫團結起來，給老百姓治病，反對共同的敵人——巫神，在邊區，是完
全必要的。反對者以爲中醫不科學，治死人。是的，科學，但中醫在中國
這土壤上有他的悠久的歷史傳統，有許多很好的處方（例如特立同志的夫
人四十年前患氣結核一年多，大如雞蛋，久治不愈，後來服中藥「七葉一花
花」就好了。針灸方法也有不少地方可供學習和參考），並且也確實救活了
很多的人。問題是要中醫科學化，學習西醫的診斷，生理病理的知識，消除

辦法……西醫也可以研究中醫的長處。

去年五月，邊區一些地方相繼召開了中西醫的會議，如延安縣的會議上
，中醫自我批評了自已過去不向西醫學習，西醫也檢討了過去不重視中醫的
某些長處，大會上中醫公佈了秘方百餘種，成立研究會。文教大會上特別
召集中西醫百餘人，開了兩整天的座談會。有些地方則更進一步推動了這
工作，不僅成立了研究會，並且實行中西醫聯合診所，醫院裡添設中醫，並
增加西醫門診，研究會和醫務機關互贈中西醫藥學術新報告，組織中醫到
醫院去參觀學習，像慶縣的中醫張先生就到國醫和平醫院去學習接生，他們
治不好的病如關節炎就請教西醫，中醫處方治好了病人，也介紹西醫，例如
「竹慶」治小孩百日咳，介紹到醫院，西醫試用，也有成效。這樣過去當社
會裡留下來中西醫的門戶之見，在新社會裡可以保障大家生活和工作之下
，不合作的成見就消除了，中西醫團結了，共同研究怎麼爲人民服務的辦法。
所以，中醫整理其經驗，以現代的科學爲基礎，使之科學化，而西醫，
則豐富其經驗，吸收中國醫藥的成果。這條路子，不僅在邊區，在現在是通
常的，即使在全國，在將來，也是普遍適用的。

至於解決醫生問題，大會準備開辦中醫訓練班，提倡醫生帶徒弟，擴大
延安醫科大學的學生名額，準備以每兩畢業生的十分之二，給邊區做醫藥
生工作。其次就是開辦助產訓練班，訓練新的助產士，和改造民間的舊有的
接生婆。

藥材問題，擴充和改良中藥舖，以爲人民服務爲主，大量的挖藥和採藥
，羣衆挖了藥做爲救金入藥舖，來發展它。西藥和器材，是自己在困難環境
中用一切的東西來代替來製造，自己解決了一些藥品和器材，如葡萄糖，葡
準血清，水銀金合粉等藥材百餘種，另外的像圍邊視野鏡，血球升降器，幼
片糖，牛角糖診器……都是自己造的。

羣衆開始講衛生了，醫藥條件也逐步改善了，但迷信鬼鬼的心理，繼續
固地存在人民中間。反巫神和改造巫神的工作便成爲衛生運動中重要的一環
了。

巫神有舊社會留下來廣泛的羣衆基礎，人民中間有着長期的迷信傳統
，反巫神，簡直說得上是一種艱巨的戰爭，而改造巫神，要比改造二流學
困難得多。但這種戰爭必須進行，巫神必須改造。反巫神主要是通過下面三
種方式：

第一是通過廣大羣衆反巫神——到處在羣衆面前揭發巫神是弄人民的欺騙伎倆，對巫神進行說教教育，使他知道沒有鬼神，他的那一套都是騙人的。巫神最初大半都說有神，各級政府負責同志用事實證明，再三地耐心說服，巫神這才轉變。巫神轉變之後，像延安就召集羣衆大會，讓九十九個轉變的巫神，揭發自己的罪惡，使羣衆了解。

其次就是依靠衛生醫藥工作，來進行反巫神鬥爭，——事實勝於雄辯，一切騙人的把戲，就怕事實，而事實對這些人是無情的。石錫三是四代祖傳的巫神，自己得了腹瀉病，當然照例請別的巫神來吊磚安瓦送鬼送神，但是沒有效果。不得已，乃請當地名中醫崔岳瑞醫治，服藥後即痊癒了。當地羣衆就傳開：巫神到處給人治病，自己有病卻沒法治，治也治不好。以後有人再去找巫神治病；他說神上天開荒去了。巫神威信便一落千丈，從此當地羣衆就不再信神。

在定邊還有這樣的事：羊圈裏的羊，常常被咬死，這請巫神來，他一送鬼送神，果然就不再被咬死了。迷信者又抬起頭來：你能說這是沒有神嗎？許多人無以為答。然而崔岳瑞不信，他每天到羊圈四週去研究，知道圈內四週有洞，有黑老鼠是牠咬死羊的。巫神不過是以水銀砒霜拌飯喂之，毒死了，自然也不會再有羊被咬死。在羣衆中揭發了這事實，到處傳開去，連附近的羣衆也不信神了。將神燒了，開展反迷信運動，成立衛生檢查委員會。這就是邊區有名反迷信的模範下掌村的故事。

常言道「鐵要釘打，賊要賊捉」反迷信以巫神來反巫神最為有力，在羣衆大會上，在展覽會上轉變了的巫神，把他交給政府的三山刀等法寶，擺在法台上，巫神站在那兒對羣衆宣佈自己的罪惡，勸羣衆以後有病就請醫生。巫神轉變之後，對不肯轉變的巫神，和隱藏的巫神，他一面向政府報告，一面又向他們做說服工作，他是知道其中底細的。這樣到地不斷地在巫神轉變。他們自己又訂上反巫神公約，大家遵守。轉變了的巫神政府照顧他的生活，使之生產，以免從巫神又轉變為二流子。許多巫神參加了生產，有的還成爲村鄉的勞動英雄。

邊區由於經濟繁榮，生產發達，運輸增加（在邊區的運輸工具，主要的有馬、騾、大車），騾馬也逐漸增加，改善牲畜管理，加強飼養，減少死亡，也是衛生運動不可少的一部份。首先是人畜分居——邊區的傳統習慣，和畜洞少，大半是人畜同居，不是居在一個棚里，就是人的窩和牲畜的窩相距

很近。人畜分居，掃除環境衛生的障礙。

運動的醫藥衛生運動展開之後，有些什麼收穫呢？在這次文獻大會上顯然地可以看出：到處大批湧現了衛生積極份子，爲人民服務的模範，有的半夜起來爲羣衆看病，有的爲羣衆看病竟忘記了吃飯，有的大夫親身跑二三十里外去給病人治病。農村裏在這個運動當中，出現了很多的衛生模範家庭。個人的模範和家庭的模範，是運動中的骨幹，創造了村的模範。

衛生模範村，以新的整潔的姿態出現在人們的眼前，這樣的村鄉，已經不少了。像在大會上被獎的新寧縣的寶家灣村一變過去的不衛生和迷信的習慣。在環境衛生方面，過去村中只有五個毛房今年增到十四個，牛羊圈每天掃兩三次土，灶房清潔，碗裏有一定位置，密洞內外每天掃地。飲食方面，不吃生冷，現吃現做，剩飯剩菜，必有布蓋上。個人衛生是每月洗一次被，三天晒一次，衣服常洗，男女常洗澡，男子夏天每天二十天理一次髮，冬天是每月一次。婦孺衛生方面，月經來時，改用溫水洗，以布和棉花墊之，不吃生冷，生產時改爲消毒生產，並刀棉花都消毒過。這樣，由於講衛生的結果，今年這村就沒大疾病發生，有病也不請巫神。同時這一時期全村生了十二個娃娃就活了十一個。過去的，如果旗一接生婆，六十二歲，收生三十餘年，接了六十個，却只活了九個。這是一個長足的進步。

嬰孩死亡率降低，另一個原因是接生消毒衛生工作的改進，和助產訓練班的開辦。現在已開了十八個訓練班，其中十一個是公辦，七個是民辦公助（即羣衆自己籌劃創辦，公家給予必要的幫助）。訓練班的開辦和學員的招收的過程是很不容易的。開始是廣泛向羣衆宣傳，羣衆了解以後，選其中積極份子，參加訓練，另一面又吸收民間的老接生婆，吸收其經驗，加以改進，教授她們接生方法生理衛生知識。訓練的地點，根據具體情形，或集中訓練，或分散在鄉區。

在開辦醫藥社方面是這樣的：全邊區根據已有的合作社組織，成立衛生合作社，設立診所，供給醫藥，創辦和發展中藥鋪發動人民以藥材入股，現在邊區已有三百九十四個中藥鋪了。因農村分散環境，有病不可跑出一二百里去住醫院治病，有時也不經濟，有些藥鋪和衛生合作社就在附近找兩三個醫術，設立小規模病房，使病者就近治病，家中可以送飯來吃，也節省了用費。

機關部隊等公家醫院和醫生，爲羣衆治病，在衛生運動當中，也起了不

少推助作用。總衛生處每天以整頓上午時間做爲業來門診，各衛生機關，半年內發給業來治療二萬多人，住院的人也很多，醫藥是完全免費的，只是自帶伙食而已。去年國際和平醫院第一院的業來住院的，佔全院的百分之十五點八。另外還派臨時性的防疫治療隊下鄉，去年派了十一隊下去，僅在幾個縣，就治療了四千六百一十四人。因爲這種主動地給業來免費治療，通過治療，被治好的病人，又推進了這一工作，如延安市一老漢，患了二三十年牙病，到五十歲喉中無一好牙，面腫，經總衛生處治療，全部換上好牙，面部消腫，回復正常。他這才知道吃了不衛生的虧，回家後，即連忙買了牙刷，漱口，並且他家從此每人都有了牙刷，而且見了鄰城，就勸人講衛生。

在提高防疫治療上，也有了很大收穫，在邊區建設廳指導下，邊區光華農場，已試製牛痘血清，先後到各處進行防疫。治癒了病牛一〇三頭，預防注射了三〇一九頭，收到很大的功效，延安縣前年全縣死牛四二四頭，去年防治後，只死了九頭。

衛生運動中的這些成績，僅僅是一個初步的收穫。許多工作，如培養更多的醫生護士助產士，創製更多的藥品，爭取改造更多的以至於全部的巫神，都是有待于今後的努力。

三 新的教學方法

邊區的教育，講起來大概可以分爲三個時期，就是：抗戰前，這一時期教育的方針是正確的，配合了當時的需要而辦的；第二個時期是一九三九到四三年，教育工作走了偏向，表現在形式上，所謂要正規化，主張重質不重量，把一些學校合併，未注意到邊區是農村分散的環境，村與村之間相隔很遠，而每一村的人口也很少，從十幾戶到幾十戶不等，要求學生離開家庭，在校肄業，非特不能使業來普遍入學，反而加重了業來的負擔，自然會引起業來不滿，認爲上學是一件苦事，甚至學生要政府去動員。在內容上是與業來的需要脫節，學的東西不是業來生活當中所需要的，比如學的是什麼太陽系，神經系統，呼吸系統，而不是日常所必需的常識婦女衛生等，這樣教出來的學生，不但對家庭無法去幫助，就是自己也沒有實際能力。而在文書工作者身上，擔着智識份子的包袱，說說業來，沒有真正爲業來服務的決心，智識份子的架子。結果呢？業來是不被業來所歡迎。文教工作者自己

即覺得工作做不通，原爲苦悶，而業來對非自己所需要的教育，要去受教，也得覺是苦事。

這苦悶，不久，就被邊區運動所掃除了。

一九四三年後，邊區文教運動開始走上正確的道路，這是第三時期。這方向就是：爲業來服務，從業來利益出發，通過業來路線。在一九四四年，有了更大的發展。

從業來的需要和自願出發，這是邊區文教工作的基本原則。這原則應用在學校教育上，就是民辦公助的方針，由業來根據他們自己的需要，由他們自己來辦學校，使他們把教育和生產運動一攬，看成是給自己謀利益的事。公家則加以幫助，像這樣民辦公助的學校在邊區已經有三百多個了。

民辦學校的創辦，有許多是由勞動英雄發起的。在邊區，勞動英雄實際上是個個村，一個區縣的人民領袖，他的發起，一面反映了業來的需要，一面也容易推進一定地區的工作。莊莊小學就是勞動英雄田二鴻創辦的，勞動英雄張振村也是城壕村小學的創辦人。其次，有許多是從變工隊的組織，發起而辦的，合作社發起創辦的，由識字組轉變而成的。

民辦學校經費的來源是從下面幾方面解決的：捐款，節約，開學田（大藥業體開田，以此收獲爲學校開支之用），組織文教合作社，——有子弟者，以一定股金入股，由合作社去經營所得利潤，做爲股東自己子女的學費，這樣可以一直供給子女上學畢業爲止；變工隊的砍木柴來賣，做爲資金。；

至于民辦小學的類型，根據各地具體情形，綜合起來，有這幾類：

- 一、米脂高家溝式——這類村學的特點是：第一是業來自己辦，自己管，自己教。高家溝老百姓，會幾次吃了不識字的虧，深感文盲之苦。早就想辦學校，由變工隊創議，由業來選出村幹部和積極份子五人成立理事會，管理學校，推舉村識字多的高懷山爲教員，他的地由全村變工代耕。其次特點是學科教育內容教學方法等等，完全按照業來需要而定，教學時間分全日半日兩班，按一定年限，學到能寫會算就畢業。教學內容包括生產衛生政治常識等，大部分由教員編寫，採取歌謠故事等易于接受的形式。第三、學校成爲一村的文化政治活動的中心，通過它成立變工隊員讀報識字組，婦女識字組，與鄉村政府配合各項中心工作。學校又成爲全村俱樂部，供給村人來玩。
- 二、延安市楊家溝式——由民衆中積極份子創辦和發動，經過政府積極

訓練，得到公家機關幫助成立的。教員是智識份子幹部（陶端予），在寒寒中埋頭苦幹，與羣衆結合。按學生家庭需要，自己編寫實用的兒童愛好的教材。教學先從實際事物入手，然後再教認，寫，用；如先拿尺子量布，然後寫出。此布尺等字來教。另處還採用小先生制，集體教學和個別照顧相結合外，打破了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界限，開展成人識字教育，通過小學生及其家長，推動全村衛生運動，使楊家灣村成爲邊區最好的衛生模範村之一。

三、米脂楊家灣式——楊家灣村的貧農，他們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經濟上經過減租減息運動，窮人翻了身，自然就要求文化，這一式的學校，是在識字班的基礎上創辦的，完全是貧農僱農自己的學校。其特點是教育對象包括兒童婦女成年人，而且完全不脫離生產的，教學分單班，午班，和夜班進行，一談教學活動都和生產密切聯繫。

四、新形式的週週學校——以鄰近的村莊（這些村莊大半是相距四五里左右的），由一個教員輪流到各村教課，學生不離本村，各村以有威望的人爲當村的學董，負責管理學校；在學生中各村也選有學習組長，幫助學董督促領導學生上課和複習；教員一天跑兩村，每村每兩天能輪到一次。教員輪到這村，即由該村學生家庭管飯。其特點是：所有學生都不脫離生產，教學上無固定形式，教員在路上遇到學生隨時可以進行教育，這學校完全適應於分散的農村經濟環境。這類型的學校有許多好處：學生一面唸書一面仍可以幫助家庭，父母放心讓子弟上學，因爲不離本村，不出門，不用拿出糧食，也不必做新衣服，同時也可以減少教員的數量。

五、舊式輪學——是由幾個村共請一個教員輪流在每家上課十天半月，然後再全體搬到另一家上學，輪到誰家，教員學生一起在他家吃飯，上課。六、家庭學校——這是以家庭爲主的家庭學校，以自家幾個娃娃吸收本村其他兒童成立家庭學校，教學按季節不同而有所變動，前面的舊式輪學學生脫離生產，後面家庭學校則可以與家庭生產密切聯繫。

這些類型學校，特別前面的兩種，已日漸普遍而被採用。不管是哪一種類型，基本的方針還是民辦公助。在實行當中，要防止兩種偏向：其一是只重民辦，忽視了公助，其二是官逼民辦，這都不是民辦公助的真義所在，反而會阻礙了教育工作的開展。所謂民辦公助，首先是民辦，在民辦的原則下來辦，而公家要去助，多方面去幫助。

在根據羣衆需要和自願的原則下，邊區學校，不論是公辦，民辦，都有

了許多新的創造和辦法，最重要的是：

在學制上——打破了舊的一套，不定年限，學到能寫會算就可以畢業。不死板的分班次，而是根據各種對象來劃分小組，不機械地主觀地規定上課時間，根據當地羣衆情況，他們生產情形，定早班，午班，晚班。放假的時間，也不是墨守過去都市成規，按照舊曆春假暑假來放，而是根據羣衆需要，在農忙時放假。

在教學內容上——掃除了教條主義的毒害，教的是羣衆需要的東西，如應用文，寫信，寫路條，記賬……教各種生產知識，了解周圍事物和這些字如何寫法，特別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勞動觀點，教員和學生一同進行生產，而且要學生回家時也幫助家庭生產。一反過去子女上了學，回家就輕視勞動，不幫助家庭，成爲新生的「二流子」（就是好吃懶做的社會寄生蟲）。本來在家不肯聽話的學生，現在變好了，家長也喜歡了，願意送子弟上學，這就是教學與家庭生產相結合，學生幫助家庭，同時也改造了家庭。解決了學與用的脫節。

在教學方法上——先生教學生，課程是根據各個不同的對象出發，詳細研究每個人，盡量有的教員對每個學生都有詳細的記載，他的智力，他的程度，如是先生教授時可以得到許多幫助，不至於主觀地注入。教員不僅注意集體，也同時照顧到個人，有的甚至進行個別教員。教學上，也創了新的辦法，用形象的形容，教，使學生易於記憶，如教「告」字，則對學生講「一口咬了牛尾巴」是「告」，這樣學生第一次認了，便不易忘記。對學生品性的教育，完全廢棄了打罵制度，採取說服的方法。例如一年長女生打人，先生即問其姊打她，不答，告以她年長就等於姊姊，爲什麼要打人呢？女生理解其道理，以後就不再打人了。另外還採用學生教學生的辦法，程度高的教程度低的。在學校生活中，提倡學生自治，從小便養成他們的民主作風，許多問題，他們自己解決了。如某校中一女生偷筆，大鬧鬧會檢討，教員只是從旁幫助，說明偷別人的東西是不對的，女生在大家教育之下，承認了，她馬上就得到會場一致的歡迎，說以後不再偷了。

這新的新式教學方法，不僅在校內它得到很大的效果，而且另外一個特點：是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結合。一個學校不僅僅是教書，同時它又是這一村的文藝運動的宣傳者，推動者，組織者，這在邊區農村中表現得特別明顯：學生放學回家，就幫助家中打掃衛生，組織學習組，組織

五十多條婦女兒童識字班學生，他們回去以後，組織了一千多入識字班，米糧中學和島嶼小學學生回到家鄉，就組織了三十幾個兒童成立一個識字班。同時，這些識字班學生組織一個合作社，買賣子推麵，以所得辦學校。

總區目前的社會教育主要的是識字班和冬學。在平常是識字班到了農閒的時候，就成立冬學。現在全邊區約有三千多個識字班，有些村子，差不多各村的人，不論男女多少，都參加了識字班，像關中嶺底村，幾十戶人，全體都在識字班內。有一個老太婆，並且做了識字計劃：最初沒有信心，準備十二天認一個字，結果二十六天中認了六個字，差不多四次就認了一個字，超過了計劃，自己很高興，影響了別人，大家情緒很高。識了字，他們又學會了唱歌，每逢有人參觀，和他們飯後閒談時，村子裏經常聽到他們的歌聲。

識字班和冬學成為邊區消滅文盲的有力的機構，它適合於農村的分散環境，又適合農民的時間和生活工作，本身有這樣兩個特點：

一、學習與生產結合——男的縫工組，女的紡織組，它本身就是識字班，利用生產的空閒識字，學習服從生產，而不妨礙生產，冬學亦復如是。編去辦冬學，也有教條主義的傾向；有些地方不照顧到農民冬天的生產，一定要他們上學，而且是集中在一起辦冬學，不僅妨礙了生產，並且浪費了時間。現在是克服了過去那一套，辦了新的冬學：識字班和冬學主要的還是以業務性質不同而劃分的，像把運輸的編在二班，出發時領導，在路上共同學習。放羊的，編小生學的，編在一起，這樣就不妨礙他們的業務。教學內容也是根據他們的業務需要而不同，選擇他們日常生活中所常見習的學業教，這樣學習和生產就沒有矛盾，且進一步，可以幫助業務，如做小生學的，他識了字，照賬方面就有幫助。

二、實行民教民的新法——就是會的教不會的，父教子，子教父，夫妻教，隣中有九歲兒子提了父親的手，教父親寫字的。在年輕的夫婦之間，更是學習情緒不斷高漲，互相競爭，互相比賽，這樣一來情緒更高，進步更快。

總區一百五十萬人口當中，文盲佔了百分之九十。毛澤東同志提出，要從五十年至十年以內，消滅男子四十以下，女子三十五以下的文盲，這雖是一個龐大的工作，但根據這一年來文盲運動開展的情形來看，是完全可以辦到的。但是，單單就現有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需要聯合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共同奮鬥，才能達到目的。要這私塾和團結與改造民間教育家，便成為教育

運動中重要的一環了。

在邊區，由於羣衆需要，存在不少私塾和民間教育家，在國外的私塾就有二百多個。這些私塾，有的教好的，有的還很落後，好的私塾，他們自動地採用了新的課本；有的却還是用三字經千字文。有的教師，如高懷山就能接受新的教學形式和內容，但也有的很落後，保持舊的一套。對於這些私塾和民間教師，我們一方面是團結他們，因為他們在消滅文盲上還可起不少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提高他們，只要他們有微小的成功和進步，就加以表揚。在邊區這樣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里，事實的教育，改變了每一個人的面貌。邊區像一個大的熔爐，即連二流子巫神之流，在這個熔爐里都得到轉變，改造。難道民間教師比巫神更不容易改造嗎？所以改造他們是完全可能的。然而改造不是遷就，誠如羅邁同志所說的一樣：「目前尤許三字經存在，正是為了將來消滅三字經」。

凡是能夠消滅文盲增加識字的機會，也不應放棄。有些地方在教堂里做彌撒，就進行識字，讀報。因為在分散的農村環境里，很不容易集中許多人，而在做彌撒時，利用其集中時，進行教育是很方便的。

開展普遍的教育運動，許許多多知識份子參加了這一運動，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時他們也在運動中得到了改造。在這次文教大會上，各地就湧現了許多知識份子的模範工作者。他們因為溝通了思想，真正有了為羣衆服務的決心，覺得為羣衆服務是一個人的光榮事業。自己有了這樣的決心，和羣衆格格不入的羣衆，打破了，自然得到羣衆的歡迎和愛戴。像上面曾經提到過的陶端予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過去她是一個十足的小姐，什麼工作也做不好，自從她了解了要為羣衆服務要和羣衆結合，擺脫了小姐的架子和生活習慣，從生活上和羣衆打成一片，給羣衆掃地，給羣衆看病（她爲了接近羣衆，給病人看病，她特別去學了一些初步衛生治療知識），這樣推動了衛生運動，使那個村成爲衛生模範村。許多教員，不特是先生，同時又是學生的母親、父親，他們像父母一樣的愛護學生，照顧孩子，注意孩子的生活。羣衆看見了非常感動，甚至安寧女小的一位家長感動得哭了，她看見自己小女兒在學校里得到這樣的愛護，過着活潑愉快的生活，而她的大女兒呢，則是在過去的舊社會里，因為沒有能够享受這種生活而悲慘地死了的。

在邊區的一個小學教員，他的職責，已經不只是教書而已，他要幫助羣衆工作，是當地許多羣衆工作的領導人，同時，又可以幫助政府推動各項工

作。

在教育運動里面，以至於整個文藝運動里面，即使有了方針，有了計劃，主要的還得靠幹部去實行，所以幹部教育問題，誠如高崗同志在大會上所說：是頭等重要。

邊區的幹部教育機構，有延安大學，醫科大學，抗日軍政大學，中學；……每年培養出來的幹部還不够社會上的需要，不解決幹部教育問題，文教運動是不易向前開展的。解決幹部問題，第一是提高現在的幹部，使工農幹部知識分子化，其次是培養訓練羣衆中的幹部，——這是展開文教運動之門的一把鑰匙。

四 羣衆的文藝

邊區文藝運動的發展上，曾經有一個短時期走上偏向，這主要的表現在關門提高上面。這並不是說文藝不要提高，在反地，是要提高的。問題是怎樣提高，在什麼基礎上提高，不應該忽視了文藝運動是在什麼具體環境里開展什麼對象。關門提高的偏向，正是忽視了這些。在那個時期也還有機關團體的藝術活動，他們主要的工作是對着工農兵，如邊區文協的民衆劇團。不過在文藝運動上，這不是主流，只是一個支流。

文藝爲工農兵服務成爲這一運動的主流，是在毛澤東同志所召集的文藝座談會以後，他在座談會上的講話，解決了文藝問題上許多久難於解決的問題，那就是：文藝主要的是爲工農兵服務。目前主要的工作是普及，但並非否定了提高，提高不是平空就可以做到的，要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文藝工作者從思想上解決了這個問題，進一步向工農兵結合了。放棄了過去所努力的不爲羣衆所需要的關門提高工作，而從事於羣衆所需要的文藝工作。

在另一方面，羣衆生長在新的社會里面，過着民主自由的政治生活，豐衣足食的經濟生活，一洗過去被壓迫的災難，因此羣衆本身自發地要求文化生活，文藝生活，僅僅政治經濟自由生活已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求了。

羣衆要求的是能反映他們生活情感的新文藝，目前還是在「萌芽」狀態的新文藝作品，還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同時，封建性的舊文藝，在羣衆當中仍然有廣泛的基礎，佔着優勢，這些封建性的舊文藝，有的是可以吸收的，有的是有毒藥的，都需要加以改造，使它適合於社會的需要，爲人民服務。

所以，開展新文藝，改造舊文藝，是目前文藝運動中的兩個重要的課題。開展新文藝，在目前的階級上，是以普及爲主，廣泛地把文藝普及到羣衆中去，適合羣衆的需要。羣衆有了文藝生活，增加了文藝活動，他們在實踐中，就自然會提高了欣賞水準和創作能力，對文藝的要求，也一定會一天天提高的。當然即使這種提高，嚴格說起來，也不過是一種普及。

在文藝工作者方面，從過去關門提高，轉而面向工農兵，進一步向工農兵結合。這結合，有別於過去走馬看花式的「作客」，有別於帶着優越感生活在工農兵中間，這些實際上是和工農兵保持着相當大的距離；而是擺脫了文藝工作者的架子，參加實際工作，從思想上，情感上，生活上和工農兵打成一片，從而前變成爲工農兵行列中的一個成員。現在就有許多文藝工作者，到工廠里去，到農村中去，到部隊里去了到合作社去，當鄉長，鄉文書，指戰員，合作社秘書……他們在工作中也同時幫助文藝，把羣衆文藝推前一步。在實際生活中，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也更容易得到改造。這是個人方面。

劇團更是有計劃地分發到各地去；前年每一個分區（專署）除它原有的劇團以外，上面都派了一個劇團去開秧歌，使劇團觀察跳出狹小的城市圈子，較過去更有計劃地發展到農村中的每一角落，使一些劇團，轉而主要的爲工農兵服務。這就是「秧歌下鄉」。

這還不夠。這只是把文藝（目前主要是秧歌）給與羣衆，爲羣衆服務，而還沒有發動羣衆起來，自己動手。所以，去年的劇團有了新的方針，這就是：「鄉下秧歌」。不是劇團下鄉演秧歌給老百姓看，而是劇團工作者，分成許多小組，分工地，有計劃地去幫助羣衆自己動手，起來開鄉下秧歌。

文藝工作者進一步和工農兵結合後，大大地把羣衆文藝向前推進了一步，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作品的水準，使作品內容豐富，現實，深刻，有力，提出了當前社會上諸問題，也解決了這些問題。所反映的生活，是羣衆的真實生活，所提出的問題，是羣衆所關心的切身問題；這種作品，自然是爲羣衆所歡迎的，同時它就完成了藝術作品的社會任務。

像變工隊（小規模的一種互助集體勞動組合形式）在邊區剛提出的時候，有些地區，由於農民長期的是個體勞動，一時不易接受這種勞動組合的形式，一個區經過各種動員和說服，農民對參加變工隊還是沒有認識和信心，始終徘徊不前。但等到「動員起來」（動員以參加變工隊爲主題的秧歌劇）

在這個區演出以後，軍隊就自動地要求區長村長組織演工隊。

一團秧歌劇為什麼能起這樣的作用呢？因為劇作者和工農兵結合，體會了農民對鹽工隊起不飽的一切問題，解決了這些問題，寫作過程中農民參加，寫好又教給他們唱，徵求他們的意見——成爲和他們結合以後的產物。不僅劇作者如是，演員也是如此，演員爲了裝場一個動員，往往在農民中生活很久，觀察他們，體會他們，表現出來自然就真實。如「兄妹開荒」秧歌劇中，許多動作就是從農民那兒來的。有的則是經過他們修正的。

文藝創作上，也是採取同他們合作，在寫作過程中，或者作品完成後，都直接請教工農兵，讀給他們聽，艾青的「吳清有」一詩，便是其中的一例。

文藝工作者進一步和工農兵結合，僅僅是開展羣衆文藝運動的一面，而且不是主要的一面。

主要的是：發動廣泛羣衆自己動手，用他們自己所熟悉的藝術形式，來表現他們自己的生活，創造他們自己的新藝術。政府方面，只是站在幫助的地位，如像上面所提的，派文藝工作者、劇團下鄉，從各方面來推動與扶助，計劃能做到每鄉有一秧歌隊，每區還有個中心秧歌隊。這些組織形式，根據各地的需要，和原來有的組織形式，如社火、道情班子、自樂班子，秧歌隊等等，在這些舊有的組織上，展開新的藝術活動。本階級對公助的方針，由羣衆自己起來辦理，領導、管理。這些發起、領導的人，多半是勞動英雄，民間藝人等。

這個運動展開以後，長期被壓沒了的民間藝人，得到他們發展才能的地方，長期被壓制和輕視的羣衆創作才能，也有了施展的園地。羣衆創作的內容，特別着重在注意作品的真實性，內容多半是實有其人，實有其事，有時甚至把真人真事編排到創作里去，從來不寫虛無的故事。這種精神，要求反映現實，是做得極好的。但也有時候，不完全根據事實和真人，而加上和綜合一些別地方的人和事，這樣，又豐富了作品內容的典型性。

他們的創作方法，大半是集體性的，可分爲兩種，一種是：純粹是工農兵團已在一塊，三五個人，或更多的人，來湊故事，大夥商量。另一種是工農兵和知識份子合作，這些羣衆作家，並不一定識字，他們想好了故事，湊成功了，再由知識份子加以整理，潤飾。現在可以拿「漁光曲」這秧歌劇舉例來說，這是四個農民的集體創作，事先他們共同商量好了一個故事線索，用本

區的一段事實作爲題材，寫「地主不肯減租，經過說服教育才肯減租了。大家一想，還不完全，單肯減租是不夠的，賦租以後，必須翻租，於是加上地主不肯換約，佃戶不肯交租，換約後，佃戶繳了租子。又有佃戶起，地主不肯減租時，海長來了（海長是地主的親戚），地主想借海長這個名義不減，海長却不管什麼親戚關係，堅持要減，這樣又表現了新社會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此，全面的反映了政府法令，不僅要減租減息，還要保證佃戶，使得主題更加完整了。至於人物的刻畫，言語的加工，是以說服教育中人物的人來創造，熟習地主的人談談地主的生活語言如何表現，但這些山佃農自己來刻畫表現。

像這樣的作品，正不斷從羣衆中產生出來，廣泛地得到羣衆的愛好和擁護。當然，這些作品，藝術上還很幼稚，粗糙，但內容上有豐沛的生命力，有無限的前途。

由於邊區羣衆文藝運動的開展，到處湧現出許多勞動詩人，作家，歌手，像不識字的勞動詩人孫萬福，他寫了許多詩篇，在「放日報」發表，爲人所傳誦，如：

咱們毛主席比如一個太陽，
比如東海上來一盆花，
照到咱們邊區人民是一家，
比如空中通來一塊金，
邊區人民獻到一條心。

用太陽，花，金的形象來比喻人民的領袖，表現出羣衆的熱烈的感情。又如移民英雄馮雲鵬的移民歌曲，也都爲羣衆所愛好，歌唱。至於出席這次文藝大會的工農兵代表，更是充滿了才能的羣衆藝術家，比如韓子興（接近一種快板的形式）專家拓開科，他出席文藝大會，即席就編了下面的歌詞：

文藝大會把會開，代表何志各地來，
所有的材料拿出來，民間公助能解開……

拓開科這樣有才能的民間藝人，是很多的。但現在因爲篇幅的關係，不再多說了。

因為對舊有的舊文藝——在邊區最壞的是舊秧歌，在民間還着佔優勢，全邊區將近一千個秧歌隊之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就是舊秧歌。這樣，改造舊秧歌舊藝人，來發展新秧歌，便成爲開展羣衆文藝的重點任務之一了。劉志仁式的秧歌，是改造舊秧歌的模範和先鋒。

什麼叫做劉志仁式的秧歌呢？

秧歌本來只是打場子，唱一點簡單的歌詞，恭賀慶祝之類的意思，沒有什麼內容，也沒有什麼表演的。劉志仁從一九三七年起就開始編秧歌，他是第一個把秧歌和革命結合起來的人，從那時候起，秧歌開始有了革命的內容。其次，他把秧歌和故事結合起來了。所謂跑故事，共分兩種：一種是地故事，人化裝好在地上表演各種故事；另一種是馬故事，騎在馬上表演故事，故事大半是歷史上的，如「三驢呂布」之類。地故事和馬故事，都只是表演性質，接近所謂「雜劇」那一類，沒有唱的。劉志仁把它和秧歌結合起來以後，豐富了秧歌的形式，使簡單單一的秧歌，開始走上了秧歌劇的形式，得到羣衆廣泛的歡迎。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羣衆對藝術的要求，就是簡單的秧歌已不能夠滿足羣衆的慾望，需要更充實的政治內容，反映他們鬥爭生活的秧歌劇了。羣衆甚至這樣說：「寧看劉志仁的社火，不看別人的戲」。羣衆是最高正嚴格的批評者。

劉志仁的社火，產生了許多富有社會價值的劇本，如「救國公根」，「自衛軍放哨」……秧歌從此有了新的生命。

邊區大部分地區是陝西北部，這兒流行的另一種文藝樣式是：秦腔。秦腔是秦腔，是改造舊劇中的一個重要部門。使秦腔和話劇結合，以富有生命力的活潑的語言，代替那沒有生命的道白，表演手法上也加以現實的基礎。多半表現歷史上事件的秦腔，被進了新的內容；反映現實鬥爭的生活，「五里坡」，「兩親家」……這些劇便是改造後秦腔的一例。

平劇在農村，還有它的羣衆基礎，也須要加以改造。這改造，主要是偏重於思想方面的。平劇全部是反映中國歷史上的事實，而中國歷史，幾乎全部是統治階級所編寫的，是少數人的生活記事，農民的羣衆鬥爭生活是沒被寫的，或者是被歪曲的。這樣的一部中國歷史，它所反映的歷史上的真實，也就很有问题了。平劇所編歷史實蹟是如此的，反映在劇本的內容，也就顯得大大商榷了。改造平劇主要是從演員入手，恢復歷史的真實面貌。被編劇

將級小丑化了，將其正歷史主人的羣衆，便恢復本來面目，而將舊文藝舊戲的好處，也恢復了他的面貌：小丑。

「邊上梁頭」便是改革平劇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這劇裏羣衆是中人，表現了羣衆的力量，羣衆是正派，丑角倒是那些高球，高衙內之流的人物。演技方面，吸收了許多話劇成份，舞台面生動而富於變化，演唱的時候，每一個角色，甚至跑龍套的，也表現出各個不同性格成份的內心情感的表現。至於民間的其他形式，如皮影戲，如傀儡戲……也都加以改造，給予新的內容，爲工農兵服務。

舊藝人長期生活在舊社會里，各種不良的傳統習慣和制度，弄成了他們許多嗜好和不良的作風。圍結和改造舊藝人，主要是從思想上，政治上，對他們進行耐心的教育工作，使他們了解藝術不是爲少數人服務的，爲羣衆服務的藝術，才是真正的光榮事業。同時，在藝術上也幫助他們改造，改訂和創造出新的劇本，只有新的作品的不斷產生，才能代替以至取消封鎖性的舊的作品。在改造舊藝人方面，開始曾有人存着懷疑的心理，以爲這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事實却否定我們的看法。民衆劇團的李下，是個很好的例子。他是一個老藝人，有了鴉片烟的嗜好，他聽到人家說他不易改造，他下了決心，戒了大烟，拋棄舊的一套，接受新社會的思想，他說在邊區沒有一個人不能改造的，連二流子都能轉變，難道我就不如二流子？結果，他以一個新藝人的姿態做爲代表參加了文教會，並且受到獎勵。

平劇工作者，也同樣得到了改造。由於羣衆對秧歌這形式熟悉，喜見樂聞，容易接受，自己動手搞，故開展羣衆文藝運動，是以秧歌爲主，而秧歌又有它的特點，綜合了許多藝術形式：音樂，戲劇，舞蹈……秧歌運動展開以後，其他的藝術形式，也就跟着發展了。

至於話劇，音樂，繪畫……也同樣發展，不過不是主流，不在這兒多說了。

五 大家看報大家辦報

在邊區發行的報紙一共有三四種：第一是帶有全國性的「解放日報」，在邊區發行的份數只佔一部分；第二是邊區性的「邊區日報」，（四開版印

運報)，四種分區報，(五日的或一週的，有鉛印和石印的兩種)，十一種縣報(大都是油印，週報，四附紙)，這些報，邊區內一共發行二一五〇〇份，平均每七十人就有三份定期的報紙。還有邊區部隊出的報紙二十二種不在內，而除每班平均有三份到五份的定期報。第三種是黑板报和壁報，全邊區現在已辦了六六八塊黑板报，至於壁報，每個連隊，機關，學校，工廠，商店，都有。

不會是那一個報，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代表羣衆的意見，大家看報，大家辦報。看報的人就是辦報的人，這樣就消除了編者與讀者之間的隔膜，讀者的意見能及時反映到報上去，成爲編者的意見。每一種報紙，在每一部門，在邊區每一個角落，都有它的通訊員，如「解放日報」，就擁有一千〇幾名通訊員，建立了廣泛的通訊網，各級幹部有責任組織通訊員寫稿。凡是羣衆有意見就可以即時反映到報上，做到真正的言論自由，報紙代表羣衆說話，工作不好的受到批評，工作好的得到表揚。

因此，培養工農通訊員，成爲報紙的方針，有許多通訊員，他們一方面看報紙，提高文化，一方面又爲報紙寫稿。現在全邊區一共有一九五二個通訊員，平均每七十個人，就有一名通訊員。

現在發展最快的是黑板报。黑板报是在鄉村活動中心地設立起一塊黑板，有的由鄉村文化工作委員會辦，有的成立編譯委員會來編，參加編譯的人，大半是小學教員，鄉文書，農民和主人等，從投稿到出版，純粹由羣衆自己動手辦的。小學教員和鄉文書常常是從旁加以幫助。

黑板报內容：主要是邊區和本地的消息，每期刊約二三篇文章，總共不過二三百字。黑板报周圍也是圍結了許多通訊員，如嶺南城的黑板报，有三十名通訊員，全鄉一百八十戶，平均每家就有一個通訊員。而從通訊員的成份上看，有農工八人，中農十三人，貧農十人，小商人三人，半工半農二人，其餘知道這些通訊員是代表各方面的人，如此，各方面的意見都能反映到報上。有的還有這個黑板报，真正成爲羣衆的報紙。

這類的黑板报編委，要由通訊員投票選出，必帶有組織，派成立了編輯小組，每個行政村都有一個小組，民選出組長來。規定通訊員，二十天投稿一次。這些通訊員，有的並不識字，他們怎樣投稿呢？其方法有二：一就是請識字的人代寫條子的稿，二是請話給稿委，由他們代爲登出來。如果捐了話，而不登怎麼辦呢？有一次羣衆要表揚該鄉一個小學教員，捐了話去，恰巧這期是那個小學教員編的，就派把它登出來，投稿的人助臉字的臉臉，臉見沒有，他馬上就托人補寫在上面了。羣衆有言論自由，這樣做了，誰能行麼人去于誰。

羣衆的意見有各種各樣的，看報文的，論文的，歌曲小調的，詩歌歌的

小調最受羣衆歡迎，如嶺南黑板报上，就有這樣一首投稿：

延河水，彎又彎，
婦女識字插模範，
中莊有個高清秀，
洋羊渠有個慕金蘭，
高清秀是模範，
一個識字一百三，
慕金蘭，真能幹，
又織布，又紡線，
才空還把書來念，
能文能武兩雙全。

羣衆運用黑板报成爲批評和表揚的武器，把作好事的人登報表揚叫「上黑板报」，做壞事要批評的叫「爬黑板报」。黑板报成爲空間的輿論陣地。如有兩個人在黑板报前爲小事亂叫打架，羣衆即說你們再鬧給你們「爬黑板报」，當時兩人就不打了。一個政府工作人員，工作不好，羣衆要給他「爬黑板报」，他知道了，馬上改正了。這一來，黑板报又成爲羣衆督促政府的輿論機關了。

黑板报一方面也表揚好人，如賀天才積極生產，報上登了：「賀天才家中新做紡車四架，彈毛弓一個，現在正在動手拉機。動員全家男女紡織，成爲家庭紡織工廠」。

賀天才看見了，甚爲高興，更加積極。另一方面，黑板报也幫助政府推動了整個時期的中心工作，如像上面所談的衛生教育諸項工作，黑板报把本村，別的區，別的消息公佈，刺激了本村，推動了本村的工作。

這是一種新型的報紙，它的發展前途是無限的。

在大家對報大家看報的方針下，邊區的報紙真正做到了羣衆的喉舌。

在讀者方面，全邊區組織了一萬多人讀報，所讀的是「解放日報」，「羣衆報」和各分區的報。讀報的人，主要是小學教員，鄉文書，和邊區農村的人。邊區農村環境，但不容易把讀者集中起來，同時農民很忙，讀報時也得照顧他們的時間。讀報組大半是與生產相結合的，如勞動組織的讀報組，農工隊(雙工隊的另二名稱)——同時也就是讀報組，在勞動餘餘的時間裏，既不必從新召集人，也節省了時間。還有許多識字組，同時也是讀報組

讀報的組織有各種各樣的，看報文的，論文的，歌曲小調的，詩歌歌的

組。有的時候利用農民教徒，到教堂做彌撒的時候，人未到齊，尚未開始彌撒，就對其傳佈，往往又成爲讀報時間。

讀報已成爲這區羣衆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環，他對報紙爲什麼會發生興趣呢？因爲報紙上所登的，大部份是他們自己的事，他們提出了問題，報紙上解決了他們的問題，報紙的內容滿着他們的需要，他們從報上可以得到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生產醫藥衛生智識。脫離了羣衆需要的報紙是沒有前途的，這反黨黨意志的報紙也是沒有前途的，只有真正能爲了羣衆代表羣衆的報紙，才會得到羣衆的擁護。

讀報同時又推動了其他運動。例如報上登了辦學，參加變工隊的消息，他們聽了，便提高了熱忱，參加了這些運動。有些學校，變工隊，就是由讀報組發展起來的。

報紙在這方面，不僅盡了宣傳的作用，同時又起了組織作用，完成了一個命革的報紙所應負有的宣傳和組織的兩大任務。

六 一幅輪廓畫

從這次文教大會上來看這區的文教運動，那內容是極爲豐富而廣泛的，非這篇幅所能盡述的。這兒所接觸到，僅僅是羣衆方面的文教運動，至於部隊的，機關的，學校的，工廠的，都談到。但是這些部門的文教運動的方針和精神，和上面所談的，基本上是一致的，在這裏不多說了。

就是已經接觸到羣衆方面的文教運動，也還是很概括的，很簡略的，只是一幅輪廓畫而已，並且這幅輪廓畫仍舊是粗枝大葉的，這由於筆者當時見聞不廣，材料有限所致，遺漏的地方一定是很多的。

不過從這個運動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一切爲了羣衆的總方針下，這區最近二年來大大的發展了羣衆生產，得到很大的顯著收穫。生產建設，促進了文化建設，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準文化生活，這運動發展下去，反過來又會促進生產運動更向前發展，同時也會促進了其他的運動，那樣燦爛的遠景，那輝煌的成果，在今天是完全可以預見的。

這就是陝甘寧邊區文教運動的一幅輪廓畫，及其遠景。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編後記

這一期合刊，最初是原定在二月底出版的，但因爲在二月二十二日這一天下午，本報的編輯部，因故遷往他處，以致原定出版的人員，不能如期到齊，於是不得不將原定出版的人員，改爲由本報的編輯部，負責出版。這一期合刊，在出版之前，曾經過本報的編輯部，進行過多次的討論，並曾請到本報的編輯部，進行過多次的討論，並曾請到本報的編輯部，進行過多次的討論。這一期合刊，在出版之前，曾經過本報的編輯部，進行過多次的討論，並曾請到本報的編輯部，進行過多次的討論。這一期合刊，在出版之前，曾經過本報的編輯部，進行過多次的討論，並曾請到本報的編輯部，進行過多次的討論。

(上接第一三六頁)

的東西，這種脾氣是從家庭里帶來的尾巴，少爺小姐，嬌生慣養，呼奴喚婢，顯指氣使，這種習氣帶到學校里便倒過來了，因爲老師「傳道授業」，應該尊敬，同學一塊學習工作生活，是平等的，工友靠着勞力與做，是替團體服務，誰都無權罵誰。個性不會永遠不變的，在堅強的團體生活里，壞的個性一定不能允許存在的。

第三是不肯承認錯誤，改正錯誤，有的同學講究面子，明知自己錯了，多方設法掩飾，雖經具體指出，死都不肯承認，真像阿所說的石頭又臭又硬。有的同學當面承認錯誤，背而並不改正，口頭文字承認錯誤，實際行動並不改正，或者改正一部分錯誤，還保存一部分錯誤，對自己的錯誤採取寬鬆放任的態度，好像錯誤全改正了有絲可借似的。

第四是祇知有己，不知有人，有的同學只要他們幫助自己，自己從來不關心他人，自己有一門科學不及格了，便埋怨起來：「老師不肯教我；同學不願意教我；」同學病了，理他幹啥！同學沒有錢買書，「叫我屁事！」媽媽來到家裏，也問問他回去看看，學校開會歡迎畢業同學，却說：「沒有時間參加！」責備他人，無微不至，即使日常生活的一言一動，都是攻擊的材料，只管自己痛快，不顧他人前途，好像來轟炸敵人來搶奪自己，對自己，不用說，是從來不好好反省的。

這裏，與特別指出：我們反對個人主義，並不是否定個人利益，而是個人利益必須從團體利益中求取自由，但是要求自由個人主義，因爲自由主義只有自己的自由，沒有他人的自由，這是必須透視了了解的。

附錄 邊區文教大會的幾項決議

關於開展羣衆衛生醫藥工作的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邊區文教大會通過)

邊區二屆二次參議會批准)

一、邊區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獲得解放，在支
 抗爭羣衆生產的運動普遍開展以後，衛生運動就
 爲羣衆文化運動中的第一等任務。邊區人民由於
 過去長期封建統治的遺毒，直到現在，還遭受大量
 疾病死亡的威脅，威脅着這個威脅如不加以克服，則
 人民的解放就不能完全達到目的，同時對戰爭與生
 產的努力也發生嚴重的影響。抗戰以來，邊區衛生
 醫藥部門對此雖曾作了一些努力，但全面的、有系
 統的工作，還未開始。大會爲此嚴重喚起全邊區各
 方負責同志的切實注意，要求他們迅速動員一切力
 量，爲撲滅邊區大量的疾病死亡而鬥爭。

二、要撲滅大量的疾病死亡，第一項重要的工
 作就是普遍的開展衛生運動。根據調查，邊區人口
 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都是可以預防的傳染病；因喝
 生水，吃腐敗的或霉爛的、可過的食物而往引起的腸
 胃傳染病（傷寒、痢疾、吐瀉水病等），因用不潔
 不潔而往往引起的嬰兒破傷風，因常年不洗澡不洗
 衣服被雨淋往往引起瘧疾所傳染的各種疾病（如瘧疾
 傷寒、回歸熱等）尤爲普遍。相反的，凡是注意
 衛生，勤洗勤擦（毛巾開水燙，新穿舊穿等）和家庭
 （如米糧霉爛，新穿舊穿等）就可以避免這

些疾病的襲擊，因此全區各界人士，必須針對各地
 具體情況，利用一切機會和方法（如小學校、幹部
 班、自衛軍、救護隊、黑板报、歌謠、戲劇、
 秧歌、雜報、畫圖、展覽會、展覽會等）進行對人民
 的衛生教育。在普通衛生方面，主要是多吃營養品
 ，不喝生水，不吃死氣飯，食物防霉、滅蛆滅鼠，
 修好井水窖，人畜分居，修廁所，開大窗，通煙筒
 ，勤洒掃沐浴洗衣晒被等等。在婦孺衛生方面，主
 要是多辦接生訓練班，普遍改造產婆，產婦生產
 時要鋪着，鋪的灰要炒過，帶帶的布子要煮過；
 生產過要睡下，多休息，多吃營養品，月經帶要
 用淨紙或用開水洗淨的舊布片，要注意兩性衛生等
 等。爲要普遍衛生運動，需要動員一切縣、區、鄉
 幹部，小學教員和中小學生勞動隊員和其他積極有
 威望的份子，整軍和機關人員都來學習衛生知識，
 並成爲衛生運動的領導者和宣傳者。而教育家庭婦
 女使能了解衛生常識，尤爲工作中的中心環節。在
 工作中應防止強迫命令和形式主義，並須注意發現
 、創造和表揚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村、一個鄉
 、一個區的範例，用以推動全局。在運動開展之後
 ，即應根據具體情況，加以組織領導，以求持久。

三、醫藥工作是衛生運動的後盾，也是推廣衛
 生反對迷信的有力促進者。邊區現在只有部隊、機
 關中有西醫，農村中只有中醫，好壞合計約有一千
 人；藥品也是中藥多而西藥少，此外就是巫神的
 勢力範圍。因此必須動員一切部隊機關中的西醫
 爲部隊機關服務外，並爲羣衆服務，並派給老百姓
 看病和住院，並於必要時組織巡迴醫療隊下鄉。必
 須動員和幫助一切中醫和一切藥舖認真爲羣衆服務
 。西醫應主動的與中醫親密合作，用科學方法研究
 中藥，幫助中醫科學化共同反對疾病死亡和改造巫
 神，中醫應努力學習科學與學習西醫，空問自己的
 秘方和經驗，技術的醫生尤應幫助教育技術差的
 醫生進步。必須有計劃的研究、培植、採挖和製造
 邊區土產及製造其他外來中西藥的代用品，在可能
 條件下組織羣衆的醫藥合作。對於熱心羣衆服務者
 有獎績，或有新創意的醫藥工作者或衛生醫藥訓練
 班，應予以充份鼓勵和表揚，他們的經驗應予以
 推廣，對於工作中有缺點者，應予批評，以求改進
 。應該大量培養衛生醫藥人才，擴大醫科大學的邊
 區名額，開辦全邊區與各分區的中醫訓練班，助產
 訓練班與可藥訓練班，各分區中藥教授衛生醫藥概
 論課，並提倡醫生和各種醫藥工作者多帶徒弟，以
 解決邊區醫藥幹部的巨大需要。

四、邊區的大量巫神，主要是邊區文化落後以
 及醫藥缺乏和衛生教育不足的產物。因此，要消滅
 巫神的勢力，首先要普及衛生運動和加強醫藥工作
 ，否則就是主觀的空想。採取說服教育，嚴迫命令
 的單行手段，是無濟於事的。但巫神的存在也
 促進了人民的死亡，並增加了衛生運動的困難。因

此，隨着衛生運動的展開，應該在各地推行霍亂預防運動，抓緊適當的時機（如巫神的敲詐勒索，和醫生的治病救人的事實）進行喚起羣衆在自覺的反抗運動與巫神坦白運動。巫神之以酷刑治病人死亡者，即應依法究辦。至於一般的反迷信運動，則應依據羣衆的覺悟與自願進行之，以免與羣衆相對立。

五、各分區應根據地方具體情況，作出衛生醫藥工作的具體計劃，列在地方施政計劃中，以求在數年之內達到若干衛生項目的普遍實施，對一個區有一個能治病的醫生，一個藥舖與幾個會診法接生的助產婦。為此各縣區在邊區政府統一規定的制度下，應進行人口與出生死亡登記，及疫病報告；各屬務機關及醫生應進行疾病登記，以作為執行衛生工作的根據及衡量工作成效的尺度。關於衛生醫藥工作的經費，除由邊區政府統一籌劃事業費與獎勵金外，各地應在羣衆自願的原則下（必須是羣衆自願的，絕對不准強迫），提倡振振財、設振舉式的衛生互助金辦法，以為鄉村保健事業的基礎。

六、衛生運動的開展和醫藥工作的加強，有賴於各方面的通力合作與負責，因此，幹部思想的打通就是這一工作的決定關鍵。大會要求黨政軍民學各方面各級的幹部和邊區各階層的人士，都能響應毛主席和黨同志的號召，切實糾正過去一切不重視衛生醫藥工作，不願作衛生醫藥工作，對衛生醫藥工作必要的人力物力不予解決的錯誤態度。不論何人何時何地，只要有可能，都應該親自動手，參加或幫助衛生醫藥工作的進行。今後各分區各縣、區鄉村的衛生醫藥工作，是否深入，是否有效，將成爲邊區政府對各地考查工作成績的重要標準之一，各縣、區衛生部門對地方衛生醫藥工作幫助的大小，亦將成爲考查工作成績的標準之一。直接負責衛生醫藥工作的同志，尤應重視自己的神聖崗位，加強自己爲羣衆服務的精神，以求達到更大量疾病死亡現象能夠迅速減輕和消滅。

關於培養知識份子 與普及羣衆教育的決議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邊區文教會通過）

邊區二屆二次參議會批准

（一）邊區幹部教育中培養知識份子的任務與羣衆教育中的掃除文盲的任務，由於戰爭形勢和邊區建設的發展，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更爲重要了。抗戰以來，邊區的幹部教育與羣衆教育，在規模上都較前有了大的發展，但在領導上曾經有一個時期受過教條主義傾向的嚴重影響，直至整風運動以後，領導工作中的這個傾向才被糾正。另一方面，多數幹部和學生在整風運動中已廣泛認識到知識份子與羣衆互相結合的需要，而人民羣衆由於近年的生產發展與生活改善，也開始認識到學習文化的需要。因此以正確的方針和廣大的規模，來有系統地培養邊區的知識份子，掃除邊區的文盲，現在不僅完全必要，而且有了相當條件了。

（二）培養大量的邊區知識份子，是今天邊區的頭等任務之一。各級領導幹部必須了解：要完成長期建設邊區的任務，沒有一萬到幾萬個高小畢業至中學畢業程度的本地知識份子，是不能設想的，要達到這個目的，須經過提高現任工農幹部的文化和培養與工農相結合的新的知識份子兩個方法。在提高現任幹部方面，凡不識字或文化水平過低的同志，均應分別組織各中學地幹班、幹部冬訓班、幹部文化夜校、幹部讀報通訊等，在兩年內至三年內一律消滅文盲，達到至少能看懂報章的程度。已識字的亦應努力學習，達到具有高小畢業至初中畢業的程度。以求自己的工作能力與時俱進而不至落後。在培養未來幹部方面，應確定延大及其相當於高中之預科訓練一般外來知識份子外，並須多收各分區邊區學生，按照情況與需要予以一定時期的教育，使爲邊區服務。各分區中學及其地幹班均應在提高質量的條件下擴大數量，使每個級級現任幹部及能升學的高小畢業生有學習的機會。完全小學中的高小部份，在文化發展地區是屬於所謂國民教育範圍，但在邊區目前情況下，高小亦負有幹部教育的一方面任務。各縣應盡量設法克服高小學生入學的困難，其畢業後的出路，原則上應由學生本人或其家長決定，但應盡量爭取其在地方服務或升入中學。邊區各級領導機關，對於所屬在職幹部的文化教育與高小以上的各級學校教育，均須以負責負責親自動手的精神認真領導，按時檢查工作的執行狀況，使培養知識份子的要求在兩三年內達到一定的成績。

(三) 各級幹部學校應徹底肅清教條主義的惡習，這就是說學校的教育內容應從邊區工作的實際需要出發。中等學校以上應按其性質培養出了了解政策並具有相當實際工作技能的人才，同時必須注意一定的必需的知識水平，各中學尤應加強實際結合的文化知識與科學知識的教育。現在有些學校由於各種原因所形成的教育效率下降的現象，應迅速克服。脫離實際脫離羣衆的惡習，對於任何學生和教員人員都是應予徹底糾正的，但我們所應增進的知識份子，應該不僅具有爲人民服務的滿腔熱忱與實際技能，並且具有一定水平的現代科學知識。

爲了提高各級學校的質量，有關的各級領導機關應負責對這些學校及其主要負責人（包括主要教員）使其與實際保持密切接觸，了解本地工作的具體情況與各個時期訓練幹部的具体要求，以便在編制與課程上更切合實際，某些課程並應由有關領導機關直接擔任。高小、中學和短大預科，其招生標準依具體情況規定之，但各級學校的程度一般應大致銜接，其升級與畢業考試應認真舉行；各中學和高小的課程，除因各地需要不同須有伸縮，但應分別取得其主管機關的同意，學校的生產主要應由學校專門部門負責，學生的生活應不致礙其必要的每年至少九個月的學習時間。學生課外活動（如學生會工作、羣衆領導、衛生教育、戲劇工作等），亦均應不致礙學習，並應有目的地配合輔助學習，使成爲學習計劃的一部份。

(四) 羣衆教育應從邊區羣衆的實際需要出發。在目前邊區情況下，羣衆教育的中心任務就是掃除廣大成人失學兒童的文盲，提高其文化與政治覺悟。羣衆目前迫切需要的是起碼的讀寫算能力，而

成爲羣衆生活中最大問題的生產與衛生兩項知識則應構成讀寫算的主要內容。羣衆教育的形式，也應適合於邊區環境。在邊區農村分散，勞力不足，羣衆學習要求尚未普遍的條件之下，爲了廣泛地發動羣衆學習的積極性，廣泛地發動羣衆與政府合作解決教育中人力物力的困難，邊區的初級學校應以民辦公助的村邊爲主要形式，其年限與學制應各地情況決定之。不強求整齊劃一，以不誤生產爲原則。爲了便於貧苦兒童尤其是成人的學習，所有小學校（包括完小）均應按照需要與人力設立早晚午班晚班，並由有能力的學生組織校外識字組，在冬季應着重組織冬學。在沒有學校的地方，則應發動政府機關、駐軍、合作社、變工隊及其他熱心份子領導成立識字組、夜校、冬學等學習組織。組織上述各地形式及其他適用的形式，各應按照具體情況，計劃若干年內首先吸收學齡兒童與青年男子之大部，及其他學習積極份子（如勞動英雄、及若干青年婦女，一般婦女首先學習衛生），都能參加一種學習組織，然後逐漸推廣，在若干年後，做到使時十歲至四十歲的人口之絕大多數都能識一千字以上。

(五) 掃除邊區文盲的任務是巨大而艱難的，但在領導骨幹和廣大羣衆擁護思想，大家動手，通力合作之下，是可以實現的。羣衆教育不但應該服務於羣衆的需要，而且應該經過羣衆的自覺自願，依靠羣衆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因此必須廣泛採取已見成效的民辦公助和民辦民助法，兩學方面，必須首先在思想上作風上肅清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拋棄脫離羣衆的讀本命令辦法。民辦學校成立之前，應先在羣衆經過必要的組織，以求積極份子的出現

與多數羣衆的支援，又須適當解決教員與經費問題，而教員能否在教學內容與方法上體現羣衆的需要，尤爲一個學校能否獲得羣衆擁護的關鍵。民辦必須公助，教員材料經費，都須與政府的幫助解決，而更重的是方針的領導，這比領導公辦的學校更難。民辦也不應不學公辦，一般完小的初級部和好的公辦私小不但仍應存在，且應予以加強，使在民辦學校中起核心的作用。至於識字組冬學等，則民辦公助適應的範圍更廣。無論學校或識字組，爲了吸引羣衆參加都須使羣衆看到學習的利益，因此都須建立獎勵，培養典型，表彰模範，以便由小而大，由少而多，平向主義和急性病是有害的。總之，只有在符合羣衆的需要與自願的條件下羣衆教育才能達到目的。

(六) 爲實現上述邊區教育與羣衆教育的任務，必須切實解決教育行政機構與經費問題。各級領導機關對於教育行政機構應在政治上、學習上、生活上予以極大的關心，並應加以必要的尊重，提高他們的工作能力與熱情，同時並應動員與徵詢有經驗或教學能力的知識份子到教育崗位上來，以充實與加強各級教育行政機關與學校的幹部。各級政府應實成所屬各級學校依其性質計劃地分別培養各級教育幹部。以應日益增加的對於教育幹部的廣泛需要。各級學校與羣衆教育的教材應於一年內全部完成。最後，各級教育行政領導機關本身必需予以加強，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工作作風，如此方能貫徹正確方針的執行，引導邊區教育達到巨大的輝煌的成就。

與多數羣衆的支援，又須適當解決教員與經費問題，而教員能否在教學內容與方法上體現羣衆的需要，尤爲一個學校能否獲得羣衆擁護的關鍵。民辦必須公助，教員材料經費，都須與政府的幫助解決，而更重的是方針的領導，這比領導公辦的學校更難。民辦也不應不學公辦，一般完小的初級部和好的公辦私小不但仍應存在，且應予以加強，使在民辦學校中起核心的作用。至於識字組冬學等，則民辦公助適應的範圍更廣。無論學校或識字組，爲了吸引羣衆參加都須使羣衆看到學習的利益，因此都須建立獎勵，培養典型，表彰模範，以便由小而大，由少而多，平向主義和急性病是有害的。總之，只有在符合羣衆的需要與自願的條件下羣衆教育才能達到目的。

關於發展羣衆藝術的決議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邊區文教大會通過，
邊區二屆二次參議會批准)

一、反映人民生活及指導人民生活的藝術，已證明是一個偉大的教育武器。新的藝術，乃是新的政治、經濟所必不可缺少的伴之一。藝術工作者有責任提高兩方面的任務，而在邊區目前情況下，由於羣衆藝術運動的蓬勃與藝術工作者與羣衆聯繫的薄弱，這更是一個主要的任務。

雖然邊區羣衆及其藝術工作者，已經為了教育自己的地位在鬥爭中創造了自己的藝術，但由於過去一時期被重視不夠，新藝術在羣衆中仍未得到充分發展，宣傳封建迷信的舊藝術在羣衆(主要是農民)中仍佔着相當的優勢，所以迫切需要利用大力量羣衆中發展新藝術和改造舊藝術，使新藝術在邊區建設中，發揮它的力量。

在一九四二年文藝座談會之後，藝術工作者已開始將藝術與羣衆的結合而共同奮鬥。但要在羣衆中完全以新藝術代替舊藝術的陣容，要在藝術工作者中完全以聯名羣衆的陣容代替舊藝術的內容，還需要一個長時期的和多方面的巨大的努力。加強對於藝術工作的領導，團結一切藝術工作者，來達到上述的目的，便是今天邊區藝術戰線上的中心任務。

二、藝術的新舊，基本上決定於其能否爲羣衆的利益服務，能否爲羣衆的戰爭、生產、教育等服務。因此，凡能正確表現新生活(與新社會的歷史)的藝術，都應得到發展，反之都應受到改造；同樣，凡能正確表現舊生活的形式，也都應得到發展，反之也都應受到改造。

要在羣衆中發展新藝術和改造舊藝術，不是簡單的依靠輸入的外力和行政的權力所可奏效的，主要的必須在羣衆中扶助新力量生長和發揮力量。轉變，羣衆是歡迎並能創造新藝術的，這不僅表現在邊區在工廠中，而且也表現在以劉志仁爲代表的邊區的農民中。但又必須承認，舊藝術與羣衆的不密切的歷史，也不僅表現在民間和其他職業性的極大的活動中，而且表現在廣大工廠的春節娛樂或平時娛樂中。因此，今天發展邊區新藝術的任務，必須從兩方面同時進行，即一方面在新基礎上發展，一方面在舊基礎上改造。

羣衆藝術無論新舊，戲劇都是主角，而各種形式的歌劇尤易爲羣衆所歡迎。應該一面在部隊、工廠、學校、機關及市鎮農村中發展羣衆中的話劇和各種戲劇、新樂隊等活動，一面改造舊秧歌、社火及各種舊戲。其他藝術部門也是如此。應該一面在羣衆中發展新文學(工農通訊、牆報、黑板报、新的唱本、故事、新的春聯等)、新美術(新的年畫、木刻、剪紙、新的連環畫、畫報和畫冊、新的洋片等)、新音樂(新的歌歌、新的鼓書等)、新舞蹈和新的藝術組織(俱樂部、文化室、文化台、文化團、展覽會、晚會等)，一面在團結和教育羣衆中舊有的說書人、故事家、雜耍、紙的婦女、小調家、練子嘴家、吹鼓手等，使之爲人民的新生活服務。

在這個方針下，邊區羣衆藝術在一個時期的努力以後，應該呈現一個嶄新的面貌：無論在新舊藝術

關於發展羣衆藝術與通訊工作的決議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邊區文教大會通過)

(准批會議參次二屆二區邊，過通會)

隨着邊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報紙在羣衆中的作用日益加強，最近一年來，全邊區有一萬多羣衆加入讀報組，各區區幹部訓練班已對羣衆的讀報的黑板报，工農通訊員已發展到一千人以上。這些活動，已經證明是發展民主，幫助領導，改進工作和學習文化的極有力的武器。凡是好的讀報組和黑板报的地方，那裏對政府政策法令和上級機關就容易貫徹，生產衛生教育各項工作就容易展開，而且可少開多少會？凡是好的讀報組的地方，那裏工作的情况和經驗就容易了解，而且可少開多少會？因此，更大的進步。因此，更大的發展這些活動，並使這些活動真正充實起來，向各地已經發展的讀報組，是今年邊區羣衆文化工作的任務之一。爲此，特決定：

(一)各地尚未進行讀報的識字班、縫工廠、合作社、婦幼組等，在可能的條件下，均應組織讀報組；各地區幹部部、小學教師、工作人員及一切文

上發展，或在舊基礎上改造的，其內容都是新的和豐富的，其形式也都是新的和豐富的。藝術能與人民的生活和鬥爭相協調，而藝術的內容與形式也自相協調，這種新時代的藝術，那時將在羣衆藝術生活中獲得完全的統治。

三、發展遠區羣衆藝術運動，基本上就是發展與改造農民藝術。秧歌社火爲農民藝術最普遍最重的一種形式，它的活動主要在春節，春節是羣衆藝術的節日。不論是秧歌、社火或其他形式，也不論是在春節或平時，舊基礎既然尚佔優勢，舊基礎上改造就成爲一個十分必要，同時也十分嚴重的任務。

舊基礎上改造與新基礎上發展分不開的。首先必須加強羣衆藝術中已有的新基礎，因爲這些新基礎還很薄弱，經驗還不完全，他們還需要羣衆的監督中經受更多的考驗，所以在已有的新基礎的地方必須加以鞏固，扶助它們的發展，增大它們的作用。同時，盡力在舊基礎上進行改造。在沒有新基礎的地方，尤應着重在舊基礎上改造。改造應從思想入手。改造的對象有急緩、輕重、難易之分，必須先改造急而後較易於改造的，必須擇其要者。改造的對象中又必須區別民間舊形式與統治階級的舊形式，羣衆中業餘的藝人和藝術團體與職業的藝人和藝術團體。但對一切舊藝術、舊藝人、一般的都必須採取改造的方針，而不能採取簡單的打倒的辦法。

發展或改造農民藝術均應注意到今天遠區農村實際條件，特別要注意不脫生產與羣衆自願的原則。藝術上的民主必須在組織與創造各方面充分發揚出來。這並不是說對羣衆藝術活動的領導，而是真正地加強領導。各級領導者和各文藝團體應該密切合作，根據各地情況，在羣衆中佈置工作，培養典型，組織競賽，推動全局。政治上與藝術上的指導幫助尤爲重要。應該供給和教給各羣衆藝術團體與民間藝人以新的或改造過的唱詞和劇本，發動和幫助羣衆自己動手創作，提高和獎勵他們多演新

劇教育，他們去改造他們藝術組織內部的生活和廢除不良習慣。這一切對發展羣衆藝術運動有決定的作用。

四、隨着普及工作的發展，就必然要相對的和逐漸的提高。提高的任務主要應由兩個力量來完成：其一是部隊、工廠、學校、機關的藝術活動；其二是各級政府所領導的專門藝術團體和專門藝術工作者的活動，而羣衆中有特殊藝術才能的人物，亦應注意發展培養，使之參加提高工作的進行。

遠區戰士、工人、學生和機關人員中的戲劇、文學、美術、音樂、舞蹈等活動，對專門家來說當然普及工作的一部份，但比之一般農民代表更前進的力量，因此各主管方面和各藝術團體應以更大的注意，更多的幫助他們從事藝術的學習、表演和創作，除了他們本身範圍內的活動外，並應組織他們利用機會（春節、假期、市集、廟會、集會等）在附近羣衆中進行工作，成爲推動羣衆藝術活動的據點。

延安和各分區（以及可能的縣）的劇團，文工團，其他文藝團體與專門的藝術工作者是指導普及工作的支柱，他們負有羣衆教育與幹部教育的雙重任務。爲了教育，他們首先需要學習——政治的、藝術的與實際生活的學習。他們應經常和下層藝術組織保持聯繫，了解工農羣衆各項藝術活動的情況，予以幫助和領導；尤其是供給他們以各種創作或演出，並視需要與可能與他們進行聯合表演，或集中其精華份子進行短期訓練，一面教育他們，一面由他們學習。分區與縣的劇團，應適應各地各時期工作的要求，經常下鄉，尤其要注意利用廟會、馬大會等演新內容的戲，並應視需要與可能進行其他各種文化藝術工作。一切藝術工作者，均應深入羣衆，他們對於羣衆的了解愈深刻，則他們對於羣衆和幹部可能做的貢獻才愈大。各有關的組織方面應該重視上述這些藝術團體與藝術工作者的工作，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給以細心關切，使他們步伐一致的配合羣衆的努力，爲遠區藝術與遠區建設的遠大前途而奮鬥。

化工作者，均應積極組織這個工作，在工作中應該注意防止形式主義，應該細心研究羣衆的興趣所在，以便引起羣衆參加積極的熱情；應該使讀報工作與羣衆的生產、衛生、識字、娛樂及各種日常問題的解決相聯繫，並應注意培養羣衆中的積極份子，以便使讀報組織成爲能夠持久的團結羣衆推動工作的核心。

（二）在各個市鎮或人口較集中、識字者較多的村莊，創辦真正起作用的大衆黑板报，並使之真正成爲當地羣衆有信心的善於表揚而慎於批評的輿論機關，成爲推動鄉村生產、衛生、識字、娛樂、傳播新聞與改革舊習的武器，爲了更能夠揭發羣衆的積極性，在可能條件下，各地黑板报應由羣衆主辦，政府則盡量予以幫助指導（而不是粗魯的或官僚文書的干涉）。暫時尚不能辦到這一步的，亦應吸納當地羣衆中的公正積極份子組織編委會，經常搜集羣衆的意見，以求不斷的改進，直至完全交由羣衆接辦。

（三）以區爲單位，普遍的組織工農通訊學習組。這個工作主要是以區幹部及本區內熱心的鄉級幹部與小學教員爲基礎。在適當條件時亦可吸收羣衆中的積極份子參加。區幹部應把工農通訊工作與自己的業務研究，工作報告，文化學習及讀報工作結合起來，把參加工農通訊工作當各人的業務工作之一。

（四）上述各項工作的開展，均要求我們的報紙能够增加份數和加速發行。因此紙廠及其主管部門應從各方面力增加報紙的產量，以便各種報紙能够按照需要與可能增加份數，並以分區及縣爲單位，統一籌劃調劑，保證每個讀報組、通訊組與黑板报編委會都有它所需要的報紙。在發行方面，政府主管部門應努力加強邊區各地通訊站的效率，各縣均應建立負責的發行登記制度，並負責規定縣區報紙的運送辦法，以便加強由縣到區鄉的發行通

關於開展工廠文教工作的決議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邊區文教大會通過)
(通過邊區二屆二次參議會批)

一、邊區現有公私大小工廠八十八個，職工一萬二千餘人，目前數目雖小，但這是一個最有發展、最富於生命力的，足以引起一切變化的力量。他們的文教工作，是邊區文教運動中一個極重要的，但是尚未被重視的問題。為了立即結束現在的停頓或自流現象，各工廠首長及有關主管機關，應徹底檢查工廠文教工作一次。根據本決議原則訂出切合實際的計劃，並在主要職員中指定專人負責擔任此後文教工作的一切領導事宜，邊區執委會與邊區文化衛生機關亦應協同各主管機關督促與協助文教工作之進行。

二、現在工廠中文育半文盲佔多數，各廠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務，就是在兩年至三年內堅持掃除五十歲以下的一切工人職員與事務人員中的文盲(五十歲以上者依自願)，並提高他們的政治與技術水平。為了學用一致，最好由各主要機關協助各廠自編切合實際的、包括政治與業務的文化教材，為了適應學習者時間、程度、程度不一致的情況，最好把學習單位儘可能分散縮小，多數收廠中知識份子擔任教員，並舉行工教工的小先生辦法，以補不足。對文化較高的職工，則應按需要建立各種研究業務與提高政治文化的

一、邊區現有公私大小工廠八十八個，職工一萬二千餘人，目前數目雖小，但這是一個最有發展、最富於生命力的，足以引起一切變化的力量。他們的文教工作，是邊區文教運動中一個極重要的，但是尚未被重視的問題。為了立即結束現在的停頓或自流現象，各工廠首長及有關主管機關，應徹底檢查工廠文教工作一次。根據本決議原則訂出切合實際的計劃，並在主要職員中指定專人負責擔任此後文教工作的一切領導事宜，邊區執委會與邊區文化衛生機關亦應協同各主管機關督促與協助文教工作之進行。

二、現在工廠中文育半文盲佔多數，各廠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務，就是在兩年至三年內堅持掃除五十歲以下的一切工人職員與事務人員中的文盲(五十歲以上者依自願)，並提高他們的政治與技術水平。為了學用一致，最好由各主要機關協助各廠自編切合實際的、包括政治與業務的文化教材，為了適應學習者時間、程度、程度不一致的情況，最好把學習單位儘可能分散縮小，多數收廠中知識份子擔任教員，並舉行工教工的小先生辦法，以補不足。對文化較高的職工，則應按需要建立各種研究業務與提高政治文化的

三、工廠應積極推動生產、加強團結、發揚民主、教育羣衆的重要工具，應實行全廠職工大家辦、大家看的方針，糾正少數人辦、多數人不管，或工會辦、廠方不管的現象。隨報的編輯應與廠大衆保持密切聯繫，在工人中廣泛建立通訊組織，鼓勵與幫助大衆積極寫稿。其內容除着重表揚模範，鼓勵積極份子之外，並應提倡具體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以改進生產管理與勞動態度。隨報的文字應短小精悍，應把目前許多枯燥空洞的大報，改造成爲生動活潑的小報與黑板报。

四、工廠的藝術娛樂活動，兼有教育羣衆、調劑生活的兩種作用，亦應予以適當的重視。在目前人力、物力、時間、材料均感缺乏的條件下，應多

關於機關學校文教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決議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邊區文教大會通過，
中共中央辦公廳與邊區二屆二次參議會批准)

的。在教育中應採用一致的原則規定他們的課程內容，從他們的工種及生活中挑選教材，並應組織人員了解時事的要求，進行宣傳工作，應以加強其政治學習，開展和結合其文化學習，在學習組織上，應適合其年齡、年輪、程度、時間均示一致的特點，一般應採取集中領導、分散教育的辦法，並應提倡其份子經過教育與工農交朋友，及義務人員學習互助的小先生制，以解決教育困難。

(三) 應將工作與生活恢復後所必需。目前大部份機關學校的娛樂工作，都太簡單而不普遍。應利用多種多樣的娛樂形式，吸收各類愛好不同增長不同的同志都參加，對義務人員更應派專人幫助推動，組織球隊和歌隊、樂隊、平劇等小組，使娛樂活動成為羣衆性的東西。

(四) 應將學校的衛生工作，應即決執行預防為主，治療為輔的方针，無論個人衛生、環境衛生與飲食衛生（營養與清潔），凡今天的條件可能做到的，都應在不鋪張不浪費的原則下力求改進。機關學校的義務人員，應與總務部門配合，親自動手發動羣衆，造成羣衆性的衛生運動，尤應加強義務人員的衛生教育。

關於加強榮譽軍人教育及娛樂活動的決議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總政文)

大會通過，茲將二屆二次全會批准

(一) 爲了使回到後方的榮譽軍人便於在後方條件下繼續爲戰爭與革命服務，提高他們的文化和政治是必要的。爲此，應即加強榮譽軍人教育工作的組織，使現在榮校工作的殘廢幹部及休養的機關同志在兩三年內提高其政治覺悟的程度，並能在政治學習上得到及時的指導。估計到榮校學員的勞動生產能力的

具體情況，應設法使他們的生活任務，與給一部份教育訓練，並由出版機關出版或廉價供給他們以各種通俗讀物與報刊，對於分散在各機關學校部隊村中的榮譽軍人的教育工作，各有關負責部門亦應注意加強之。

(二) 爲了使榮譽軍人得到更多的精神安慰，應注意給他們參加娛樂活動的一切機會。各文化團的、機關、學校、部隊，於舉行娛樂晚會時，應注意邀請他們參加，對新由前方回來的榮譽軍人，應儘可能由主管機關組織歡迎晚會。在休養月內，延安與邊區各地方黨府及機關，亦應能組織招待榮譽軍人的晚會，並分派劇團、歌隊、電影團到各機關、院及榮校進行慰問。對榮校的日常娛樂活動及其「血花」劇團，應給予物質上與技術上的幫助。

（上接九頁）

可用物資，均應作極大的努力，是如出一轍的。小國內閣由於敵國議會的支持，今後無疑是更加堅決執行決戰的政策。

三、解散親日政治會，另選法西斯的親敵黨。親日政治會成立於一九四二年五月，是東條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勝利的條件下面組織起來的法西斯議會，它把絕大部份的議員都網羅在內，使他們在議會中無條件地支持政府的戰爭政策。可是由於親政會包括了各派親政份子，內部矛盾和意見分歧並不能根本消除，從最初成立時就帶來了這個弱點。在目前盟國攻勢壓迫之下，日寇需要組織員所有國民來粉飾掩飾的時候，舊的機關已經不適用了。因此在這次議會閉幕後，組織新黨勢必更加擴大，其後親政會特種組織了一個委員會，研究組織「新黨」的具體方案。而小內亦表示贊成成立新黨，並聲明準備將大政翼贊會，轉變為新黨政府一行政的補助機關，以免妨礙組織新黨。從小內支持「新黨」的組成，顯然可以看到這個「新黨」在條件下更能打開時局與更徹底驅除敵寇，而願使他們作爲執行決戰的組織員。

所以總括起來說，日寇這次議會，一方面固然暴露出日寇在軍事失利上所受到的種種困難，但同時也可以看出日寇企圖作最後決戰的準備。雖然，日寇所遇的困難，在今後戰爭的進程中，是無法加以克服的，但並不說我們就可以坐待勝利到來。因此在敵人最後的掙扎的時候，我們就應隨時注意敵人對於大政決戰的準備與不準備，任何協商和平之手段的政治態度，如果我們更應迅速走向死亡的道路，那末就應該迅速切實準備反攻，粉碎敵寇的大政決戰的準備與政治的陰謀。

書評及其他

從兩本三恩樓月書論士大夫階級的生活態度

蘆 蕪

作者在「新新」所發表的「夢與幻」中內容「一文藝」會就兩本三恩樓月書（「鬼戀」、「荒原的英法海峽」），論述了徐行先生作品裡包含的思想內容的實質。作者的意見是兩部份，原來打算分為兩篇文章；因此，在前一篇文章裡僅僅包括了作者的意見的第一部份。原就準備另寫一文，但當前的現實生活，既繁迫，最難要談的東西很多，把太多的氣力花費在這些關於夢幻的「才子」們身上，也並不怎樣合算；因此第二部份意見也於這週沒有寫出。

照理說，要論述到一個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現的思想內容時，最好是從作品到人，從人到作品的全面去理解；因為一個作者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他思想方式的體現。要全面的去理解一個作者的作品，也就是要從作品中去尋出一個作者底思想，情緒的變革與發展，要看出他這種變革經過了怎樣曲折的思想歷程，他再的的發展方面。但如數得很，到徐行先生的作品筆者讀得並不多，因為作者沒有開過幾本出版「月書」，每次既缺乏多餘的錢去購置這一類的書，更沒空過一份「夜間」與「昨夜」的心境去欣賞這一類隨手的藝術。因此，單是憑「鬼戀」與「荒原的英法海峽」兩書來論述作者的思想內容，恐怕也過於十分過份。

我之選取「鬼戀」，「荒原的英法海峽」，不單是因為三恩樓身書裡，這兩本流行得最廣，且重要的是在這兩本著者徐行先生的藝術與作者的思想、情緒以及他的理想與追求。在「鬼戀」的後記裡，作者更直白的表示了：「我忠實於我的技術，在於這些的是我更忠實於我的思想和感情。」因此，儘管就這兩本書來論，想來不至於對作者的思想和藝術有歪曲和塗抹的地方。

在徐行作品裡究竟包含着若何樣的思想內容？簡單的說就是「虛無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這種個人主義並不是在種種條件中討，要求人的解放，性靈的解放那種帶着進步意識的思想。他底「虛無主義」的思想也不是屠格涅夫的英維巴扎洛夫身上，那種否定一切，不承認一切權威，在當時帶着進步意識的思想；一方面在時代的進展早已超越了前一二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後期；另一方面徐行的「虛無主義」的思想也有他不同的內涵，它說是有着中國社會所形成的特殊屬性。

在作者的思想中，無疑地，暫時底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曾經留下影響；這在「荒原的英法海峽」裏表現得最明白。他期望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孤島上，去拓殖一個自由的王國，這理想是自由，平等，沒有階級，沒有貧富，沒有貧賤，沒有戰爭。作者將這理想稱之為「浪漫的革命與建設的社會」。這些理想實行起來呢，都是：「……一個海盜的系統，與一個社會主義的教育」。因此，我們就不能單純的看到這理想是在故事外面白日夢的外衣，而且應該看到作者在暗藏着他的空想的理想。

這種理想並不新奇，因為這不過是近幾個世紀以來歐、亞、美洲所寫的關於「烏托邦」社會的空想小說的舊套，最多不過是翻過一點社會的幻覺和幻想。上面的討論也簡單地指出，在徐行的作品中的思想，是「虛無主義」，「個人主義」以及空想社會主義給予作者的影響；這些思想，是「虛無主義」，又並不侷限於上述這些思想；在上面我會提到是帶着中國社會的特殊屬性；也就我們所要着重指出的一點屬性。

三思樓月書在今天之所以能夠有其極度的流傳，徐衍的思想能較部份的應運而生，（據一個在學校唸書的朋友告訴我，聽說外省的同學中，很多人是喜歡看三思樓月書的），我們不能把它孤立的看成只是文字技巧能迎合他們的口味的問題，正如我們不能把徐衍的思想看作是別人的思想樣。（最近渝市某報有人指出：徐衍作品的得以流行是因為剽竊外國作家的原故，此點固亦不失為因素之一。）

我以為貫串在徐衍作品中的思想，正是舊的士大夫階級那種逃避現實，玩世而個人主義的思想，如果硬要強壯杜撰一個名字，無妨叫做「中國式的虛無主義」。這種思想在士大夫階級的身上可以說有着久遠的傳統，對於今天的知識份子，這種思想仍然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從他們這種思想的方式表現到他們生活的方式上，就是親與生活，玩世不恭的生活態度。

在士大夫階級裡，可以說一直是分割成兩種不同的類型，這就是廟堂之土的儒者和山林之士的道家。這「玩世的個人主義」可以把「老」「莊」寫作的思想作代表，從表面上看廟堂之士和山林之士是相對立的，道家思想在表面上似乎也受到統治階級的冷淡，但實際上不僅是「廟堂之士」和「山林之士」相互轉化，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也同樣地被統治階級作為壓制臣下，鞏固統治的方法。譬如漢宣帝教訓他的兒子元帝說，我們漢家自有制度，難用魯國國家，你個重儒學，非把漢朝弄壞不可。後來元帝果然把漢朝弄壞了。自從魏晉以後，士大夫階級更高度地發展了道家的玩世的思想。之後加上外來的佛教的虛無思想的影响，更使這種玩世的個人主義變着虛無主義的外衣。從魏晉士大夫一直到明末的「公安」、「竟陵」，都代表着這種傳統。他們一貫的對待生活的方式，他們的一套適應環境的辦法：或者是山林隱逸，或者是清談談話，或者是急流勇退，或者是明哲保身。照他們的說法就是把自已的思想與情感，寄托在一個虛無飄渺的「境界」，從現實退避開來，躲到「自我」或「精神領域」。

士大夫階級這種逃避現實，玩世不恭的個人主義，這種成長於中國土壤上的「虛無主義」，是絕不同於巴札洛夫的虛無主義的。這種中國式的虛無主義，常常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表示在自我或「唯我」的精神狀態，這就是所謂的「獨與天地相往來」。另一方面則是在「忘我」的精神狀態時，就是「與世相遺」的主觀唯心思想。在這種思想裡面，包括着很多市儈的內核，因為他們的「清談談話」，或者是「急流勇退」都不過是為了「明

哲保身」。雖然他們愛以「山林之士」，「居士」，「山人」的姿態出現，但他們隨時可以換身一變而成爲「廟堂之士」。作「山林之士」時也許連「清談談話」，一朝附風攀龍，馬上就會變成歌功頌德的「廟堂之士」。

在「鬼戀」和「竟釋的英法海峽」裡所表現出來的，正是這種士大夫階級的思想；因爲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產生這種思想的社會基礎依然存在（自然，今天知識份子所表現的和舊時士大夫階級有別）。我們知道中國知識份子的出身，多半是農村的小的土地佔有者，或者是城市的小資產者，這種玩世的個人主義正是上述兩種人最容易有的思想（尤其是第一種人）。他們用不着汲汲於各利的追逐；他們希望從主觀的玄想中來尋求心靈的安適。在「鬼戀」中，作者一再表白了這種思想。

「我經過了這人世，嘗過了這人生，認識了這人心，我要做鬼，做鬼。」

這裏就正表現出對人生的厭倦，對生活的疲乏，希望從現實生活裡逃脫開來「冷眼旁觀」，這樣就是想生活在現實世界中又不爲現實生活所苦惱，生活在人世間又不爲人世間的痛苦所糾纏，不必對「人世的變化」負任何責任。

這種對生活的厭倦與疲乏轉到逃避現實，親歷生活的根源在於地方；這就因爲他們一方面憎惡現實的醜惡，一方面又缺乏那種意志的毅力去抗拒腐敗和醜惡的力量。既不甘於爲跟着腐敗的力量墮落下去，也缺乏那種面對困難，戰勝困難的勇氣。這種像高爾基「在人間」裡所寫的：

「……我的心中有兩個人，一個對於卑鄙醜惡的事情，知道得太多了，因此，多少有點懶惰性；他被每天所發生的慘事所牽擾；因爲對於生活，對於人們的態度，是不確定而懷疑的，對一切人，對自己都抱着悲憫的心情。這個人想離家窮居，僻靜的讀書生活，又夢想着修道院，森林中看守小屋，波斯，以及什麼地方市外的守夜人之類的職務，儘可能想少去人的地方，儘可能想離開人……」

是的，他們就成天的想離家窮居，僻靜的讀書生活，或者是隱居在一個「墳墓」的地方，去「冷觀」人世的變化，或者是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孤島上，去實現自己的「理想」。雖然這些人還多少保留着一點「明瞭是非」的認識，憎惡醜惡的正義感；但他們已經失掉了「有所爲」的決心，失掉了堅

轉著保衛真理的勇氣，對真、善的理想失去了追求的力量。

這種消沉、麻木的狀態如果繼續下去，對罪惡和不義的情惡漸漸淡了，對正義和真理也完全失去了信心和希望。他們漸漸和現實生活隔絕起來，趨免在精神生活上和現實生活發生糾葛。自欺欺人地想把自己封閉在一個主觀的小天地裡，爲了避免由現實生活激起的苦惱、憤恨，退而在自己內心裡製造出一些海市蜃樓的幻境。

這些人常常會辯解他們初衷是要否定庸俗、習慣，反抗因襲的歷史傳統；結果却不可免的被歷史傳統俘虜了去。他們迷感、苦惱、追求着，至少對現實還有感覺，還有懷疑，他們相信自己是厭惡自私與虛偽的。但積而久之，他們不再關心人類的命運，歷史的行程，成天計較的却只是一己的善業。尤其是在這種消沉、麻木形成一種生活態度以後，他不僅會以爲這是一種合理的生活態度，希望傳染給別人。甚至，他們會覺得那些面對現實，滲透人生的戰士只是「來自尋煩惱的傻瓜」；也就是「鬼」，「荒誕的英法海峽」的作者所鄙視的爲世俗生活所糾纏的人。他們會認爲生活的道路就是從現實的戰鬥生活退避下來，退到自我的「精神領域」。外界儘管再惡，自己大可不必管他，因爲自我的精神生活，還保持着一己的高潔。在這些漂亮的外衣下隱藏着一些甚麼真實的內容呢？他們追求着一條阻力最小的道路，用逃避現實來掩藏自己的怯懦。從這種局部和現實相苟且的企圖，達到完全和社會相妥協的道路。

這種玩世的個人主義，對於自己是逃避現實，追逐享樂；對於自己以外的一切事情呢？是懷疑一切，否定一切。對於那些追逐私利，在虛偽的泥沼中生活的人，他們固然也表示鄙棄；但對那些執着於生活，辛勤的在爲人類謀取幸福的人，他們却又像「哲人」似的，表示出自己的清高，自閉着可以超越這種市俗的條件。保持着對於一切的虛無觀；他否定一切，還不光是壞的一面，惡的一面，對於善的一面，好的一面，也同樣加以非難。這倒不是他對一切都已經明白，而是想用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態度來嚴肅真實的對象，嚴肅自己的對象，自稱「歷遍了人生」的「鬼」的女主人不是以這種宣戰者的姿態出現嗎？

其實，在這種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態度下，他們混淆了對於是非，美醜的辨別。對於醜惡的東西，他們缺乏真實的憎惡，對於美善的東西他們也缺乏衷心的愛好。「人生不過是一個大舞台」，人們也不過是一種不得已的

「應景表演」者而已。他們相信的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這種虛偽的哲學。這就造成了他們唯唯諾諾的應景態度；是非不明，愛憎不清，對於有所爲，有所不爲缺乏堅持執着的態度。「一切的問題，原只有是和而非的兩種答案，他却想這還是和非以外的第三者。」他們既不願隨波逐流，又不願認錯自己，反說醜惡，既不願做一個被動的奴隸，又不願做一個主動的革命者。他們看不清自己的力量，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獨立自主的自我被廢棄。他們喪失了對於生活的突擊力量，喪失了戰鬥的主動性，結果，就常常聽到他們自怨自艾的抱怨着「一方面不見容於統治者，一方面也不見容於人民大眾，永遠扮演着悲劇的角色。」

作爲一種病態的傾向，在這種我們分析了這類作品中即思想內容的實質，彌補了這種病態的根源。今天這一類含毒的作品，雖然有若某種程度的虛傳，但我們相信這不過是文藝運動發展的河床裡，激流起的某類說，它必然會被澎湃的主流所沖激，所掩沒地完全可以預見的。在「鬼」的登記簿，徐野先生担心的作品會是煙塵噴射出的油煙，是一種有損於人的原料，如果我們公平的說，煙塵製造的原料雖然有損於人，但它還沒有意識地要去損人。這些傳播的「月書」就不僅是損人的原料，而且這作者意識地要用這種思想去感染人，感染一些年青而純潔的心靈，這就簡直是行騙的走方郎中在販賣着包裹着誘衣的毒藥了。對於這種不能用藝術的良心去說服的人，我們要用筆去誅伐，我們不能目睹着年青的飢渴的心靈去吞食這些含毒的食糧。

新的中國在孕育，在成長，舊的士大夫階級所憑藉的社會基礎也正在分化，在崩解；現實的戰鬥生活已經嚴肅了中國的知識份子，今天，除了和廣大人民大眾相結合以外，任何其他的企圖都是行不通的死路。要剝離自己的眼睛就以爲可以逃避現實，始終不過是一種夢想，現實生活會嚴峻的擊碎他們的好夢。

解開時局的鏈

龍恭

讀「民意」雜誌一至十期

世界政治的潮流是和平，是民主，是各階級各階級的聯合進步的政治，一切民主國家都希望於戰後世界的和平安定繁榮，以便能蘇復在戰爭時期的破壞，而提高人民的生活幸福水平。任何國家的法西斯政治都要破壞這種世界和平，任何國家的反民主傾向都要使美國內戰不安，這樣的國家必不能勝於民主的世界，也更不能為民主的世界所容。美國經濟界和輿論界對中國民主團結的關切，對反民主及團結的批評，就是這種民主潮流的一個波浪。

讀「民意」雜誌第一期張君勳先生之「確立中國國民對於國際系統之關係及其地位」一文，頗具可感。張先生認為中國目前所以被列為四大強國之一，「即為外交上之關係和氣，而氣和氣可也，而為內政上之實至名歸不可也」，其引英國海峽士報之言說：「中國不足為強國，即在數十年之內，因戰後之解放，中國獲得的團結，與經濟開發，雖不足為強國也」。中國不足為強國，這在今大國士日趨情形下，我們自也無可申辯。如何始足為強國呢？如何才能真正打敗敵寇，收復失地，使河山盡光呢？張君士報的意見：是內部團結，經濟開發，亦即張先生所說的「可知內政上較著成效，而後

外交上成為強國，自為程序之必然也」。團結，經濟與內政，總合一句話，應該便是民主。

左舜生先生的「努力與思索」（同前）一文中，具體揭示五點：一、和平統一；二、民主；三、文化進步；四、經濟開發；五、現代國防。而這五點之中，民主是最根本的條件，「欲實現和平統一，則必須民主，不民主或民主而成份不高，則和平統一之實現，必增加困難或減低其可能性」。這就是說不民主則必不能統一，欲統一必先行民主。而文化，經濟之提高，「係指文化和經濟在提高的過程中，即以民主的態度出之，否則則令提高，不獨於民主的實現無益，或反而成為實現民主一種更有力的障礙」。這就是必須先有民主的文化和民主的經濟政策，如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經濟自由，而後才能有民主的經濟和文化的提高，不然便是如德日法西斯及民主式的提高，終只能供少數軍閥財閥壟斷行斷送國運而已。至於國防，左先生引述了甲午之役中國海軍的失敗和英人赫德之話：「一海軍者，現代文明國家所關之在也，不若眼於根本，而徒溺於枝葉，決無是處」。而後做職着：「五四運動底前後，去年已二十五年了，當時明也的中國人已高呼着魯先生（民主）張先生（科

學），可是到了今天，要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的，有待於全國人一致努力」。這也就是說：無現代文明國家的民主政治，必不能不有現代文明國家的強大國防，軍事實根據於政治。

張君天先生闡述民主政治之真義說：「民主政治所要求的理想政府，不是神聖政府，也不是金龍的政府，而是人民政府，所謂人民政府，即是為人民所有，由人民所治，並為人民所享政府」。在近代民主政治尚未出現以前，國家與政府兩個觀念，每每易於混同。身居政府的人，常常以為政府就是國家，如像法國路易十四所說「朕即國家」一樣，要人民用廢從國家的忠誠去服從政府，並且服從政府中的人員，即人民也多以忠君就是愛國，服從政府就是服從國家，分不清君與國，也分不清政府與國家。到近代民主政治出現以後，政府與國家，嚴格劃分。在民主政治下，政府也是國家的必要機關，但政府的形式須依人民的意向而規定，政府的人員須依人民的意向而更迭，政府的政策須依人民的意向而決定。所以人民在政府之上，而不在政府之下，人民直屬於國家，而非直屬於政府。一權力雖是政治上必要的一類工具，但欲使政府不濫用此工具，致禍於人民，必須人民將最高的權力或最後的權力，即主權，拿到自己手裡。人民有了政治的權力，然後才能有政治的自由。人民沒有政治的權力，便無所謂人民政治自由。所以近代民主政治運動，從一方面看，是人民向政府爭自由的一種運動；從另一方面看，則是人民向政府爭權力的一種運動」（第六期）。「民主政治的實質，所謂『上權』。若人民有了國家的最高主權，政府在其下而產生，並向它負責，這就是民主的國家」。

如果人民沒有這種主權，政府不向人民負責，那就不是民主的國家，這種新義是非常明白的。

綜合張先生左先生陳先生的意見，都認為民主政治的內容除了進步之外，還得同時注意秩序，左先生說：「爲急於求治，莫亂了必進的步驟」，張先生說：「第一，內亂頻仍之國不能有良政治」，

第二，主權不統一之國家不能有良政治；第三，政權之更迭不能於和平狀態行之者不能有良政治」。

陳先生則指出「民主政治是以秩序爲手段，而不以秩序爲目的。換句話說，民主政治不須要有秩序，而且要有進步。秩序只是進步的必要手段，而非政治的唯一目的」。政治進步路上的秩序，對於人民說來，雖不是有利的，在真正的民主了的時候，這當也不成其爲問題，如張先生所說：「近代國家一方實全國人民以服從政府，他方界人民以批評與進取政府人物之權利，是爲言論自由，議會討論，選舉時對政府之信任或不信任。一方有中央政府以統一全國，他方則許人民有地方自治之權，俾得自處理其政務且收因地制宜之效。一方則遵守法律爲人民之義務，他方則議訂法律出於人民代表之自由討論。一方人民有不得反抗政府之義務，他方則人民有批評之權利，有思想之自由。……」這一方面，也就是張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大變局心」，

第二期中所揭明的「公平競爭」的「政黨道德」。必使競爭之各黨派建基於公平基礎上，絕不假手於武力，亦絕不許有任何防範限制的法令，坦白許與民意而定進退。這樣才是真正的民主秩序，變而不亂的真諦。

陳啓天先生又指出：「民主政治所以能進步政治進步的方法，通常約有三大理，一爲輿論制度，二爲代議制度，三爲多黨制度」。這就是說民主政治的基礎必須保障言論、思想、舉行的自由，從而保障輿論，必須保障集會、結社、旅行、通信、身體、居住、購學、論政等等的自由，以鞏固代議和多黨制度。沒有以上的自由，就不是民主，沒有保障以上各種自由的政府，就不是民主的政府。

張申府先生在「我們爲什麼要民主與自由？」一文中（第六期），擴大以上諸種自由，認爲還要有職業自由，及免除匱乏，脫離恐懼，不至受閉之自由，就是經濟自由。這也是很重要的，人民由於沒有職業和生活的保障，就不能自由地參與政治活動，而僅少數上層份子得以操縱其間，使雖有民主之名，而仍無民主之實，所謂「經濟見此點，乃提出上述之經濟自由，以爲對盟國作戰爭取之目的之一。劉清揚先生在「婦女對黨義的認識」（第九期）一文中指出的最後解放區普通農婦擔任縣長，區長，鄉長的事實，也可以用來證明這點，因爲在那些地方，婦女們正和男人們在同等的經濟條件下，職業保障，政治自由，所以才能發揮那種勃然的民主活力的。

今天不能實現民主政治，完全要看我們的決心，一切條件都成熟了，人民也是有力量的。張申府先生對這有很精到的意見，他說：「憲政應在憲法之前，以便憲法有事實的根據，不應憲法在憲法之後，幻想社會作機械的變革」。因爲內外的推迫，中國的民主運動，顯而易見已經非山口的階段走上實行的階段不可了。他以為人民各種自由應固固然重要，但如黨義黨得這些自由或權利都實現了，然後才可以談民主，那就要求者一方面說只是自欺，就給予者一方面說就是欺人。事實上在今日那不但想不濟急，簡直且是不可能。在理論上

自由與民主是不相離的，在今日事實上，簡也必待有了民主，所謂人民的種種自由或權利，乃能具體，有實，而不空。而這種民主的實現是推什麼呢？「一個時候，在一個國家，對於國家大事，總不外幾個意見。在一個國家緊急的時候，政治必須全領一致。所謂全國一致者，就是使全體不同的代表意見融洽爲一體。使各個方面獲得所表現，都得爲國家盡其所能，而不因一己而昧於其它」。那就是在政治基礎上，在大形上，在政策上，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政治基礎上，各黨有組織的不同派別，不同意見的全國一致。作到這層也說作到統一，作不到這層，也就作不到統一。」「民主哲學」，第十期）這就是幾幾時局打敗敵人，建立新中國，實行民主的真正問題。

「民意」雜誌的稿，筆者但就上述一點論述所感，自難免掛一漏萬，影刊已出至十一期，主編者爲左舜生先生，謝委爲國共兩黨以外之黨派的領導人。

自由與民主是不相離的，在今日事實上，簡也必待有了民主，所謂人民的種種自由或權利，乃能具體，有實，而不空。而這種民主的實現是推什麼呢？「一個時候，在一個國家，對於國家大事，總不外幾個意見。在一個國家緊急的時候，政治必須全領一致。所謂全國一致者，就是使全體不同的代表意見融洽爲一體。使各個方面獲得所表現，都得爲國家盡其所能，而不因一己而昧於其它」。那就是在政治基礎上，在大形上，在政策上，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政治基礎上，各黨有組織的不同派別，不同意見的全國一致。作到這層也說作到統一，作不到這層，也就作不到統一。」「民主哲學」，第十期）這就是幾幾時局打敗敵人，建立新中國，實行民主的真正問題。

今天不能實現民主政治，完全要看我們的決心，一切條件都成熟了，人民也是有力量的。張申府先生對這有很精到的意見，他說：「憲政應在憲法之前，以便憲法有事實的根據，不應憲法在憲法之後，幻想社會作機械的變革」。因爲內外的推迫，中國的民主運動，顯而易見已經非山口的階段走上實行的階段不可了。他以為人民各種自由應固固然重要，但如黨義黨得這些自由或權利都實現了，然後才可以談民主，那就要求者一方面說只是自欺，就給予者一方面說就是欺人。事實上在今日那不但想不濟急，簡直且是不可能。在理論上

自由與民主是不相離的，在今日事實上，簡也必待有了民主，所謂人民的種種自由或權利，乃能具體，有實，而不空。而這種民主的實現是推什麼呢？「一個時候，在一個國家，對於國家大事，總不外幾個意見。在一個國家緊急的時候，政治必須全領一致。所謂全國一致者，就是使全體不同的代表意見融洽爲一體。使各個方面獲得所表現，都得爲國家盡其所能，而不因一己而昧於其它」。那就是在政治基礎上，在大形上，在政策上，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政治基礎上，各黨有組織的不同派別，不同意見的全國一致。作到這層也說作到統一，作不到這層，也就作不到統一。」「民主哲學」，第十期）這就是幾幾時局打敗敵人，建立新中國，實行民主的真正問題。

今天不能實現民主政治，完全要看我們的決心，一切條件都成熟了，人民也是有力量的。張申府先生對這有很精到的意見，他說：「憲政應在憲法之前，以便憲法有事實的根據，不應憲法在憲法之後，幻想社會作機械的變革」。因爲內外的推迫，中國的民主運動，顯而易見已經非山口的階段走上實行的階段不可了。他以為人民各種自由應固固然重要，但如黨義黨得這些自由或權利都實現了，然後才可以談民主，那就要求者一方面說只是自欺，就給予者一方面說就是欺人。事實上在今日那不但想不濟急，簡直且是不可能。在理論上

自由與民主是不相離的，在今日事實上，簡也必待有了民主，所謂人民的種種自由或權利，乃能具體，有實，而不空。而這種民主的實現是推什麼呢？「一個時候，在一個國家，對於國家大事，總不外幾個意見。在一個國家緊急的時候，政治必須全領一致。所謂全國一致者，就是使全體不同的代表意見融洽爲一體。使各個方面獲得所表現，都得爲國家盡其所能，而不因一己而昧於其它」。那就是在政治基礎上，在大形上，在政策上，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政治基礎上，各黨有組織的不同派別，不同意見的全國一致。作到這層也說作到統一，作不到這層，也就作不到統一。」「民主哲學」，第十期）這就是幾幾時局打敗敵人，建立新中國，實行民主的真正問題。

今天不能實現民主政治，完全要看我們的決心，一切條件都成熟了，人民也是有力量的。張申府先生對這有很精到的意見，他說：「憲政應在憲法之前，以便憲法有事實的根據，不應憲法在憲法之後，幻想社會作機械的變革」。因爲內外的推迫，中國的民主運動，顯而易見已經非山口的階段走上實行的階段不可了。他以為人民各種自由應固固然重要，但如黨義黨得這些自由或權利都實現了，然後才可以談民主，那就要求者一方面說只是自欺，就給予者一方面說就是欺人。事實上在今日那不但想不濟急，簡直且是不可能。在理論上

自由與民主是不相離的，在今日事實上，簡也必待有了民主，所謂人民的種種自由或權利，乃能具體，有實，而不空。而這種民主的實現是推什麼呢？「一個時候，在一個國家，對於國家大事，總不外幾個意見。在一個國家緊急的時候，政治必須全領一致。所謂全國一致者，就是使全體不同的代表意見融洽爲一體。使各個方面獲得所表現，都得爲國家盡其所能，而不因一己而昧於其它」。那就是在政治基礎上，在大形上，在政策上，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政治基礎上，各黨有組織的不同派別，不同意見的全國一致。作到這層也說作到統一，作不到這層，也就作不到統一。」「民主哲學」，第十期）這就是幾幾時局打敗敵人，建立新中國，實行民主的真正問題。

今天不能實現民主政治，完全要看我們的決心，一切條件都成熟了，人民也是有力量的。張申府先生對這有很精到的意見，他說：「憲政應在憲法之前，以便憲法有事實的根據，不應憲法在憲法之後，幻想社會作機械的變革」。因爲內外的推迫，中國的民主運動，顯而易見已經非山口的階段走上實行的階段不可了。他以為人民各種自由應固固然重要，但如黨義黨得這些自由或權利都實現了，然後才可以談民主，那就要求者一方面說只是自欺，就給予者一方面說就是欺人。事實上在今日那不但想不濟急，簡直且是不可能。在理論上

自由與民主是不相離的，在今日事實上，簡也必待有了民主，所謂人民的種種自由或權利，乃能具體，有實，而不空。而這種民主的實現是推什麼呢？「一個時候，在一個國家，對於國家大事，總不外幾個意見。在一個國家緊急的時候，政治必須全領一致。所謂全國一致者，就是使全體不同的代表意見融洽爲一體。使各個方面獲得所表現，都得爲國家盡其所能，而不因一己而昧於其它」。那就是在政治基礎上，在大形上，在政策上，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政治基礎上，各黨有組織的不同派別，不同意見的全國一致。作到這層也說作到統一，作不到這層，也就作不到統一。」「民主哲學」，第十期）這就是幾幾時局打敗敵人，建立新中國，實行民主的真正問題。

代 郵

一讀者先生：

賜示悉：尹啓民先生的

「中國歷史講座」，因爲第

六章以後都被審查機關檢扣

，刊不出來。

第一號筆談

讀者之頁

知識青年怎樣推進黨運動

編者的話

本欄從原來的「信箱」改成「讀者之頁」時，我們曾經向讀者諸君說明過，這不僅是意味着一個名稱的更換，更主要的是感到編輯者的人力和知識都有限，專是過去那種「問」與「答」的方式，所能解答的問題既不多，而且也很難說是圓滿和切當。因此，我們把「信箱」改成「讀者之頁」是希望讀者諸君提出的問題，在「羣衆」的讀者中間來展開討論，用集體的力量來解答問題，自然更能深入的掘發問題的本質。而且也使我們向讀者諸君學習到更多的東西。

這一期我們開始了「讀者之頁」的第一次筆談。題目是從許多讀者的來信中抽取出來的。也許有讀者提出疑難的詢問，今天，爭取民主的實施是全國民眾的戰鬥要求，爲甚麼要把推進黨民主運動的討論題目，限制在知識份子呢？我們想：首先需要弄清楚，這裡提出的知識青年決不只是指今天在學校裏讀書的同學，而是包括一切在學和在業的青年，只要他們對今天的現實還有感應，有着要求民主的願望，那無論是在學和在業的，他們都會同樣的感到這一個問題，也同樣會提出他們的意見。我們相信在民主潮流的衝擊與奔流前面，誰也不可能作一個「與世相遺」的旁觀者。

一個先驅者曾經說過這樣的話：「知識份子有兩種形態：一種像鐘擺一樣動搖不定；一種像指針一樣，告訴人們甚麼時候是清晨、正午、和夜裏？」我們不能否認知識份子有一種時代的敏感（自然決定人類命運的是廣大的工農大眾的力量）。在近代革命運動史上，知識份子也一直顯示出他的先鋒和積極作用。今天我們認識到要求民主是全國民眾共同的慾求，而廣大的工農要求民主的願望還有待覺醒的知識青年去發和組織。知識份子一方面負有組織發動工農的任務，但同時也必須向工農大眾學習，和工農大眾相結合，成爲工農大眾中的一員，這樣才可能形成巨大的力量，完成歷史所付予的艱鉅任務。今天，我們說要推進黨民主運動，正是要使民主運動普及到廣大的人民中去，使爭民主的力量從溪流、湖泊、變成江河與海洋，這樣，人民的力量就會推動一切，主宰一切。

下面摘錄發表的幾封信，有的是提出了問題，有的是揭發了一些現象，從這些現象我們可以看出甚麼力量阻止了民主運動的推進。另一方面，既使在各種困難的條件下面，在青年朋友中間大部份人已經認識到，如果沒有民主政治的實施，抗戰的勝利就不可能；因此，他們已經逐漸成爲民主運動的積極推動者。林建屏、薛林二位先生的來信都很长，這裏只是摘錄有關的一部份，其餘的問題想個別作答。張明先生提出的問題，在第二期的「讀者之頁」裡，有過一點答覆，希望參看。張明先生的來信，揭發了一些知識青年本身存在的病態傾向，這些缺點，阻礙了他們對民主運動貢獻出自己的力量，阻礙了他們和

家接洽，和人民大眾相接近。我們應當指出，在爭取民主的運動中，對於知識份子本身就是自我變革的過程。沒有這種自我改造，民主運動也就缺乏二種堅實的基礎。我們應當首先探究以造成這些病態傾向的社會根源，和造成與培養這種病態傾向的社會勢力作鬥爭，在向這種社會勢力作鬥爭的時候，我們也應當不斷的變革了自己。我們所以要用這種主觀上造成這些病態傾向的思維根源，也就是要指出主觀力量如何加強，如何改造，來適合於今天爭取民主的鬥爭。

我們應當「重來」的讀者諸君，熱烈地來參加討論，這裡無論是摘錄的來信和讀者所加的說明，都不過是對這個問題，提供了一些材料和提出一些問題。希望用在「重來」的讀者中展開討論。至於應該如何來解答提出的問題，怎樣從認識而達到行動的實踐，就有待於讀者諸君來討論，來解答了。我們準備從下一期起，就發表各種討論的意見，經過一些時候，再根據大家的意見，總結出結論。這只是筆談會的開始，為着使我們以後能夠繼續討論一些問題，希望不要拖得太久。

來信摘要

(一)

「……同學們逐漸的從過去那種「獨善其身」，「少管閒事」的態度改變過來，不僅對於時局的關心提高，而且很多同學都希望就自身力量所及作一些事情，以前對於學生自治會，大家不是說它是「傀儡」，就把它當成「御用機關」，除了某些「特種人物」是很少人過問的；但這次却出人意外，有兩星期熱烈的競選，同學們都很熱烈的來參加，自治會候選人有二十多個，競選人都接受了他們當選後要怎樣為同學們謀福利的競選演說，在這一次競選後，那些「特種人物」多數滾蛋了，同學們從這個小問題上看到了民主的好處，同學們似乎也由此體認到民主並不是甚麼遙遠和空洞的東西，而是切身的問題。……」

但幾年來抑壓和低沉的氣壓給同學們情緒的影響太深了，在長期的沉默和寂寞的境遇下，養成對政治普遍冷漠的現象，這種現象的改變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改得過來的。」

——林建屏 一月七日

(二)

「隨著同學們對時局的關心的增加，而招致起一種新的苦悶，大家雖然都知道了，爭取民主是自己的任務，既使一向埋首書本的同學，今天也感覺到，全世界規模的民主戰爭已日益走向勝利，我們仍然是在政治貪污，民

力萎縮，軍事失利的情形下，有人把這比成「舊藍中的一點藍」，大家也覺得除了澈底實行民主也很難有辦法改變這種局面。但究竟怎樣爭取民主政改的實施，許多人却還想繼續「一二九」或抗戰初期的那種爭取民主鬥爭的方式；他們多數習慣於登高一呼，大刀闊斧的作法，而不大願意沉着、堅實、埋頭苦幹的作法，常常因為這種操切求速的心理，影響到和週圍比較落後的同事的接近。

我時常和幾個朋友們在想，同學們這種注意時事政治的興趣，怎樣才能更加廣泛，怎樣才會使同學們從這種對時事的關切，進一步的去探究根源，在大後方的環境下，應當採取甚麼樣的民主鬥爭的方式。我們為此有過一些爭論，意見也很零碎，希望聽到各方面的意見，我想，總還有很多朋友有着相同的苦悶。……」

——語林

(三)

「……我們和一些同事中比較關心時局的，時常作一種談天似的座談，交換一些對於時局的意見，最近一次，輪到一位留德多年，學有專長的工程師發言，他除了對於時局提出了一般的看法後，他沉痛的說：「我過去以為只要切切實實學習點有用的技術，就可以報效國家，用不着關心什麼政治。但現在我知道這是行不通的。你不關心政治，但政治却來影響你。」

「使你有天大的本領，也無用武之地，不僅談不上報效國家，連生活都發生問題，用不着你的本領呵！這種殘酷的現實，迫使我覺悟到：無論事什麼的，都必須關心政治，進而爭取改良政治，所以我決心跟隨大家多研究政治」。回答他這一番講話是大家的歡笑。

這座橋樑的工體，是在本國大難臨頭後，赴日本研究有年，最後轉赴德國研究航空工程，博得航空工程師學位，為我國航空界有經驗的專家。……回國後在各大工廠及XXXX會服務，積極從事學術研究的學問，應付是極繁重了，但當這道得其反。由於他不拉人事關係，不善逢迎，竟先後不獲升位。最後，他終於不得不辭職回國，與他同輩的馬牛不視及同機關裏來藉口。在這極端困難的時期，但對於他已經是「非非所用」了。

……他是一個「雙料救金」的洋學生。

從這想可以想到，政府不負的影響，有甚於此，多麼廣泛。對於一些把政治的政象，以中斷實施，這作與自己無關係的朋友，這應是一個有力標準吧！

——本 是 二月二十一日

(四)

……

——這座橋樑的工體，是在本國大難臨頭後，赴日本研究有年，最後轉赴德國研究航空工程，博得航空工程師學位，為我國航空界有經驗的專家。……回國後在各大工廠及XXXX會服務，積極從事學術研究的學問，應付是極繁重了，但當這道得其反。由於他不拉人事關係，不善逢迎，竟先後不獲升位。最後，他終於不得不辭職回國，與他同輩的馬牛不視及同機關裏來藉口。在這極端困難的時期，但對於他已經是「非非所用」了。

……

——這座橋樑的工體，是在本國大難臨頭後，赴日本研究有年，最後轉赴德國研究航空工程，博得航空工程師學位，為我國航空界有經驗的專家。……回國後在各大工廠及XXXX會服務，積極從事學術研究的學問，應付是極繁重了，但當這道得其反。由於他不拉人事關係，不善逢迎，竟先後不獲升位。最後，他終於不得不辭職回國，與他同輩的馬牛不視及同機關裏來藉口。在這極端困難的時期，但對於他已經是「非非所用」了。

……

——這座橋樑的工體，是在本國大難臨頭後，赴日本研究有年，最後轉赴德國研究航空工程，博得航空工程師學位，為我國航空界有經驗的專家。……回國後在各大工廠及XXXX會服務，積極從事學術研究的學問，應付是極繁重了，但當這道得其反。由於他不拉人事關係，不善逢迎，竟先後不獲升位。最後，他終於不得不辭職回國，與他同輩的馬牛不視及同機關裏來藉口。在這極端困難的時期，但對於他已經是「非非所用」了。

……

——這座橋樑的工體，是在本國大難臨頭後，赴日本研究有年，最後轉赴德國研究航空工程，博得航空工程師學位，為我國航空界有經驗的專家。……回國後在各大工廠及XXXX會服務，積極從事學術研究的學問，應付是極繁重了，但當這道得其反。由於他不拉人事關係，不善逢迎，竟先後不獲升位。最後，他終於不得不辭職回國，與他同輩的馬牛不視及同機關裏來藉口。在這極端困難的時期，但對於他已經是「非非所用」了。

……

——這座橋樑的工體，是在本國大難臨頭後，赴日本研究有年，最後轉赴德國研究航空工程，博得航空工程師學位，為我國航空界有經驗的專家。……回國後在各大工廠及XXXX會服務，積極從事學術研究的學問，應付是極繁重了，但當這道得其反。由於他不拉人事關係，不善逢迎，竟先後不獲升位。最後，他終於不得不辭職回國，與他同輩的馬牛不視及同機關裏來藉口。在這極端困難的時期，但對於他已經是「非非所用」了。

……

——這座橋樑的工體，是在本國大難臨頭後，赴日本研究有年，最後轉赴德國研究航空工程，博得航空工程師學位，為我國航空界有經驗的專家。……回國後在各大工廠及XXXX會服務，積極從事學術研究的學問，應付是極繁重了，但當這道得其反。由於他不拉人事關係，不善逢迎，竟先後不獲升位。最後，他終於不得不辭職回國，與他同輩的馬牛不視及同機關裏來藉口。在這極端困難的時期，但對於他已經是「非非所用」了。

專的建議

……

——這座橋樑的工體，是在本國大難臨頭後，赴日本研究有年，最後轉赴德國研究航空工程，博得航空工程師學位，為我國航空界有經驗的專家。……回國後在各大工廠及XXXX會服務，積極從事學術研究的學問，應付是極繁重了，但當這道得其反。由於他不拉人事關係，不善逢迎，竟先後不獲升位。最後，他終於不得不辭職回國，與他同輩的馬牛不視及同機關裏來藉口。在這極端困難的時期，但對於他已經是「非非所用」了。

——本 是 二月十四日

(五)

……

——這座橋樑的工體，是在本國大難臨頭後，赴日本研究有年，最後轉赴德國研究航空工程，博得航空工程師學位，為我國航空界有經驗的專家。……回國後在各大工廠及XXXX會服務，積極從事學術研究的學問，應付是極繁重了，但當這道得其反。由於他不拉人事關係，不善逢迎，竟先後不獲升位。最後，他終於不得不辭職回國，與他同輩的馬牛不視及同機關裏來藉口。在這極端困難的時期，但對於他已經是「非非所用」了。

……

——這座橋樑的工體，是在本國大難臨頭後，赴日本研究有年，最後轉赴德國研究航空工程，博得航空工程師學位，為我國航空界有經驗的專家。……回國後在各大工廠及XXXX會服務，積極從事學術研究的學問，應付是極繁重了，但當這道得其反。由於他不拉人事關係，不善逢迎，竟先後不獲升位。最後，他終於不得不辭職回國，與他同輩的馬牛不視及同機關裏來藉口。在這極端困難的時期，但對於他已經是「非非所用」了。

……

——這座橋樑的工體，是在本國大難臨頭後，赴日本研究有年，最後轉赴德國研究航空工程，博得航空工程師學位，為我國航空界有經驗的專家。……回國後在各大工廠及XXXX會服務，積極從事學術研究的學問，應付是極繁重了，但當這道得其反。由於他不拉人事關係，不善逢迎，竟先後不獲升位。最後，他終於不得不辭職回國，與他同輩的馬牛不視及同機關裏來藉口。在這極端困難的時期，但對於他已經是「非非所用」了。

……

——這座橋樑的工體，是在本國大難臨頭後，赴日本研究有年，最後轉赴德國研究航空工程，博得航空工程師學位，為我國航空界有經驗的專家。……回國後在各大工廠及XXXX會服務，積極從事學術研究的學問，應付是極繁重了，但當這道得其反。由於他不拉人事關係，不善逢迎，竟先後不獲升位。最後，他終於不得不辭職回國，與他同輩的馬牛不視及同機關裏來藉口。在這極端困難的時期，但對於他已經是「非非所用」了。

——本 是

(六)

……

——這座橋樑的工體，是在本國大難臨頭後，赴日本研究有年，最後轉赴德國研究航空工程，博得航空工程師學位，為我國航空界有經驗的專家。……回國後在各大工廠及XXXX會服務，積極從事學術研究的學問，應付是極繁重了，但當這道得其反。由於他不拉人事關係，不善逢迎，竟先後不獲升位。最後，他終於不得不辭職回國，與他同輩的馬牛不視及同機關裏來藉口。在這極端困難的時期，但對於他已經是「非非所用」了。

——本 是

阻礙同學們團結的是甚麼？

浪川

浪川先生文章，原名「怎樣加強同學團結」，全文長了，係以在學者來檢討青年同學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這種發表的只是此文的一部份，浪川先生在文章裡首先指出，在這個偉大的偉大時日裡，中國的知識份子的肩負，負荷着艱鉅的任務。青年同學帶着他們的熱情，誠實，愛護真理，嚮往光明的優良品質，但他們從社會生長出來，他們也帶着因襲的負荷，陳腐的習染，譬如自私、散漫、貪婪虛榮、容易動搖這些缺點。但今天要戰勝敵人，爭取民主的實現，都需要青年同學能團結起來，凝成巨大的力量，但舊的習染却正阻礙着這種團結；今天要使青年同學能團結，和外在的阻力鬥爭時，對於自己缺點也就是批判和變革的過程。只有這種勇敢的自我批判，才能夠使自身鍛鍊得更堅實，更有力。這編，浪川先生指出了今天學校裡，阻礙同學團結的原因，更希望在校同學提出意見來共同討論。

編者

誰阻礙着我們的團結呢？

法西斯及其走狗首先阻礙着我們團結。法西斯是敢害怕和敢仇恨青年團結的，他把青年視為危險份子，以為青年是替牠挖墳墓的，所以牠時常叫囂着：「要提防青年啊！」牠像魔鬼一樣到處伸出鐵爪，抓住青年，迫害青年，在牠的專制與殘虐的作法下，青年像石籠里生長的幼苗一樣，隨時有被壓死的可能，牠所認為最好的標準青年是嚴肅木的奴才，如果你不合於牠定的標準，牠的持槍就會像蜜蜂採花一樣的跟奔你，監視你，不但要考察你平日的生活態度，還要統治你腦子裡的思想，於是，許多家庭最好的子弟，學校最好的學生，社會最好的青年，不受威脅利誘，便被開除，被監禁，被暗殺。大批的青年被放逐到死亡的路上，他們從甲地被趕到乙地，從乙地又被趕到丙地，遍滿飢饉恐怖非人的生活。這便是法西斯及其走狗壓迫下的青年的厄運：

1. 生命無保障，身體不自由。

2. 生活無保障，工作不自由。

3. 思想被統治，言論不自由。

4. 關在學校裡死讀書，讀死書，讀着死。

在法西斯的統治下，真是人間地獄！沒有正義，公理，良心可言，更無所謂民主，集會十分困難，研究毫無自由，連兩個人講話都成問題。大家都把真實的心關閉起來，同學間團結是萬分艱難的，意大利有句流行的話：「許多人在一起是擁護法西斯主義者，一個人的時候是反對法西斯主義者」。這是最好的說明，這說明了法西斯統治下的青年團結是非常艱難的，如果不展開反法西斯及其走狗的鬥爭，青年是無法團結的，這也說明了在法西斯統治下青年團結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義的火種埋在人們的心底，隨時隨地都可以點着，熊熊地燃燒起來。

宗派成見與關門作風

其次宗派成見與關門作風阻礙着我們團結。什麼是宗派成見呢？宗派成見就是小圈子主義，認為「自己是人」，什麼都是對的，沒有一點錯誤。有功則彼此標榜，有過則互相譴責，如果，不是「自己的人」，什麼都是錯的，或者明知是對的，還要不在乎地亂打一通，這是「行幫主義」「同鄉觀念」發展的結果。什麼是關門作風呢？關門作風，就是「關起大門來做皇帝」，不估計客觀環境的變化，不關心羣衆的情緒與要求，害怕與羣衆接近，合作。這是閉戶造車，一定不能適合軌道，宗派成見與關門作風恰好是一對雙生的姊妹，是血肉相連的。因為有宗派成見才有關門作風，也因為有關門作風才有宗派成見，宗派成見像一付有色的眼鏡，我們戴着便看不清真實的世界；關門作風像鎖着尖刺的刺網，我們帶了，便斬斷了自己與周圍廣大羣衆的連繫，這付有色的眼鏡，如果不打破，如果不去掉滿身的刺；我們是無法與他人合作團結來改造這醜陋的世界的。不可否認：宗派成見與關門作風在我們中間還嚴重存在着，重要的有下面幾種表現：

第一表現在小圈子主義。無原則的爭鬧，有些同學因為言論，地點、學校、班級、興趣、以及性別的不同，習慣地結成一個個的小圈子，圈子內的都是「好朋友」，錯了都是對的；圈子外的都是「壞不住」，對的都成問題，對圈子內保持一團和氣，或者再擠出去幾個；對圈子外總要噴噴咕咕，或者再拉攏幾個，藉勢欺人，於是這講話的和講那話的鬧起來，鬧城的與鄉下的鬧起來，這個學校的與那個學校的鬧起來，這姓與那姓的鬧起來，

老班的態度，斷不允許新的，新班的胆小，不敢和老班的接近，愛讀社會科學的幾笑愛好文藝的做「詩人」、「藝術家」；愛好文藝的讀社會科學的做「革命專家」，男同學罵女同學：「小姐」、「賢貨」；女同學罵男同學：「少爺」、「痞子」；互相攻擊，刀對刀出，甚至弄得頭破血流，淚眼汪汪；大家仔細一想，不知道底爲了什麼，有的說「爲了出氣」。忘記了大敵當前，專門向自家入出手，這是小氣，陰陽怪氣，損害了人家，放蕩了大敵，這是極卑怯的行爲，要不得的。

第二，表現在害怕失掉「領導權」，不敢與他人合作，有些同學佔據自治會或者班會，藉口說不到「能幹的同學」，便一個人或者少數人包辦；即使找同學來工作，也是找自己的「好朋友」或者親戚同鄉，拒絕與廣大的同學合作，甚至「包而不辦」，寧肯放棄工作，不肯別人去做，一定要佈置「自己的人」，造成個人勢力，以便欺上瞞下，作威作福。其實，這種「佔着鰲頭不屬屎」的官僚主義的臭架子是保不住「領導權」的，因爲不會與廣大的同學合作，領導的「天下」便會一天天縮小，終至寡人一個，衆叛親離。還有：害怕同學批評，害怕同學進步，歡迎台同學的落後性來鞏固個人的地位，也會是這個下場。

第三，表現在公式主義和片面想法，有的同學不去好好地了解同學共同點與不同點，不關心同學的環境與變動，祇是用一個公式談話、作文、待人、做事，無論何種何地，都是一樣，好像數學上「十」，永遠不變的，這樣的談話一定枯燥，這樣的作文一定無味，這樣的待人一定粗糙，這樣的做事一定壞事，公式主義是害死人的，是妨礙團結的。

內政部重慶新登記證書字號掛牌一伍號
川東郵政管理局第六七〇號登記執照爲第一類新聞紙

有的同學片面的想法是錯誤的，只看見自己的長處，不看見自己的短處，就驕傲起來，以爲了不起；只看見自己的短處，不看見自己的長處，就悲觀起來，以爲無希望；只看見同學的優點，不看見同學的缺點，就以爲天生成的；只看見同學的缺點，不看見同學的優點，就以爲無法進步，只看見事情的順利，便會樂觀，只看見困難，便會悲觀，這些都是片面的死板的眼光，不知道自己，同學和事情是變動的，不懂得「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的道理，不明白「要看見森林，也要看見樹木」的方法，談天片面，或有問題，結論錯誤，行動自然不會正確的。

第四，表現在麻木苟安與懶惰失志，有的同學對周圍的事情漠不關心，不看報紙，不想國事，同學病了，也不理睬，更懶得幫助落後的同學，糾正錯誤的見解，什麼都不管，連腦子也麻木了，以爲自己生活在世外桃源，可以平安度日，一旦敵人打來，還莫名其妙；或者聽到一些謠言，便張惶失措，庸人自擾。「平日不燒香，臨時抱佛腳」，是害人害己的。

這些成見偏見與不好的作風，必須徹底改正，我們不要麻木不仁，將敵人若做朋友；也不要疑神疑鬼，到處都是敵人，把自己縮到牛角尖裡去，我們要有堅定的立場，民族的氣節，臨大難不變，見大義不爭，但也不要固執己見，脫離羣衆。我們不要善與人同，臨時應變，才能保持這種立場和氣節。再次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阻礙着我們團結。什麼是自由主義呢？自由主義是感情用事，只顧至上。感情衝動，興高采烈時，放聲大笑；感情低落，興趣退時，什麼也不管。只管個人高壓不高興，不顧及對團體的影響怎樣。只知道個人自由，不顧破壞

團體的紀律，什麼是個人主義呢？個人主義是一個以個人利益爲前提，當事情適合個人利益的時候，可能幹幾下子；但是當事情轉入困難階段，妨礙個人利益，即便對團體有利，也不顧幹了，甚至回頭來破壞事情，個人主義是只顧自己，不顧團體，爲了個人的利益，可以犧牲團體的利益。自由主義的根源還是個人主義，個人自由主義是個人主義的變質，它使團體鬆懈，工作消沉，使團體力量最衰弱，我們要堅決地與它鬥爭，才能加強團結。不可否認的，個人自由主義在團體中間流行，主要的有下面幾種表現：

第一是個人第一團體第二，有的同學做自己的事情，精細負責，做團體的工作，敷衍了事，自己的筆記寫得非常整潔，看了又看，團體的帳簿抄得錯字連篇，草不在乎；有的同學做演員，出出風頭，還算可以；幹團體的事務，麻煩瑣屑，費時費力，很少人知，便老子「懶惰」，飯反正在得喫；有的同學管理自己的東西十分周密，非常愛惜，團體的東西到處亂丟，掉了也不要緊，自己的一隻筆筒不見了，便大驚小怪：「我的筆筒誰拿了？」其實筆筒還在他自己的手上，團體的報紙丟在地上，却懶得拾起，團體的書籍塗壞，遺失，好像沒有什麼關係的，這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表現。

第二是團體公約不遵守，我的個性是這樣：有的同學藉口不合個性，破壞團體公約，稍有不如己意，便想推翻大家的議案，採取單獨行動，心目中毫無團體的紀律，亂講亂做，不顧大局。我高興與這樣便要這樣，大家都應該服從我，即便你對我笑，我可笑，我對你拍桌子，瞪眼睛，也不算無禮。我的脾氣是這樣，其實這種脾氣並不是大上掉下

(下接一一九頁)

本期零售三十二元

羣衆第十卷^三四期合刊附冊

孔墨底批判

魯迅

一 論孔學的基本立場

到現在還將孔子與墨子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們都是大師，都有不凡的門徒，尤其孔子，二千年來是被視為了通天教主，關於他們的傳說和學說，自然不過有不少的泛化和傳益。例如我們讀「論語」，便只見到耶穌基督怎樣的神奇，不信能治的病着手成春，而且還有起死回生的大力。關於孔墨雖然沒有這種驚人神化，而各有各的門戶內是充分被人聖化了的。因此，我們如未能探求他們的志本立場之前，所有關於他們的傳說或著作，我們都不好輕率地相信。那裏又覺得要實地探求他們的志本立場呢？很慶幸的是他們的態度差不多是完全相反的，我們最好是在反對辯論原來的故事裏說中去探明他們相互的關係。反對派所傳的材料，毫無疑問不會有遺漏之辭，即使有隱晦含糊的地方，而在顯明相互間的關係上是斷然正確的。因此我採取了這一

魯國之變反對派的子思去我魯國反對者的真影。

孟子發起，他是反對孔子的。在禮府的「孟子」書裡面有「非儒篇」，那裡面有幾段關於孔子的故事，我覺得最有研究的價值。

第一個故事：

「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

晏子不對。

景公曰：以孔丘語者人者衆矣，俱以爲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

晏子對曰：聖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坐問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齊其上下之怨。孔丘之稱，知白公之謀而率之以石乞。君身義誠而白公釋（殺）。聖隨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曾聽於君必利人，駁行於下必利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周謀以奉成，勞思盡知以行邪，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非德之義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聖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

景公曰：嗚呼！脫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恐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

這個故事，在年代上有些大漏洞。齊白公之亂是在魯哀公十六年，這一年的四月孔子死，七

月白公騰獲獲。齊景公既已死去十二年，魯國比齊公還死得早。因此以前的人便說這是墨子的「深固之辭」，那自然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不過這固就算是深固吧，我覺得很有意思。因為我們從這兒可以看出：墨子是贊成「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的，孔子呢則和這相反，「勸下風上，敦臣殺君」。這說實實一點吧，便是墨子是反對亂黨，而孔子是有斷言助亂黨的嫌疑的。這是極有意味的一個對照。

第二個故事：

「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悅，欲封之以尼谿，以告墨子。」

墨子曰：不可。夫儒者居（傲傲）而自顧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音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忘事，不可使守職。宗（崇）喪猶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修飾以譽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飾以觀衆，博學不可使讓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參禘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饋財不能贖其樂。兼飾邪術以受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傳家。今君對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

公曰：善。

於是厚其禮，習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

孔丘乃怒怒於魯公與墨子，乃樹膠與牛皮於田常之門，魯南郭惠子以所欲塔。歸於魯，則齊將伐魯，告于質曰：「堪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質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齊。以救高國難，使毋得齊田常之亂。勸越伐吳，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億術數。孔丘之謀也。」

這段故事的前半也見「晏子春秋」外篇，但「晏子春秋」一書很明顯地是墨子學派的人所假託的。墨子反對孔子的說話完全是墨子的理論，公孟篇云：「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實為棺槨，多為衣食，……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此足以喪天下。』」這四政和這兒的假借自願，好樂淫人，立命愈事，遊魂循哀，是完全一致的。這段故事當然也是在假小說。但最要緊的還是在後半。同前一個故事，孔子在幫忙白公勝一樣，他又在幫忙田成子。這事恐怕接近事實，另一反對派的莊子後學，在「盜跖篇」裡也提到過一些影子：「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但在論語裡所說的情形便完全不同了。

「陳成子執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國殺其君，請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若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完全是忠於主治，而反對亂賊的立場。但我們如要做一個公平的批判人，就寧肯相信弟子和莊子，而不肯相信一些孔門後學的。因為「三子從之」，我們當從多數，這是一。凡是扶助或同情亂賊的人，他的子孫後代是難也要着他擔負掩護的，這是二。

第三個故事：

「孔丘爲魯司寇，食（捨）公室而率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決植」。這故事頗殘缺，「決植」兩字上沒有文字，不過我想是何何會的。決假爲扶，植是戶旁註，相傳「孔子之動能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開」（註），「決植」大約就是當時季孫執走時，城門掩上了，逃不出，而孔子替他把城門掩開了。這位子斥大力士，照墨子看來是心術不正，所以他的弟子們也就跟着他學，到處搗亂。以下是這三個故事的總批評：

「孔丘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貢季路輔孔懼亂乎術，隱貨亂乎齊，佛解以中牟叛，漆雕刑殘，×莫大焉。夫爲子弟後生（於）其師，其修其言，法其行，力

（註）見呂氏春秋慎大篇，又淮南子道應篇「孔子動約國門之關」，同主稱謂「孔子力推城關」。

不足，管弗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僎士而可以歸矣」。

我們真應該感謝墨子或其後學，有他們這樣充滿敵意的敘述和批評，不僅表明了孔子的真面目，而且也坦露了墨子的心跡。一句話歸總：孔子是祖德亂，而墨子是反對亂黨的人！這不是把兩人的根本立場和所以對立的原故，表示得非常明白嗎？

亂黨是什麼呢？在當時那裏算是比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興勢力。陳成子以大量貸出而以小量收回，因而把齊國公室的人民盡數奪取去了，這是有名的故事。季孫氏在魯也有類似的情形，他賄賂下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韓非外儲說左下）。就拿白公勝來說吧，令尹子西分明稱讚他「信而好勇，不為不利」。就是反對他的葉公也只說他「好復言而求勇士，殆有私乎」？如此而已。「好復言」顯然是說話算數的意思，其實也就是「信」了。他作亂的一年也就是孔子死的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左傳把那時的情形敘述得相當詳細。他在七月獲罪，把令尹子西和司馬子期都殺了，同時也把蒍蕩捉着了。石乞勸他殺掉楚王，他不肯；勸他焚府庫，他也不肯。結果蕩被人盜去，蒍蕩為葉公所用，他竟一敗塗地，「奔山而殺」了。關於蒍蕩的一節，呂覽分應篇有更詳細的敘述，今揭之如次：

「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蕩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資我。』白公又不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與衆，出高車之兵以賦民，因

及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註)

據這故事看來，白公這個人實在還太忠厚了一點。石乞倒確是一位好漢。白公死後，他被人生擒，人們要他說出白公的死所，當然是準備處屍，石乞不肯說。不說便要烹他，他也不說。結果是被人烹了。他倒確是一位智勇兼備的人。假使他真是出於孔子的推荐，孔子不要算是很有知人之明的嗎？

以下我們再把孔門弟子幫助亂臣賊子的罪狀追究一下吧。

第一，「子貢季路輔孔懷亂乎衛」。

這是魯哀公十五年的事，孔子死在魯國一年。那時候的衛君蒧，是蒧的兒子。蒧公不贊蒧朝政，把他趕出國外去了。死後蒧立了他的孫子蒧爲衛君，在位都已經十二年。蒧朝政用蒧謀回到國來，越蒧蒧孔懷，奪取了蒧兒子的君位。蒧將在蒧朝家臣，他因爲反對蒧朝政，蒧朝政的人把他砍死了。蒧家把他的尸首也煮熟了肉醬。消息傳來的時候，據說孔子正在吃肉吃，他連呼「天殺子！天殺子！」(據齊新也)，對人把他的肉也倒了。這事，在蒧子後學都在加以

(註) 荀子很崇拜蒧公。非但前「襄公子高微小短布，行若將不勝其次。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旗皆死焉。蒧公子高入城楚，蒧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蒧家對荀子，已經早把立場改變了。

非難，盜跖厲云「子路欲殺無道而不殺，身道于無道門之上」。可見儒家和道家是同情則敬，而無道是同情而敬的。這在我們倒也是無可如何的常情，但想說「吾雖補孔德亂平德」或「欲殺無道」指無道言（如事不成），不敵和當時的情形不甚相符，而且這有顯顯似於贖尸費裏的。

關於子貢的參加，左傳和史記事實均不曾言及，但除這「罪無辜」之外，更難論的朱熹說「子貢子貢」。子路狂狷，孔德作亂，不能救活出亡，身道于術。子貢，子奉（蓋）道也。不能死「無辜」。這雖說或別有別本，大約在當時，子貢在術也是難在有什麼難守的把。

第二、「相與親乎？」

陽貨一公陽虎，這人在孔門弟子是沒有把他當成孔門看特的，而且也把他說得沒趣。但其實則是一會了不起的人物。孟子離文公篇引陽虎曰「魯首不仁矣，為仁不遠矣」，真不夫為千古姓名。這話在劉勰引此二語作爲「陽子曰」，因此有人認爲陽貨即陽朱（宋翔鳳「陽貨說義」中書此說）。但在後漢來，無事是陽朱的兄弟楊布。韓非說林干云：「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處，文謂，楊素衣，衣素衣而處，其物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勿擊也。子寧聽是。幾矣！彼汝狗白而狂，黑而索，子豈能毋怪哉？」這兩弟兄的性情一般一般，頗有能與來時時應付道與程伊川。古書有與虎同群，而有與龍爲用，與虎同群，是則亦與龍一也。此是陽虎守了。以時代說來沒有什麼困難，性格也還相符。

陽虎本作亂於魯，左傳定公八年及九年敘其事。八年冬十月，陽虎欲去三桓，入於薛陽關以叛。翌年六月伐陽關，陽虎出奔齊。他到齊國，請齊國出兵伐魯，齊景公都打算答應他了，鮑文子以爲不可。鮑文子說他「親而不朝仁」，又說齊侯富於季孫，齊國大於魯國，正是陽虎所想「傾覆」的。於是齊侯便聽了他的話，把陽虎囚禁了起來。他逃了兩次，終竟逃到了晉國，投奔趙氏。左傳在這兒加了一句孔子的批評：「趙氏其有亂乎！」這意思當然是很不滿意於陽虎了。

以上是節取左傳的敘述，照樣情形看來，陽虎無「亂乎齊」的痕跡，因而孔叢子詰屈篇便引作「亂乎魯」，孫詒讓以爲「當從孔叢作魯」。然在韓非「外儲說左下」有下列一段關於陽虎去齊走趙的故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于善樹人。」

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若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

據此，可見陽虎居齊，爲時頗久；而他之去齊是因爲「得罪」，則「亂乎齊」似乎也是事實，只這事實的真相是怎樣，不可轉而知了。唯韓非「難四篇」亦言齊景公囚陽虎事，則與左傳所述相同，誠者是陳明真相的吧。

此外同一外僑說在下簡，還有批評陽虎的一節：

「陽虎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姿而獻（獻）之』。遂於齊，發於齊，遂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

左古曰：「虎嘗新人國政，何故相也？」

簡主曰：「陽虎誘取之，我誘守之」。遂就簡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尊事簡主，與衆之，遂至於霸也。」

這批評可以算得公允。「與主之強，幾至於霸」，和左傳的「趙氏其有亂乎」完全相反，仲尼的那句評語不是七千幾學的蛇足，使可能是劉歆弄的花樣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又一可寶貴的三句「陽虎臨」——「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姿而獻之」。這確實是含有些革命的精神在裡面的。這種精神不失爲初期儒家本色，例如孟子也說過這樣的話：「君有過則諫，反復而不聽則易位」，和這兩句陽虎的主張是相彷彿的。

第三，「佛胎以中車叛」。

佛胎是魯國范氏的家臣，他以中車叛，大約是在齊襄公五年。左傳在此年夏，曾「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趙鞅中車」。趙氏與范氏敵對，因衛助范氏故伐衛，因中車叛故圍中車也。關於這事，論衡齊俗有記錄：

「佛辟召，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問諸夫人曰：『欲於其身爲不替者，君子不入也。佛辟以中車辟，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嘗將瓜也，使子渴而飲，而子不食？」

佛辟要我老師去幫忙，老師也真想借這個機會去行道？「我難道是個夜叉明眼麼？只能看著做罷，不能吃的麼？」對於想用世的心境，真是吐露得淋漓盡致。這談和履亂氣的行徑，「君子將過不大高張的，公然進過了人家後學的裝飾而收在了論語裡面，實在其值得參與的事。而且同在「陽貨篇」裡新還有公山弗擾的一節：

「公山弗擾以陽貨召，子欲往。」

子路不說（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左傳作公山不狃，以費辟專橫於定公十二年，然在孔子世家則繫於定公九年陽虎奔齊之後。參見與陽虎同爲。陽虎以定公八年「入陽陽闕以叛」，公山當亦同時響應，其定公十二年之畔，蓋定而復反者也。定公十二年時孔子正爲魯司寇，則召孔子事當在八年。此事雖記於論語，而「非徒

黨」不及，蓋因公山氏非孔門弟子之故。

第四，「漆雕開」。

孔叢子結語篇引作「漆雕開形殘」，形與刑通。漆雕之爲漆雕開，殆無疑問。唯因何而「刑殘」，事無可考。韓非子論學篇儒家人獄中有「漆雕氏之儒」，又言「漆雕之譏，不色撻，不目送，行曲則違於威讓，行直則怒於詰侯」，雖同一有性而無名，亦當是漆雕開。王充論衡本性篇，言漆雕開言「人性有善有惡」，與宓子綰，公孫尼子，世稱諸儒同，可見漆雕開確會成一學派。漢書藝文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三篇」，班固注云「孔子弟子漆雕啓後」，啓即是開，因避漢景帝諱而改。後乃衍文。蓋啓字原作啓，抄者於字旁注以啓字，及啓列入正文，而啓則誤認爲啓，再轉爲後也。這一學派既尚勇任氣，遊視權威，自然是有遭受「刑殘」的充分的可能。且此學，既與子路亂術，陽貨亂齊，佛辟時弊並列，必然也是所謂叛亂事件，那是毫無疑問的。

尤可注意的，初期儒家裡面也有這樣一個近於任俠的別派。近時學者，每以爲俠出於墨，或認即是俠，有此一事也就是強有力的一側反証。任俠之概死雖有類於墨氏的「赴火蹈刀」，但他們的反抗權威卻和墨家的「尙同」根本相反，我們是須得注意的。

又孟子書中，言「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撻，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于褐寬博，亦不受于流潦之石。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所避也，惡聲至，必反之」。這

對漆雕氏之講很相近。孟子又說，「北宮黶似于夏」，大約這位北黶也就是漆雕氏的後嗣了。

以上，孔子贊助亂黨，與其門人子弟幫助亂黨之例，見於「非禮篇」者一共七項。這些既「一列舉出來加以非難，在亂黨自己當然決不會照着這樣做的了。這不過很鮮明地表示着儒道兩派的基本立場罷了。至少在初期，這種情形，是無可否認的。所描舉的事實雖然不盡可辨，而「非禮篇」也不必於是墨子所寫下來的文字，然把兩派的立場實在地畫出了極其鮮明的輪廓。以前描寫孔子的人，因為孔子已經成爲了「大誠至愛」，對於這些材料一概視爲虛構，全不加以考慮。現今推崇墨子的人，把墨派幾乎成爲了不可侵犯的國籍，對於這些材料又一概視爲痛快，也全不加以考慮。這些態度，我認爲都是有所蒙蔽，非把這些證據丟掉，我們是得不到正確的認識的。

自漢武帝崇儒術創百家以來，孔子驟然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但在他的生前其實是並不怎麼得意的。莊子甚至罵他「再逐於魯，削跡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之者無罪，刑之者無禁」，呂覽慎人篇亦有此說，在說「刑戮辱也」，足見孔子在當時，至少有一個時期，任何人都可以殺他，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他的。這和亡命的暴徒有何區別呢？因此，我們要說孔子的立場是順乎時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而墨子則和他們相反，這在孔門後學或許會說寬處，而在墨家後學是應該沒有什麼話好說的。

倘若要說鬼神，還可能性極大。就是孔子在生當時，他的門徒已經在替他粉飾了。論語鄉面

有左道「假蓋事，值得我們發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子與蓋死於椁之手也。無卒死於「三子之手乎！且子從（椁）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

這個故事不難表示了孔子的態度，也把過渡時代的當時的時代性，表示得很清楚。但是奴隸。在奴隸制時，主人死了糾結大多數是要殉葬的，即使不夠葬禮必然有一些特殊的行動。孔子生了病，子路以爲會死，故網把門人們來假裝成奴隸。這在子路或許是沿守舊制，想替孔子抄擇門則也，也就和現今都還在燒紙人紙馬那樣，然而竟惹得孔老夫子那裏生氣，那裏憤慨，不啻痛罵子路，而且還賭咒發誓，寧願「死於道路」。

我順便要在這兒解釋一下「門人」和「弟子」之類的名眼。這是春秋末年的新名稱。當時沿守舊制的，有稱也稱爲「徒」，稱爲「徒」。門人服侍先生，和奴隸的情形差不多，不過是志願性，而非強制性而已。「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饒」。先生出門的時候，弟子要「僕」（即是駕車夫），要伴從衛。但究竟不是徒，不是役，年輕長者先生視之如弟，精幼者視之如子，因而有「弟子」之名。保留的「子路」，似乎不懂得孔子正以有「三子」爲新時代的光榮，而假借要使同學們退回前舊時代的監死鎖去，竟於之了那麼一個臭罵，那是罪有應得的。

但在子路或許還是出於無心，而在孔子死後，有心的粉飾更是層出不窮了。所謂「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至少在這些方面是沒有什麼誇張的。一方面有墨家和道家的攻擊，另一方面以前的「竊幽者」已翻「為探侯」了，亂黨同情者的情于是不好久藏的，故而在轉瞬裡面也就有「陳恆弑其君討之」的完全相反的記事，也更有一「天下有道則亂不傷大夫，天下無道則庶人不議」之類的有違無違的放言。老腐固然是矛盾，但我們與其相信神道碑上的謬詞，寧相信墨家小說上的謬詞。到了孟子手裡粉飾工作更加徹底了，如「孔子治衛志難進，於齊主魯人疥癩」，大有不獨木而摧的情況，也被斥為「好事者為之」，而另外說出了所主的兩位聖人轉來。到底那一種說法逐漸事實，固無從判斷，但孟子是慣會宣傳的人，他的話與打些折扣才行的。墨家所說的「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那也就是一個最適當的例。「春秋」說辭真是孔子所作的書呢，但那樣簡單的傳忘錄，在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當中脫下了「秋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則其說足以使「亂臣賊子懼」，無寧是足以使暴君污吏懼的。

二 孔子的思想體系

孔子的基本立場既適應當時的社會變革的潮流的，因而他的思想和言論也就可以獲得清

算的標準。大體上他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他很想像極端利用文化的力量來增進人民的幸福。對於過去的文化於部分地整理接受之外，也部分地批判改造，企圖建立一個新的體系來以爲新來的封建社會的紐帶。這種平康着墨所傳道的「託古改制」的說法確實地打破了當時的事實。

一、「仁」字最發顯，還可以說是他的思想體系的核心。

「仁」字是春秋時代的新名詞，我們在春秋以前的真正的古書裏面找不出這個字，在金文和甲骨文裏面也找不出這個字。這個字不必是孔子所創造，但他特別強調了它是事實。仁的內涵究竟是什麼呢？雖然沒有一個明確的界說，我們且在論語裡刪去我感一些可供研究的資料。

一、「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二、「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三、「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四、「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五、「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六、「爾愛木訥近仁」。

七、「巧言令色鮮矣仁」。

八、「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

九、「仁者先難而後獲」。

從這些辭句裡面可以看出仁的含義是克己而爲人的一種利他的行爲。簡單一句話，就是「仁者愛人」。但古時候所用的「人」字並沒有我們現在所用的這樣廣泛。「人」是人民大眾，「愛人」爲仁，也就是「親親而仁民」的「仁民」的意思了。「巧言令色」是對付上層的爾虞，爾上必做下，故他說「鮮矣仁」。「巧言令色」之反即爲「爾敦木訥」，對於上層能如此，對於下層也不過如此，所以他說「近仁」。因此我們如更具體一點說，他的「仁道」實在是爲大衆的行爲。

總要人們除掉一切自私自利的心機，而養成爲大衆獻身的犧牲精神。所謂言動都適合乎禮（就是「復禮」，復舊返也）。禮是什麼？是一個時代裡面所有的維持社會生活的各種規律，這是每個人應該遵守的東西，各個人要在這些規律之下，要使自己不要放棄自己去侵犯別人，更進一步是犧牲自己以增進衆人的幸福。要這樣社會才能夠保持安寧而且進展。要自己站得穩吧，先要讓大眾站得穩，要讓自己成功吧，先要讓大眾成功。這是相當高度的人道主義，要想辦到這樣

的確不容易，所以說「爲之難」。他也這樣嘆息過：「我還沒有看見過從心坎裡喜歡仁的人，也沒有看見過從心坎裡恨不仁的人。……只要有人能夠有一天把自己的力量用在仁的身上，我還不相信有什麼力量不夠的事情。從心坎裡歡喜仁的人，從心坎裡恨不仁的人或許有的吧，但我還沒有看見過」。這也許是他有所憤激的時候說的話吧：因為在他的門徒裡面有一位顏淵，便是「其心三月不違仁」的人。三個月不改變仁者的心腸或許還短了一點，「其它的人更只是偶爾仁一下而已」。孔子的理想，是要「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儘管是怎樣的流離困苦，變起倉卒，都不應該有一頓飯的時刻離開了爲大眾獻身的心。這是要自己去求的，自己去做的，並不是高喊人運主義而希望別人給我些什麼恩惠。這也並不在遠處，就在自己的身邊，也就在自己的身上。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伯夷叔齊求仁得仁」。

仁既是犧牲自己以爲大眾服務的精神，這應該是所謂至善，故所以說「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只要你存心犧牲自己以維護大眾，那就幹什麼事情都是好的。你既存心犧牲自己，不惜「殺身成仁」，那還有什麼可怕的呢？又那還有什麼不能敢作敢爲的呢？在這點點合說是先生在

庸也不說和他推應，他不做，我也想做。故所以他說：「仁者不憂」，「仁者必有勇」，「當仁不讓於陣」。

但是仁是有等次的，說得太難了，誰也不會做，故教人以「能近取譬」。或者教人夫和仁人「道慢慢地滲染，這就叫作『親仁』，也就是所謂『里仁爲美』。人對於自己的父母誰都會愛的，對於自己的兒女也誰都會愛的。但這不夠，不能就說是仁，還得逐漸推廣出去，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假使推廣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你是確實確實有東西給民衆而把他們救了。那可說是仁的極點，他使窮之爲『聖』了。他因爲窮拜便是比較接近於這種理想的人格。

孔子曾說「吾道一以貫之」，但他自己不曾說出這所謂「一」究竟是什麼。曾子給他解釋爲「忠恕」，是不是孔子的原意無從判定。但照比較可信的孔子的一些言論看來，這所謂「一」應該就是仁了。不過如把「忠恕」作爲仁的內涵來看，也是可以說得過去的。這兩個字和「忠寬信厚」也沒有什麼抵觸。恭與信就是忠，是克己復禮的事。寬與厚就是恕，是推己及人的事。誠是有所不讓，行之無倦的事。

這種由內及外，由己及人的人道主義的過程，應該就是孔子所堅持的一貫之道。他在別的場合論到君子上來的時候，是說「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所說的說

是這一頁的主腦了。「修己以敬」是「克己復禮」。「以成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安百姓」是「博施於民而能濟眾」。故國他說「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病諸」，也和「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堯舜其病諸」是一樣的意思了。

這種所謂仁道，很顯然是順應着救世解放的潮流的。這也就是人的發現。每一個人要把自己當成人，也要把他人當成人，無事是先把他人當成人，然後自己才能成爲人。不管你是在上者也好，在下者也好，都是一樣。但要做這一步，做到這一步的極致，很要緊的還是學。人是有非學的本質的，不僅在這義上應該去學仁，就是在技藝上也應該去學要怎樣才可以達到仁的目的。立人立己，這人達己，不是專憑願望便可以成功的事情。因而他又強調學。

究竟學些什麼呢？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應該都在所學的範圍之內，而他所尤其注意的似乎就是歷史，看他自己說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蓋如雲，陳列於前，則吾亦知時矣」。可見他是特別注重古代的遺產。他對古禮古樂特別注重，對於理想化了的古代人物堯舜禹湯文武尤其周公，特別心醉，這就是他的歷史的人文主義的表現了。

但除「好古」之外，還有一種求學的法門便是「好問」。「就有道而正焉」，「不恥下問」，便是這一法門的指示。故國他說：「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已矣」，而他自己也是「入太廟每事問」，「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大概在一定的範圍內，什麼事都可以學，什麼人都是

以問。這一定的範圍既有道德的屬性和政治的屬性，這差不多是先秦諸子的通有現象，嚴格地說來，先秦諸子可以說都是一些政治思想家。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通性呢？那是因為爲士的階層所限制的緣故，士候本都是一些候補官吏。所謂「學而優則仕」，「舉古入官」，倒不限於儒者，就是墨法名道諸家都是一樣。「士者所以爲輔相承（承）嗣（司）者也」（尚書上），這是墨子的士觀。「士生乎鄉野，推選則祿爵」（齊策），這是道家類國的士觀。可知學爲士就是學爲官，而不是學爲農，學爲工，學爲商。工商之能成其爲事，又是資本主義社會成立以後的事了。但在這學爲官的範圍內，「夫子」倒的確是「選不舉，而又何嘗得之有」的。

在這個範圍以外那就成問題了。樊遲問學說，他說「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他說「吾不如老圃」。農爲他所不會學，也爲士所不必學，故接着他譏斥實樊遲爲「小人」。他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於矣，焉用稼？」問農沒有答出，卻來這麼一塞不相干的政治理論，顯然樊遲的問是逸出了士學的範圍了。墨子也和這是一樣，他說過：「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一婦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不若循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雖不耕而食飯，不織而衣裳，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魯問篇）。這是當時爲士者的通識。和這不同的就只有一些黜畝之士，和後起的一部分儒家而已。但辨出發點是離現實的距離主統，我們是須得注意的。

工藝似乎學過。孔子自己說：「吾少也賤，故多能。舉事，君子多夫哉，不多也」。又說「吾不試，故藝」（試是淺嘗之意）。這些藝能，大約不是指射御之類罷，射御是君子所必學的，不能視為鄙事或賤藝。

商是不會舉過的，但是爲士者所不應該學的。子貢會經商，他說他「不交命而貨殖」，而他自己「罕言利」，又說「噫於利」的是小人。

他是文士，關於軍事也沒有舉過。陳賡公問陣，他說：「桓桓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舉也」，接着便提起車于趙了。不過他也並不知舊式注家所擬議的那樣看不起軍旅之事。爲政之道，他既主張先「足食足兵」，又還說過：「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晉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取」那類的話。軍事的學習雖也是士的分內事，只是他對於這方面沒有充分地研究過而已。

他爲人爲學倒很能實事求是，主張「知之爲之，不知爲不知」，主張「多聞缺疑，多見缺殆」——可貴的，弄不清的，不肯亂說。又說「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次第）也」，可見他是很能够注重客觀觀察的。「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這個經驗之談很有價值，可見他是反對以想那種唯心的思維方法的。但他也並不反對主觀，一味的成爲機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必須主觀與客觀交互印證，以檢出一條爲人爲己的道理，然後他才滿足。

然而時代誤測了他，他肯定人類中有「生而知之」的天才，他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因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首），斯爲下矣」。又說「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移的下愚，我們能够承認其存在，如早發性癡呆症，那的確是沒有辦法的。生而知之的上智，卻完全是莫須有的幻想。不過，好在他自己還不曾自認是生而知之的人。他自己的確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故他所強調的還是「學而知之，因而學之」的步驟，他自己的要求是到了「寤震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程度的，他教人好學也要「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又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未足謂也」。他的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違矩的那個階梯，也表示着他一生都在困學敏求當中過活。

他注重歷史，因而也注重根據。「怪力」，「鬼神」之類的東西他是不談的。要考證夏禮殷禮，他雖在夏後的杞國和殷後的宋國都無可徵考，因爲「文獻不足」。儒家的典籍當中，詩經大約是由他開始蒐集約吧。他已經屢次說到「詩三百」的話下來，又會提到雅和頌。這一部最早的古詩總集裡面，夏詩自不用說，就連殷詩也一篇都沒有。商頌是宋襄公時正考父所作的東西。書經的情形稍微不同。這部書雖然也在他所「雅言」之例，但他很少徵引。大約在他當時並不會蒐集到好多篇筆吧。他把詩經看得特別重要，看來似乎是他所使用的極重要的一部教材。「興於詩

，立於禮，成於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不學詩無以貫，不學禮無以立」，可見他是特別注重詩歌，也就是情緒教育的。學詩不僅可以增廣知識，「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且可以從政，可以做外交官，據說都能因此而做得恰到好處。這自然是由於詩歌有民間疾苦，有各國風習，有史事記載，也有政治哲理的原故吧。把好多優美的古詩替我們保留下來，單只這一點，應該也可以說是孔子的功績。

詩與樂是聯帶着的，孔子也特別注重音樂。他自己喜歡彈琴，喜歡鼓瑟，喜歡唱歌。「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可見他學唱歌是怎樣的用心。「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可見他對於音樂又是怎樣的陶醉。他把音樂不僅視為自我修養，和對於門人弟子的情緒教育的工具，而且把它的功用擴大起來，成爲了治國平天下的要政。這是「興民倍業」的意思，便是把奴隸時代的貴族們所專擅的東西，加推廣開來使人民也能共同享受。這一點不僅表示了這位先賢者充分地了解藝術價值，而且也圓融地表示了他所代表着的時代精神。不過時代也依然限制了他，他所重視的樂是古代的傳統，也就是古樂。他說「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雖不必是舜樂，「武」也不必作於周成王，但總之總是古樂，當時和這古樂對待的已經有新管絃起來，便是所謂「鄭聲」，這新音樂都爲他所不喜歡，他斥之爲「淫」。鄭聲和鄭武，我們都看不見了，無從來加以發掘，但據我們的歷史經驗，大凡一種新音樂總比舊音樂的調子

高，而在集樂器樂技上也照例是進步的，故稱所謂「鄭聲淫」的「淫」應該是過高的意思，決不是如像「毛毛雨」之類的那種所謂靡靡之音，倒是可以斷言的。

禮，不用說也是學的重要的對象，禮，大言之，便是一朝一代的典章制度；小言之，便是一族一姓的良風美俗。這是從時代的積累所選擇下來的人文進化的軌迹。故有所謂夏禮，殷禮，周禮。但所謂夏禮殷禮都已文獻無徵，「無徵不信」，故他所重視的是「郁郁乎文哉」的周禮。他特別崇拜周公，以「久矣不復夢見周公」爲他衰了的敬候而嘆息。其實亂做夢倒是衰弱的徵候，他的晚年之所以「不復夢見周公」，倒是證明他已經超過了周公的水準，不再在周公制禮作樂的那種思想範圍整頓了。周公在周初固是一位傑出的人物，特別在政治上，但要說所有一切的周禮都是周公制的，那已經成爲狂妄之談了。

禮是後起的字，在金文裡面我們偶爾看見有用豐字的，從字的結構上來說，是在一個器皿裡面盛兩車玉具以奉仕於神，整庚爲禮而所說的「具乃玉」，就是這個意思。大概禮之起點於祀神，故其字後來從示，其後擴展而爲對人，更其後擴展而爲吉凶軍喪嘉的各種儀制。這都是時代進展的成果。愈是後進，禮制便愈見活潑，這是人文進化的必然的趨勢，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可以把它呼喚得出來，也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把它叱咤回去的。周公在周初時曾經有過一段接受殷禮而加以斟酌損益的功勞，纔是不可抹殺的事實，但在孔子當時的所謂周禮又已經比周公時代更進

孔子，雖然說着禮為更進形式化了，但就在形式上也還是更加進步了的。田疇，耕制，軍制，官制，一切都在禮的時代改變，沒有理由能說這一切的發展全是一成不變的東西。孔子在春秋末年強調禮制，可以說剛點來此例他，一層在禮的形式中吹進了一層新的精神，二層是把「不下塚人」的東西下到塚人來了，至少在精神方面。「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他並沒有專重鐘鼓玉帛等禮樂的外形。「人而不仁，雖百工，人而不仁，如樂何」，他更把仁道的新精神灌注在禮形式裏面去了。

「禮與其者也，喪與其易（治）也事也。」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先施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則之，則吾從先進。」

禮是表現他的進步精神。野人就是漢夫，他們所行的禮和樂雖然是非常繁複，然而極端禮，把精神灌注上去，把形式普及下來，重文兼重質，使得文質彬彬，不野不史（「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那個是他所懷抱的理想地。這應該也就是他的禮樂並重的根據了，禮偏於文，樂近於質，他把這兩者交織起來，以作為人類政治生活的韜帶，這正是他的政治理想的一個特色，我們是不能否認的。「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兵無所錯乎足」，他把人文主義是推到了極端了。

不過就在禮這一方面，時代也依然限制了他。他在形式上轉回注重古制，就和他在那裏的方面注重韶武而要「放鄭聲」的一樣，有好些當時的世俗新禮，他就看不慣。他與「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行夏之時』，在禮義生產上大概有它的必要，『殷輅』是否特別舒服，『周冕』是否特別美觀，我們就無從判定了。據我從卜辭裏面的發現，知道殷王所乘的輅車是駕兩匹馬的，比起周人的駟馬來怕不怎麼舒服吧。關於冕制，似乎他也還能夠從禮，且看他說：『麻冕禮也，今也純（絲），儉，吾從衆』。但這『從衆』的精神可惜他沒有可能貫徹到底，他有時侯却又不肯『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遠衆，吾從下』。這就表示得很鮮明，他一隻腳跨在時代的前頭，一隻腳又是吊在時代的後面的。『拜下』是拜於堂下，受拜者坐於堂上，拜者『入門立中庭北向』而拜，這種儀式，我們在四周的金文裡面可以找到無數例，還是奴隸制下的禮節。等時代起了變革，階層上下甚至生出了對立，於是拜者與受拜者便至分庭抗禮，這也正是時代使然。衆人都上堂拜，而孔子先生偏要『遠衆從下』，很明顯地是在鬧獨事。從此可以見得他對於禮，一方面在復古，一方面也在維新。所謂『對的損益』的事情大概是有的，儘管他在說『述而不作』，但如三年之喪便是他所作出來的東西，是不其傑作是另外一個問題，他自己的門徒弟子已經就懷疑過不是傑作了。

在主觀方面強調禮學，在客觀方面便強調教。教與學本來是士的兩翼，他是士的大師當然不能

離開學校。他有有名的庶富教的三步驟論，是他到衙門去的時候，再派差役帶車，他在取上看見衙門的老百姓很多，便請喚了一聲：「庶矣哉！」——人真多呀。再行就問：「庶，又怎麼辦？」——他答道：「富之！」——要使他們豐衣足食。再行又問：「已經豐衣足食了，又怎麼辦？」他又回答道：「教之！」——好生展開文化方面的工作去教育他們。究竟教些什麼呢？可惜他沒有說。不過他是承認老百姓該受教的，這和奴隸時代只有貴君子弟才能享受教育的權利，已經完全不同。他是仁道的宣傳者，所學的是那一套，所教的也當然是那一套。文行忠信是他的四教，他的門徒是分爲四科的：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教和四科大概是相印合的罷，總不外是授書講義和所以行時書禮樂的精神條件。他本人確實是一位很好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方法並不是機械式的，他能夠「因材施教」。他也不分貧富，不擇對象，他是「有教無類」。當然，他並不是毫無條件，只要有「十小條乾肉」（束脩）送去，他就可以教了——「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教焉」。這也是教書匠的買賣不得不然，假如連「十小條乾肉」都沒有，教書匠怎麼吃什麼過活呢？

爲政維要教民，這是一個基本原則。「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使戰」，「暴虎馮河無所，則戰」。這和後起的國家法家的愚民政策是根本不同的，這點我們應該要把握着。因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那兩句話，近人多引爲孔子主張愚民政策的根據的

，那却是值得商榷了。一個人的思想運動本來是有發展性的，不得因循守舊，無從開辦一個人的思想上的歸宿。周秦諸子的書中都有時常自相矛盾的地方，我們對於無法知道這些言論之孰先孰後。孔子若說爲「德之時」的，是能因時而變的人。莊子也說：「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長卒而非之，未知今所謂是之五十九年非也」（寓言篇）。他的晚年定論我們實在也無從知道。『論語』這部書是孔門二三弟子或再傳弟子的纂輯，發言的先後次第尤其混淆了，不能不說是一件遺憾。但要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爲愚民政策，不循和他「教民」的基本原則不符，而在文字本身的解釋上也是有問題的，「可」和「不可」本有兩種意義，一是應該不應該，二是能够不能够。假如原意是應該不應該，那便是愚民政策。假使僅是能够不能够，那只是一個事實問題。人民在奴隸制時代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對於普通的事都只能照樣做而不能明其所以然，高級的事理自不用說了。原語的涵義，無疑是指後者，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意思。舊時的註家也多採取這種解釋。這是比較妥當的。孟子有幾句話也恰好是這兩句話的解釋：「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理者衆也」。就因爲有這樣的事實，故對於人民便發生出兩種政治態度：一種是以不能知爲正好，便是閉塞民智；另一種是要使他們能够知才行，便是開發民智，孔子的態度無疑是屬於後者。

孔子在大體上是一位很實際的主張人文主義的人，他不大馳騁幻想，凡事都懇切踏實地去做

• 他坐在那變化劇烈的時代，舊名與新實不符，新名亦未能建立，故他對子孫問政主張先要「正名」，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財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所正的「名」既與「言」為類，正是後起的名稱之名，而不限於所謂名分。要「正名」也就如我們現在小之擬定學名譯名，大之擬統一語言文字或全國拉丁化那樣，在一個社會中，大變革的時代的確是很重要的事，可惜他的關於如何去「正名」的步驟卻絲毫也沒有留下。

他生在大變革的時代，國內國外兼併無常，征伐時有，故他對子孫問政，主張「足食足兵」，他並不是空口講胸臆的空想家，而在時成樂作之前是要有一番基本工作的。「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要三十年之後才有仁政出現，則三十年間的基本工作，照邏輯上說來，也儘不妨有些地方顯微乎不仁。「善人處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他聲言「誠哉是言」，不知道是他的前輩的那一位所說的話，這仁政成功的期間是說得更久遠，要費三個三十年以上了。這較年限並不一定有教學教的準確，但足以證明他並不是不願實際的殺靖主義者，儘管他在說「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私且格」，但也沒有忘記「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勉）而無恥」的。

他的從政者的步驟，有「尊五美，屏四惡」的信條。五美中的一美「因民之利而利之」是最值得重視的。四惡的「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過之與人也出納之

吾讀之有司」(有司二字疑有誤)，也的確都是值得屏棄的惡政。因之它們的反面便是要先教先戒，備守法令，惠與不吝了。該給人民的，不能不給人民，只要是為人民謀幸福的，不能吝吝而不與。雖然也主張「節用」，「道(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但這節用是有條件的，便是以愛人為條件。這只是在消極方面限制為政者的奢侈，而非節省必要的政略施設使人民不得康樂。故「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不過在實際上他是患貧也患不安，患寡也患不均的，看他積極地主張「庶矣富之，富矣教之」，而強調「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也就可以明瞭了。

離開實際的政治之外，還有一種理論的主張，便是「祖述堯舜」。堯舜的存在，除據尚書裡面的所謂虞書夏書之外，是很渺茫的。在可靠的殷周文獻裡面沒有提到他們，在甲骨文和金文裡面也沒有提到。甲骨文中雖有「高祖夔」，經王國維考証，認為是殷人的祖先帝舜，但從山海經，國語等所保存的神話傳說上看來，帝舜和帝舜並不是兩人，而且他們都是神。孔子是特別稱道堯舜的，但孔門之外，如墨家法家道家陰陽家甚至如南方的楚辭部一樣稱述堯舜，雖然批判的態度不盡相同。堯舜的故事很顯然是古代的禱語，是先民口傳的真正的傳說，在春秋時被著諸竹帛，因而也就逐漸被信史化了。

孔子的稱道堯舜，單就「論語」來說，有九列數項：

「大哉堯之爲君也，臨萬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雖說很簡單，但毫無疑問是把禪讓傳統包含在內的。他之所以知道禪讓，事實上也就是聽歌謠，歌謠歌頌堯與舜，讓歌對主體說了。

堯舜禪讓雖是傳說，但也有確實的史影，那就是原始公社時的族羣傳承的反映。隨着羣體之爲「天下爲公」的時代，充分地把這個階級烏托邦化了，因而成爲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期。這歌謠，是值得我們討論的。明顯地是對於奴隸制時代的君主繼承權，即父子相承的家天下制，表示不滿，故生出了對於古代原始公社的憧憬。作爲理想，假使能辦得到，最好是恢復古代的禪讓，讓賢者與能者來處理天下的事務。假使辦不到，那職退一步，也要如「舜禹之有天下而與焉，恭己正南面」，做天子的人不要管事，讓賢者能者來管事。這動機，在當時是有充分的進步性的，無疑，孔子便是他的發動者。

聽清了孔子的歌謠禪讓，也才能够正視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個提示。那是說君與臣聽好聽好的君，臣要如舜禹那樣的臣，父也要如堯舜那樣的父（不以天下傳子），子也要如舜

萬那樣的子（「幹父之憂」）。齊景公不曉得他的深意，照舊傳統的奴隸社會的觀念講下去，便爲「信如君不計，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只顧到自己要飯吃，沒有顧到老百姓也要吃飯。但這責任不能歸孔子來負。

孔子倒是否認地上的王權的。這與其說他的特出的主張，無寧是社會的如實的反映，當時的王權基本上是式微了，就是各國的諸侯事實上已多爲卿大夫所挾制，而卿大夫又逐漸爲陪臣所凌駕，大奴隸主時代的權威已經是被社會否認了。孔子想制作一個「東周」，並不是想把西周舊制復興，而是想實現他的烏托邦——唐虞盛世。

地上的王權既被否認，天上的神權當然也被否認。中國自奴隸社會成立以來，地上王的影子投射到天上，成爲唯一神的上帝，率領百神眾鬼，統制着全宇宙。但到西周末年，隨着奴隸制的動搖，上帝也就動搖了下來。詩經中沒落貴族們埋怨上帝的時不計其數。春秋年間，王者既若有若無，實若虛，上帝也是有若無，實若虛的。妖由人興，卜筮不靈了。一般執政者對於上帝，是在習慣上奉行故事地承認着，而內心的認識倒可用子產的一句話來統括，便是「天道遠，人道邇，不相及也」。天使他去天吧，我却要管我的人事。

孔子對於天的看法反映了這種社會的動蕩。無疑地，他是把天或上帝否認了的，只看他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註）已知有受理行職的人格神上帝完全不同。

故在他心目中的天只是一種自然或自然界中流行變化的法。有的學友認為這種看法太深了，那末我們從反對學派的批評來看，便可以知道實在一點也不深。墨子所批評的「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第一政是「需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這所說的不正是孔子的態度嗎？

「子不語怪力亂神」。

「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但無論怎麼說，至少孔子總得是一位懷疑派，不幸他的實際家或政治家的趣味太濃厚，儘管否認鬼神或懷疑鬼神而他在形式上依然敬重着它們。這是他所謂智者的辦法，「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智）矣」。但這所謂「知」無疑並不是純粹的理智，而是世俗的聰明。

實際上比孔子更深的已經有鬼神存在，他不僅否認了上帝，並建立了一種本體說來代替了上帝，他是孔子的先輩，而且曾經做過孔子的先生，這最先秦諸子所一致承認着的？孔子自己也說「竊比於我老彭」，老彭是老聃了。有的朋友因「道無經」說出，遂並懷疑老聃的存在，或以為「竊比於我老彭」，老聃是老聃了。有的朋友因「道無經」說出，遂並懷疑老聃的存在，或以為「竊比於我老彭」，老聃是老聃了。這些都僅是形式邏輯的推論

（註）莊子知北遊篇有一節話，是這句話的擴張：「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而已。在春秋時代青島地對於上市無異，而在紛爭變併之中又顯現「一匡天下」的那種希望，正是產生老子本體觀的最好的園地。只是他的學說產生得早了些，不僅沒有等到思想界，就連孔子也還沒有可能接受它而已。這種舊形式的學說出現並不是希望的事。例如門德爾的遺傳律不是被達爾文的進化論所淹沒，而在發表後三十五年才被別人再發現了的嗎？（註）？老子的學說經過周敬之後，直到漢魏莊周又才得到充分的發展，並不是不可能的事。何況莊周之前還有宋鈞、彭蒙、彭蒙之類，以及陽朱等人存在呢？

孔子既否認鬼神，但有一個類似矛盾的現象，他却承認「命」。他把命運調得相當厲害，差不多和他所主張的仁，站在同等的地位。「子罕言利，與命與人」——他很少談利，但將道命，將道仁。他既說「仁者不憂」，又說「知命不憂」。既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又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命則仁在他的思想，雖然有同等的斤兩。命又稱為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他自己說「五十而知天命」。看來很像是一片神祕的宿命論（Fatalism）。但問題是他所說的命究竟是什麼，他既否認或懷疑人格神的存在，那嗎他所說的命不能被

（註）門德爾（Mendel）是奧國布呂恩市的僧正，從一八六六年發表其「植物交雜之實驗」，發現遺傳定律，但不為人所注意。直至一九〇〇年遺傳定律又由三位學者同時發現，門氏論文也才再被發現。中間相隔幾凡三十五年。

解釋為神定的宿命。他的行為是「事不厭，敬不倦」，「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其政的理想是「先之勞之」而益以「無倦」；一切都是主張身體力行，頗有積極進取的精神，也不像一位宿命論者。故我們對於他所說的命不能解釋為神所預定的宿命，而應該是自然界中的一種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有顯類似於前定，是人力所無可如何的，故他說：「道之將行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而對於這種必然性的克服，則是盡其在我，子夏所講的這幾句話：「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也就是這個意思。不因爲人必有死而貪生怕死，也不因爲富貴可羨慕而妄求富貴，故能以自足，善與人，愛人如弟兄骨肉，盡其在我，聽其自然。莊子秋水篇引孔子語「知命之有命，知命之有時，雖大難而不懼者盡人之壽也」，這或許是假託，但假託得恰合乎孔子的真意。這便是孔子的天命觀，分明是一種必然論（Necessitarianism），和宿命論是有區別的。

孔子的整個思想體系上我們可以看出，他在主觀的努力上是抱定一個仁，而在客觀的世道中是抱定一個命。在主觀的努力與客觀的世道相調適的時候，他是主張順應的。在主觀的努力與客觀的世道不相調適的時候，他是主張固守自己的。

「窮則好學，守死善道」。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不踐而實且貴，於我如浮雲」。

「君子驕以爲貴，驕以行之，遇以出之，信以成之」。

「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

他並不是低頭於命定而妥協者，看這些辭句也就可以明瞭了。他只差過一點沒有說明，便是「一切都在變，命也在變；人的努力可以毀棄舊命而創造新命。奴隸制時代的湯武能革命，使奴隸制崩潰了的人民也止在革命。孔子是生在這種革命潮流中的人，事實上他也正在參加着新必然性的創造的。他說他「五十而知天命」，或者也就是說他探索了五十年，到這時才自覺到了自然的趨勢所賦與他的新使命的罷。

三 墨子的思想體系

墨子在孔子稍後，作爲反對命題而出現。他們在基本立場上就有不同，因而在思想上也差不多立在完全相反的地位。

孔子否認傳統的鬼神，而墨子則堅決地肯定傳統的鬼神，這是有意志，有作爲，主宰自然界和人羣界的一切。

「我有天志，陰陽人必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員，曰：中者
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不可盡計，上觀諸侯，下說列士，其
於仁義大相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天志上）。

他的「天志」，即天老爺之意志，也就是「天下之明法」，是他的規矩。這正是墨子思想的一條
骨樑，也就如沒有規矩不能成其爲輪匠的一樣，抽掉了這條骨樑，墨子便不能成其爲墨子。

（老爺的存在是地上王的投影。大奴隸主成爲地上的統制者，發揮着無上的玉權，他爲鞏固
這王權，使它成爲「它布」，讓人不敢侵犯，除掉有形的賞罰以支配人的肉體之外，還要造出無
形的賞罰來支配人的精神。因而利用人民的愚昧，便把由奴隸造成的人世的金字塔，化而成爲由
神鬼造成的天界的金字塔。人王之下有百官衆庶，上帝之下有百神羣鬼。於是明明有斧鉞，幽則
有鬼神，王權便得到了雙重的保障。墨子在王權式微了的時代又來提倡「天志」，他這種顛覆無
論怎樣替他辯護，都不好說他不是復古，而是在革新的。

有的朋友說：「降至戰國時代七雄並峙，天子已降爲諸侯之附庸，因而在諸侯的心目中早已
沒有天或上帝了。但是在這一時代的農民，他們却幻想有一個最高的權力，來制裁這些無法無天
的諸侯，於是出現了墨子的「天志」（註）。這說法自然是有理由的，因爲在古時，無論中國或外
國，凡是代表農民利益的革命運動，每每假借宗教的力量以爲號召，但這種情形和墨子的適合不能

通用。墨子的立論並不代表農民利益，而當時的農民倒比較歡迎當時「無法無天的諸侯」，甚至亂臣賊子的。「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四海之內皆以爲稱矣；周厲之難，天子隳絕，兩天下皆來饋矣」（呂氏開春論）。「墨子采芣，歸米田成子」（史記田敬仲世家）。這些是歷史上所告訴我們的實際情形。就在秦滅六國之後，六國的遺民都在思念他們的舊主，所以陳涉發難，六國王室的後裔便都一時紛紛復原了。陳涉不立楚後而自立了號，項梁立楚懷王孫心乃「從民所望」。這些所表示是什麼呢？便是當時的農民對於那些「無法無天的諸侯」倒並不怎麼懷恨的。何以會這樣？理由却甚簡單，便是因爲人民從奴隸的命運解放出來還不久久的原故。

有的朋友又說：墨子的天道觀是很不平等的，證據是法儀篇的「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臣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意思就是說，萬人在天底下都是平等。這也是認爲不足。法儀篇的那兩句話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擴大。假使前者是一種天道平等觀，那兩後者便是一種王道平等觀。豈不是奴隸制度也可以說是平等的制度了嗎？據我所見，那兩句話其實正表示其大不平等。因爲，「臣」有大小的區別，「臣」有貴賤的等差——至少古時是有十等的！假使我們拿「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和「王司救民，固非天胤」的話和這比較起來，那就相差得天淵。一邊是王和臣同姓以是天的兒子，故稱是兄弟行，一邊是金字塔式的君臣主奴的

（註）劉伯倫著「中國史綱」第五十九頁。

關係，我們難以公平的態度來批判，到底那一邊更較為平等呢？

這位朋友又說：明鬼也有平等的意思在裡面，因為在墨子以前只認為王公大人死了才能為鬼，賤民死了是不算為鬼的。何以見得呢？他引用了左傳昭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的那段故事。子產說伯有取精用弘，族大德厚，故強化為鬼。據此認為古代賤民沒有做鬼的資格，是墨子提升了他們，使他們也能做鬼了，所以「明鬼」也是一種平等的主張。這見解倒十分新鮮，但可惜地全是「自找作故」。古者人死為鬼，是自有文字以來的通例。鬼的字形就像一個大頭人，表示著一種浮腫的臉龐而已。

「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食，庶人有魚炙之養。墨取諸禮則上下均之。」

（楚語引祭典）

庶人如沒有鬼，何用此「魚炙之養」和「燕豆醴醢」呢？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遊，人死曰鬼，

此五代（唐虞夏商周）之所不變也。」（禮記祭義）

據這些看來，可見庶人死為鬼，是自古以來如此若涉，那麼會是墨子的新發明呢？事實上就孔子處詳伯有那段話裡面，他已經明明說着：「四夫匹婦強化，其魂魄猶能依於人，以為淫厲。」，淫厲就是惡鬼，他何嘗說庶人死了就沒有資格做鬼呢？鬼世界和人世界是一貫二體，一源一

形。人世界中有什麼人奴隸，彼世界便沒有什麼奴隸？鬼世界等被說是實在的。貴族在生前統治世界，死後也統治世界。做人在生前奉養貴族，死後也奉養貴族，故做人是具有貴族那樣的靈魂，固是實在的。假使做人沒有資格做神，那就正確了。墨子明鬼論固是前者的「一些鬼話」，都只是一些貴族鬼，即所謂神，做人固真正沒有資格做的。

又有人說：墨子的信仰鬼神，多少是出于利用，所謂「神道設教」。因為明鬼論斷這樣說：「今墨家雖無宗法以敬慎祭祀……：雖使鬼神（誠亡）無，此論可以合諸家，取諸家之善，是於這個比附附說合理一些，但我們須得知道，這只是辯論時所用的援推辯而已。鬼魂是神是沒有嗎？好祀，就作為沒有祀，固尊天明鬼仍依然有它的妙處。這意思並不是承認了鬼神真正無，而只是加強了尊天明鬼的兩倍的好。自然，在墨家本身也是有變化和發展的（這種辦法正是我們新史學的原則），等到墨家後學講求名辭的時候，他們便差不多根本不談鬼神了。這是他們的進步，然而在墨子本人固不能適用。墨子他是一位廣誠的信仰者，看他三觀四地取明鬼神之有，又三觀四地斥責無神無鬼論說之家，也就儘足以證明他的誠實了。不特，忠告輕信相信有鬼神的，那是因為受教育的機會被人剝奪了的原故。假使因為他信相權而再要站在「生公大人」的立場來存心利用，那正是愚民政策。「無法無天的貴族們」早就知道那一套是騙局，假使不騙，而老百姓們倒被假說騙會更加點服了。為什麼呢？頂可憐的是貴族虛而不實話

人起訴，所以宗教，結果是奉事統治者的東西，要說起于死存心利用，我認那個是有點實在的。

在我的意見，問題不過這些提法。我是感覺着中國有這樣一位標準的教主入幕，為什麼卻沒有產生出一個固有的宗教？世界上的幾個大宗教差不多都發生在距今二千年前上下。孔子生在二千四五百年前，以他的精神和生活可以成立一個中國獨特的宗教，而在我國年間的學家學問的確也有個種種的趨勢的，如等於教主的所謂「亘于」之衣鉢傳授即是一例。然而結果沒有形成，後來反儒風和道家來奪了他的席，而儒也並不其爲宗教，這也還是印度教的拙劣的翻版。這在研究中國古代史上固確實可成爲一個問題。為什麼在奴隸制崩潰以後中國不能產生一個獨立的宗教呢？在這兒我的看法是，中國的地理條件有很大的關係。各個世界大宗教都產生在熱帶國家，那裏植物的豐饒們一樣受着自然界的誘迫，故很容易在幻想中去討生活；在先前想求得一種法以忘掉現世的辛苦，在死後自己昇上天去，把敵對者打進地獄裡去。中國是超帶國家，天堂何如現世的宮殿？地獄何如現世的監牢？故中國實是極難，無須手再有昇天入地的必要了。因此中國的統治者早就知道歡迎比較更現實的統治工具，而冷落了那種種無形無影的東西。這，也就是國有宗教隱隱其體而微，而終究未能完成的根本原因吧？

世界是一元的，陰陽只隔一層被洞穿。人世界即鬼世界，鬼世界即人世界。既承認鬼世界的

神聖的權座。當然早就在承認這「王公大人」的權威。既在奉天朝覲，當然就早就得向周尚賢。尚賢與奉天相離，尚賢與明鬼相離。天之下有尊卑有節，王之下有尊卑有節，都是兩相離的。奉天既是絕對的神權統治，尚賢便是絕對的王權統治。至德爲天所授與。「一同天下之歸。上之所起，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上同而下不化」(尚同上)。以王的意志統一天下的意志，以王的是非統一天下的是非。當然王之上也還有天，王也得止同於天。但，天是什麼呢？天不過是王的影子。故結果是王的意志就是天的意志，王的是非就是天的是非，而反過來，所謂「天志」實在也不過就是王志了。當然王也得得爲義，不爲不義，還是是非善惡的標準。但這義不義的標準又從什麼地方出來的呢？「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天志中)。是故「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尚賢中)。「然則孰爲貴？孰爲智？曰天爲貴，天爲智而矣」。天又是什麼呢？真是天降得，還不是就是王者的特恩嗎？所以說來聽去，仍不外是以一人的意志爲天下人的意志，以一人的是非爲天下人的是非。這一人縱使是絕頂的天才或者沒有問題，然而天地間那有這樣絕頂的天才呢？有這樣絕頂的天才，又能世世代代相繼統治嗎？

王者是絕對不能虛位的，必須力裝躬行。爲了一同天下之觀瞻尤必須獎勵善行。行通終？「見惡鮮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濫辭者」(尚同下)，使「天下之人皆恐惡惡相聞」不敢爲惡。

「曰天子之視聽也」(會同中)。「淫辭」或「淫聲」固非現代社會是也。墨子之所謂「**亂世**」的人，他的書中返之復之地屢以淫聲爲戒。這固是時代的反映，因爲土地財產私有權的發達，則私有權的保衛便不能不強固。在墨子時代這固是「天下之爲淫亂盜賊者，則就天下無所不至」(尚同下)，而到墨家後學竟發展到「殺盜非殺人」(小取)的地步了。彼謂他「**王公大人**」所設想的，就是在怎樣「**法社稷**，治國家，欲修保而勿失」(尚賢中)，「**以道養萬民**」(會賢下)，「**遠萬里**」(天志上)。此固是王的社稷，國家是王的國家，人民是王的人民。「**士君子**」之流便擁護着王的權威，保衛着王的私產。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當然不許有人敢爲「**淫辭**」或「**淫聲**」，敢爲「**亂世**」。而能够替王保衛私產，通制「**淫辭**」，消弭「**亂世**」的人也就是所謂「**賢**」了。這樣的「**賢**」不用說比那些「**骨肉之親**，無故害我，則我將好者」還更值得貴重，「**唯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士子之得**，**君子之謀**，任之以事，**節子之令**」(尚賢上)，使老百姓們尊敬，信仰它，寄歸它。這固也是以瞭解當時的社會實際情形，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這兩句話每被人引用來證明墨子主張的革命性，然而實是在社會現實的反映而已。而墨子却把這個現實引向「**王公大人**」本位上去了。

在墨子思想中總爲「**尚同**」起着核心作用的要求是他的「**兼愛**」與「**非攻**」的一組。這組的主張實只是一個指示的正反兩面，「**兼愛**」是由積極方面來說，「**非攻**」是由消極方面來說。這無

顯然是時代精神的反映，但儘管同樣在說，糾纏在繼承人，而墨子的重心卻不在人而在財產。墨子是把財產看得特別神聖的。人民，在他的觀念中，依然是舊時代的奴隸所有物，也是一種財產。故他的勸人愛人，實等於勸人之愛牛馬。請看他說吧：

「豈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異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

「丈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兼愛上)

這就是說：你不尊重我的所有權，我不尊重你的所有權，結果是互為盜賊，互相攻殺，像個侵犯我的所有權，我也侵犯你的所有權。要怎樣來防止這種弊病呢？要「兼相愛，交相利」。這也就是說：你尊重我的所有權，我也尊重你的所有權，彼此互相尊重，於是也就互相得到好處。故所以說：

「視人室若其室，誰竊？」

「視人身若其身，誰賊？」

「視人家若其家，誰亂？」

「視人國若其國，誰攻？」(兼愛上)

兼愛的結果便不會有攻亂賊竊，不兼愛呢便會有攻亂賊竊？反對攻亂賊竊便是反對不兼愛，

故爾「非攻」只是「兼愛」的另一種說法而已。因而在本質上，「非攻」也終於是對於所有權的尊重。翻譯成適當的口語，也就是反對侵犯所有權。且看原文吧。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貧則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

「至壞人家雞豚者，莫不竊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

「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又甚壞人家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有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

「至殺不辜人也，翦其衣髮，擊之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牛馬。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有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非攻上）

就這樣逐漸把範圍擴大下去，說到取人之財為大不義。故「攻伐無罪之國，入其闔室淫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溷其溝池，毀殺其社稷，燬其宗廟，劫殺萬民，擄其老弱，遷其重器」（非攻下），這比殺人處貨此更加不義了。「劫殺其萬民」與「鑊殺其社稷」並列，而與「壞人家雞豚者」，「取人牛馬者」同等，故人民依然還是所有物，而取人之園圃等於侵犯農夫的私有權而已。這就是兼愛與非攻說的核心，尊重私有財產權或保衛私有財產權。故他這

一番學說並不愛在愛人，而是愛在利己，不是由人道主義的演繹，而是向法治現狀的歸納。
主張告密逼坐（尚同中及下），勤之以賞，威之以罰（象愛下）或「富貴以道」（尚同）
尚，明法以率其後」（尚同下）的辦法，後來為商鞅用不啻轉非之流的法家所翻騰擴大了，那並
不是沒有理由的。

政變侵略，非攻就是反侵略，因而非攻本身就是戰爭。道家早就揭穿了這一推，認為「爲兵
德兵，造兵之本」（莊子徐無鬼），而他自己也讚美周武王之伐殷紂，認為是「德」，與政不同。
這也就是儒家所說的義戰與非義戰的區別了。我會說「他的非攻其實就是美攻」，朋友們多說
我放爲「偏惡之辭」，其實我倒是在爲了客觀檢討的能事的。

既普遍承認私有的神聖，因而他的主張結果是對於私有權大者幫了大忙，這是邏輯的必然。
我會說「他的愛愛其實是偏愛」，朋友們多說我放爲「偏惡之辭」，其實我倒是在爲了客觀檢討
的能事的。

在由奴隸制轉移爲封建制的過渡時期，私有財產權還未十分穩固，更建立一種學說體系來使
它神聖化，倒確實不好輕率地認爲「反動」——在這一部分我可以取消我的這個判斷。但要說這
子是奴隸解放者，是農工革命的前驅，是古代的布爾喬亞，雖然明顯地不是出於「偏惡」，然
而只是把黑臉張飛塗成了紅臉關羽。不僅依然在這塗着，而且塗錯了臉譜。

「節用」與「節葬」是一套消極的經濟政策，這和老百姓的生活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因為老百姓的用處節無可節，葬也是節無可節的。他的整套學說都是對「王公大人」為對象的，「王公大人」的不合理的消費如果節省一些，當然也可以節省一些民力。從這層一點間接的恩惠說來，墨子倒可算在替人民設想了。大家也就抓緊了這一點，認為墨子是人民的朋友。譬如節用中墨所反覆說的一句話：「增加費而不加民利者，非王為也」，好些朋友認為這就是墨子事事為「民利」着想的證據。但我却絲毫也不能在這句話裡面找到滿足。一國的政治如果真是為「民利」設想的話，你只愁用費不夠，那里會有什麼浪費的憂慮？他之所以憂慮浪費者，只是為的王利而不是「民利」，如何在老百姓身上多用一點，他從不會這樣想過。他只是把人民的生活限在極窄的階段，「一切器用足以奉給民用則止」，只求他們凍不死，餓不死。假使王者不節約，把老百姓榨取到凍死餓死的程度，那怎麼辦？這就是他所担心的，你以為他真在替人民設想嗎？但進，我也並不願專怪他，因為這限度要想打破，歷史還須得再推他兩千多年。但我們如果不認定這個限度而要說墨子是「救民主」，是「飽爾雪維克」，那卻是中飽了二千多年的歷史。

當時的生產情形，在墨子的眼中看來，是人民少而土地多，因而生產力不足，生產不敷消費。
• 讀者做做吧！

「今萬乘之國，虛（據）數於千，不勝而人，廣衍數於萬，不勝而時，然則土地者所有

餘也，士民者所不足也」。(非攻中)

荒地以千計，沒有那麼多的人來住。平地以萬計，沒有那麼多的人來開墾。土地有餘而人民不足。故齊人兵法打仗，去「爭虛城」，在他看來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益」。因此他的節用，把人民這項生產工具也是包括在裡面的，不備要動省民力，而且還得倍加人口的生產，於是他便想出了早婚的方法，要用國家的法令來限定早婚。「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節用上)，我們不要看忽略了那「毋敢不」三個字。戰爭除勞民傷財而外，還使「男女久不相見」，久要也因「啟男女之交多」，故都在所反對之列。看來齊國人口倒確是墨子的一項經濟的經濟政策。人民既是「王公大人」的私有，使人民繁殖，也不過如使牛馬蕃息一樣，儘管「女子十五」就要「事人」，未免有點不人道，他也顧不了那麼許多了。有的朋友說：這比三年之喪禁止男女三年不交接的似乎還更「人道」一些。這倒也相稱周到。但我並沒有意思替三年之喪辯護，我也並不是什麼新儒家，離人道離不人道，倒不是爭門戶的事情。不過公平一點說，人道不人道的標準是應該拿強制性的有無或強弱，即自願與非自願來判定的。我們隨從這一方面去加以考慮一下吧。

「節用」與「節葬」的另一個目的，是在反對儒家的禮。「節葬」是反對喪禮，尤其三年之喪，固不用說，「節用」反對其它的禮，所謂「僣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為」(節用中)

禮樂射於射式上的繁文縟節，孔子也站反對的，所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治）也寧戚」，和墨子的節用節葬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同。只是孔子的出發點是心理的安寧，而墨子卻是經濟的利不利。就季三年之喪來說吧，當季子反對的時候，孔子也只說「於汝安乎？汝安則爲之」。在這一點上來說孔子是唯心，墨子是唯物，是毫無問題的。只是墨子這個人誠實者，他位要這極端的天才，他在生活上和青島上都愛極端，有時候每每自相矛盾。例如他的「節葬」和「力田」衝突，東漢末年的王充已經指他出，而他的「節用」即「尙賢」也是衝突的。尙賢雖然是「天下正路侯者必須盡三本，所謂三本者一高乎之爵，重乎之祿，任之以事，備乎之令」，他在「尙賢」說「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教令不斷則民不學也」（尙賢中）。但論說到節用節葬上來，卻採取平均主義，評級到萬分，不能是於事行不通，而且是於理也說不通的。大約因爲是出於反對命，故每每不能過其其，知術正真的。

他是尙節公室而反對私門的人。他站在尙節公室的立場上，所反對的只是過度了的私室生產，因而他不問人民生產力的偉大。他對於人類前途是悲觀的，因而他反對禮樂的支，而想回到夏商或其以前的質。他只能在節省和養殖人口或防止人口減少上著想；怎樣去開發地，怎樣去改良生產工具，怎樣使人民樂於增加其生產效率，他不能不肯去用心，而且反對向以聖王而夫用心，事實上他是在開倒車，因而我說他「反動」倒並不礙於他迷信鬼神的那一點。我們再來看

他的「非樂」和「非命」理論吧。「非樂」不僅在反對音樂，更在反對藝術，反對文化。他說：「仁者以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之所安。以此虧寧民衣食之財，仁者難爲也。」（非樂上），這是對的。但如果是謀人民的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之所安，這不僅不會「虧寧民衣食之財」，而且可以增加其衣食之源，何嘗便可以一概反對？但墨子是一概反對了。雖然他也在說「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事實上他並不是站在萬民的立場以度其利，而是站在「王公大人」的立場以度其利。那樣從樓上滴漏眼裏下來的的方法，只是讓老百姓有碗飯吃，有件衣穿，便是大德大利了。「興民節樂」的觀念，在墨子的思想中是毛根也沒有的。所謂「親君子疏之，廢君子所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結果只剩下「一家牛馬和一係繩子」。賤人是管耕稼樹藝，紡績織紉的，君子是「內治官府，外收斂歸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庫府庫」的，一句話歸總，便是榨取老百姓的。「君子不強聽治，即行政厲，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刑政在管賤人，財用在養君子，故「非樂」的高論只是在鬼多神取老百姓而已。「中萬民之利」嗎？真是天曉得呀！

關於「非樂」，墨子之間有一段小小的議論，甚爲學者所稱道。

「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爲樂？」

曰：樂以爲樂也。

子墨子曰：于未嘗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且以爲男女之別也，則于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公孟篇）

首先是胡適根據這個故事認爲墨子是很科學的，對於事物要追求根源，問他一個爲什麼。不說，墨子似乎很有這樣的精神，不過在這個缺尾裁割的故事裡面，他或他的後學卻不免有點上下其手。「樂以爲樂也」是說音樂爲的是圖快樂，正說出了它的爲什麼來。墨子故意把音樂與快樂混爲一談，而反詰以「室以爲室」，那無寧是詭辯。這是因爲中國字有毛病，古時音樂的「樂」與快樂的「樂」，連發音都相同。這樣的情形就在墨子的「經說上」裏面也正有同樣的一例，便是「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我們可以了解第一個「知」字是智字，但如也要弄點詭辯的話，豈不也是「室也者所以室也而必室」嗎？

儒家談音樂倒並不那麼幼稚，孔子本人雖沒有留下什麼高深的音樂理論，但到他的弟子或再傳弟子的公孫尼子，他的「樂記」一篇便把樂的功用發揮得很爲詳盡的。我有一篇「公孫尼子及其音樂理論」一文可以參考，在這兒不必贅述。中國古代的學問，認真算得上稱爲有點科學性質的，只有音樂的樂律和曆法。這兩種東西儒家都看得很重。在墨子方面呢？曆法不會提到，而墨子說它「不聞於數度」（天下篇）。音樂則極端反對，我們就單以這項標準，要說墨子是「

「無所適從」，至少在個人是不能不聽從的。

墨子的所謂三表法，朋友們也大多認為是墨子的很有光輝的邏輯。這三表法敘述在「非命篇」後面，上中下三篇的字面略有不同，我現在「就把它們抄在下面。

(上篇)

「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

子墨子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上原（視）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中篇)

「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考之王之書。於其原之也，參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為刑政」。

(下篇)

「言有三法。何謂三法？」

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書。墨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實。墨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家，察萬民而觀之」。

下篇和上篇比較接近，三上從一，我就根據這兩篇來說話吧。有的朋友說這是假科學的方法，因為它有本有原，「都經經驗當成真理的標準」。不錯，從表面上看來，似乎很合乎科學，在早期一點的學者還有人把它比成邏輯的三段論法的。但可惜這個步驟是由上而下的演繹，而不是由下而上的歸納。他那「一本」，根本就是問題。「天鬼之志」且不說，「聖人之事」是什麼事？不是一些奴隸制時代的故實吧？把一些渺茫不足憑的故實認為是真理或真實作為自己論說的出發點，這倒是最不合乎科學的。而他的「察百姓耳目之實」也很能上下其手。譬如他要證明鬼神是有呢？徐古書所載之外，他可以說百姓在什麼地方見過鬼，見過神，於是乎鬼神也就真正有了。又譬如他要證明命是無呢？徐古書上的樂王所作之外，百姓在什麼地方也沒有見過命的面貌，聽過命的聲音，於是乎命也就真正沒有了。這議論真是素樸得可愛。「發而為刑政」，可無須乎再說，所謂「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究竟是誰的國家？誰的百姓人民？誰的利？淺薄的「經驗」是絕對不能成為「真理的標準」的啊！

人民百姓是應當強力疾作的，不強力疾作則「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在這兒所非的樂與勞的命都是使人民百姓「怠倦」的東西，當然也使王公大人卿大夫怠倦，假使管理人民百姓的王公大人卿大夫怠倦了，那人民百姓便更加怠倦了。所以樂與命是要不得的東西。樂，我們知道是音樂，是文化；命又是什麼呢？這很不容易令人把握。他是把否祀鬼神，提倡三年之喪，尊重

音樂，主張有命，是作爲「亂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的。那「非命」，固然是以儒家的命爲攻擊對象的了。但儒家的命是一種素樸的必然論，而墨子所攻擊的卻強半是宿命論，這是有點令人善於索解的。

宿命論固然應當反對。墨子學說裡而似乎也以這一項爲最有光輝。但更奇妙是他的學說的系統很不調和。他說：「命者，終王所作，窮人所述」，在命是指宿命論的時候，這是一點也不錯的。譬如自古相傳爲桀暴王的殷討，他便說這樣的話：「我生不有命在天」（尙書：西伯戡黎）。宿命論是和宗教的迷信不可分的，而倡導非命的墨子卻是尊天明鬼的人，這不是一種奇事嗎？凡是相信鬼神的人每每也走到「百門而閉一門」的地步，「開微草堂筆記」裡面有一段故事，有一位老太婆無惡不作，卻誠心信崇觀音大士，以爲這一身儘便可以消除他一百項罪過。這和殷紂王的故事真可以說是半斤八兩了。

孔子不相信鬼神，他所說的命是種必然論而非宿命論，在上面已經敘述過。所謂「生死有命」便是打破天上的權威，不相信崇敬神鬼便可以延年，不崇敬便會折壽。所謂「富貴在天」便是打破地上的權威，不走路上做下的路去求不義的富貴。這和墨子的學說倒有點不兩立的。在我看來，墨子顯然是在用手段，他利用命的含義有兩種，便先記論說成宿命論者，而在君子裡則盡力打擊必然論，爲鬼神張目。他和他的人去查先王之書，他說所有先王之德，先王之刑，先

王之昏憖而「亦得存曰：雖不可謂，爾禍不可諱（這），敬無益，暴無傷者乎」？他反復地這樣問。當然也就是說：「爾可謂也，爾可謂也，敬有益也，暴有傷也」了。但暴是向誰發？敬是向誰發？爾是從何處？敬是從何處？曰「上帝山川鬼神」和「上帝山川鬼神」之「神主」。他所稱這「先王」不用說就是奴隸時代的一些「神主」。你要敬他，暴不得，那爾就可謂，爾就可謂了。假使你不敬他，你要暴他，那你就該死不得活了所以結果是死生無命，富貴在王。除了王禮也就是神權之外，更沒有什麼必然性。必然性的那種「命」實在是「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的——人者誰？「王公大人卿大夫」也！因此我曾說：「墨子的非命其實地敬命」，朋友們必說我是出於「偏見」，但在我自己倒是發了客觀檢討的態事的。